

风华正茂百年史 赓续血脉启新程

杨智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历经艰难困苦不断发展壮大，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辉煌胜利，谱写了波澜壮阔的伟大篇章。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跨越中，武汉这座英雄之城，敢为人先，勇立潮头，坚持不懈地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前赴后继地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卓越贡献。党在武汉的奋斗历史，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

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光辉历程中，武汉贡献不可磨灭——在创立中国共产党、发动中国工人运动、创建人民军队、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中国革命走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道路、发动全民抗日救亡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武汉这片热土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拼搏抗争，建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功勋，几度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武汉地位举足轻重——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优势，武钢、武重、武船、武锅等一批“武”字头的重点企业竣工投产，为我国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推进改革开放新时期，武汉成绩令人瞩目——勇立潮头，以推进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为主要抓手，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先行先试，推出了一系列可供复制的重要改革实践模式和经验，为党领导人民贯彻落实新时期总路线，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探索了新路子，积累了新经验。

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武汉壮举感天动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立足高质量发展，加快创建国家中心城市，大力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改革，奋力夺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为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武汉还是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经验探索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武汉市委大力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与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共谋发展，巩固和发展了民主团结、生动活泼的和谐政治局面。武汉首创的“双月座谈会”制度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向全国推广。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中共武汉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政协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服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为工作主线，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担负起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为国家重大战略在武汉落地落实贡献智慧和力量，为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大部署建诤言、献良策，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梳理百年党史，彰显百年荣光，记录英雄之城武汉的高光时刻和辉煌成就，是市政协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功能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与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辑出版了《武汉文史资料·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特刊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伟大指引为主线，以武汉市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内涵为框架，通过讲述从建国前革命先辈播撒火种、探索革命道路，到建国后市委、市政府带领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勇担当、善作为，积极谋求城市转型发展，再到迈进新时代市政协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三亲”故事，立体呈现了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武汉开拓奋进的历史轨迹和辉煌历程，为今天的建设者们汲取历史智慧和精神动力提供宝贵财富。

历史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为民族谋复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最有说服力，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汉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才能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回望过往的奋斗路是为了更好地指引前方的奋进路，以建党百年为新起点，武汉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市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保持昂扬斗志，奋发有为，为全力打造“五个中心”，加快建设现代化大武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目 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陈邂馨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 光 朱向梅
杨 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 鹏 甘 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陈立新 周清萍 郑学军
姚四平 曾艳红 谢受贵 窦 梅
潘红莲

特 约 编 审：郑水平 宋 健

主 编：陈国方

副 主 编：何利平 周 敏

本期责任编辑：华 蕾 游 迎
周 薇

编 辑：张川蕾

封 面 设 计：王 鹏

卷首语

<<< <

1 风华正茂百年史 赓续血脉启新程 / 杨 智

初心篇

<<< <

4 五四运动中的恽代英 / 田子渝

10 董必武：从同盟会员到中共党员 / 邓正兵 谢 忱 刘佳欣

14 党的创立时期武汉地区党员考证 / 孙 勤

26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自身建设概况 / 刘桂芳

31 暗夜播火——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前后 / 宋 健

33 周恩来在武汉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 / 吴文俊

担当篇

<<< <

37 “一五”时期武汉工业化建设及其成就

/ 许 歌 肖 捷 杜宏英

42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市农业农村改革开放的回忆

/ 杜远威

49 难忘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龙王庙 / 吴世伟

54 东风汽车和武汉的不解情缘 / 谢 勤

59 一路风雨一路行——见证武汉城市转型

/ 袁善腊（口述）周 敏（整理）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ONTENTS

2021 年第 5/6 期 (总第 343/344 期)

- 67 武汉长飞光纤光缆项目建设回顾 / 杨能森
71 我们走在脱贫攻坚路上 / 谭本忠
76 武汉有座习总书记批示建立的纪念馆 / 赵晓琳
80 不负习总书记深情厚望, 为居民守好社区这个家 / 陶久娣

团结篇



- 84 回忆 1984 年武汉创设“双月座谈会”制度始末
/ 王功安(口述) 范前锋(整理)
88 我与世纪之交的政协工作 / 刘善璧(口述) 游迎(整理)
94 群星朝北斗——我与名人后裔交往的故事 / 李传德
99 落实宗教房产政策二三事 / 马奇明
102 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做好界别工作的回忆 / 朱大成
106 我做统战工作的 10 年回忆 / 杨光
110 在榜样的引导下努力履职尽责 / 刘珍秀

后记



- 115 做时代的忠实记录者 / 本刊编辑部

主 管: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 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 《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 《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 CN42-1056/K

印 刷: 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 6 月 28 日

定 价: 16 元

地 址: 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 430010

电 话: (027) 82220667

(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特刊

初心篇

CHUXINPIAN

五四运动中的恽代英

◇ 田子渝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中国进步青年挺身而出，掀起爱国风暴。恽代英，就是其中的一员。

恽代英祖籍江苏常州，1895年生于武昌。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后考入哲学门。在学生时代，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东方杂志》《教育杂志》《青年杂志》等刊物发表80多篇文章，成为长江中游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因校长陈时的赏识，学生时代的恽代英就负责中华大学学报《光华学报》。1917年10月，他组织了爱国团体互助社，成为武汉地区爱国主义团体的中坚力量。1918年6月从中华大学文科毕业后，他被聘为中华大学中学部教务主任（校长）。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3000多名学生上街抗议巴黎和会将中国山东的权益割给日本帝国主义，爆发了五四运动。恽代英立即在武汉响应，投身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中。

（一）

5月6日，《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头版以《北京快电》为标题，报道了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爱国游行的消息。

当天晚上，恽代英与中华大学中学部三班学生林育南商议响应北京爱国学生事，他们油印了600份由恽代英起草的爱国传单《勿忘五月七日之事》。

第二天，是五七国耻日，武汉三镇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一天，以示不忘国耻。

中华大学为“鼓励尚武精神”“振扬国威”举行运动会，因有五四运动的背景，所以到下午聚集了6000多名学生。互助社成员均积极参加，恽代英、冼伯言等担任招待员，沈光耀为唱名员，喻进贤为纠察员，汤济川为音乐队员。他们散发了《勿忘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振聋发聩的呐喊，引起了莘莘学子的强烈共鸣。

有血性的黄帝的子孙，你不应该忘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

现在又是五月七日了。

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

你若是个人，你还要把金钱供献他们，把强盗认做你的父母吗？

我亲爱的父老兄弟们，我总信你不至于无人性到这一步田地。

传单刊登在1919年5月9日的《大汉报》上，起到了发动、鼓舞武汉人民投身爱国运动的号角作用。5月9日，武昌各学校学生代表齐集中华大学，商讨声援北京学生事宜，拟定成立学生团，并公推恽代英起草宣言书。次日，中华大学、武昌高师等15所大、中学校代表举行茶话会，决定武汉学生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5月17日，武汉地区26所学校代表在中华大学开会，正式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学联会“以热忱爱国联合感情为宗旨”。

第二天中午，武汉3000多名学生在阅马场集中，举行了第一次爱国大游行。13时45分左右，以武昌高师200多名学生为先导，高等商业学校、外国语学校等校学生紧随其后。他们每人手持用纸或布制作的旗

帜，上面书写“争回青岛”“灭除国贼”“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字样，从阅马场出发，经过武昌路、抚院街（今民主路）、司门口转长街（今解放路）、大朝街（今复兴路）复至阅马场。中华大学300多名学生殿后，互助社的所有成员均参加游行，他们将恽代英起草的《呜呼青岛》的传单四处散发。一路上，口号声此起彼落，声振鄂垣；传单上下飘舞，如雪片般撒落在大街小巷。

学生们的爱国举动，受到武汉民众的热烈欢迎。队伍所到之处，市民莫不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又莫不露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他们纷纷递送茶果，慰劳学生。有一个人力车夫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学生万岁！”

5月20日，武昌文华大学、文华中学、圣约瑟学堂、博文学院、文华童子军等教会学校1000多名学生，冲破校方的阻拦，举行示威游行。早上8时，他们由文华大学出



恽代英（1895～1931年）

发，前有乐队，后列学生军，经过得胜桥、司门口、斗极营，出长街至阅马场，沿路不少学生加入。当队伍行进到督军署前时，突然下起大雨，但没有一个学生离队，大家淋着雨，秩序井然。学生们手持小白旗，上书“提倡国货”“保全主权”“伸张民气”。游行队伍迭奏哀乐，以示“国民处于卧薪尝胆之秋，亟应闻鸡起舞”之意。队伍中有三面五色国旗，每面由6个学生捧着，“以示祖国将沦丧，当合群力以扶持，庶救危亡于万一。”

面对日益走向高潮的学生爱国行动，湖北督军王占元禀承北京政府的旨意，初是百般阻拦、刁难。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时，王占元赶紧让省长何佩瑢出面，召集有影响的校长入署严谕，不准学生举行国耻纪念活动。5月7日，又颁布临时戒严令，增派军警实行警戒。

5月31日，武汉学联会为了声援和响应北京、上海学生的总罢课行动，决定从6月1日起采取统一行动。6月1日清晨，王占元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各主要学校，每所学校大门都有百余军警把守。武昌街头四处布满军警，首尾相衔，如临大敌，交通几为断绝。爱国学生见状，愈加气愤，有的与军警交涉，有的“毁垣”冲出校院，不少学生从两三丈的高墙一跃而下。他们高擎着大白旗，冲开军警的封锁线，从粮道街、巡道岭、昙华林冲上大街，迅急汇合成汹涌的洪流，又卷向阅马场、黄鹤楼、督军署……刹时，武昌全城到处是飞舞的传单、激昂的演讲、正义的呐喊。

面对汹涌的革命洪流，王占元命令军警镇压。包围武昌高师的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学生数次涌出，士兵用刺刀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十几个学生被刺伤，其中一个

叫陈开泰的学生伤势最重，右大腿被刺刀戳穿，左腿也被刺伤，当场晕倒。文华大学有8人被殴伤，一个学生的手掌被刺刀戳穿，另一个学生被巡警刺伤胸骨。这一天受伤的学生有30余人，数10人被捕，制造了武昌六一惨案。当天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罢课演讲之第一日，即湖北学生与官厅宣战之第一日也。同学越墙外出，高二三丈，一跃而下，亦勇矣！”

6月3日，学生不顾禁令，再次上街进行爱国宣传。下午，中华大学的数十名学生到劝业场进行演讲时，与保安队发生冲突，重伤4人，轻伤5人，有7人被捕。中学部学生吴序宾被殴打，口吐鲜血，被抬往医院，途中气愤地呼叫：“这是学生为国的下场！”互助社的成员杨理恒手臂被折断，其他受伤的学生是刘昌世、胡钟灿、刘鹄、汤济川、张上超、蔡家让、李岳等。当天，恽代英到医院慰问受伤的爱国学生。

教育界对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了直接的声援。恽代英作为中华大学中学部的校长，不便直接出面与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但实际上是武汉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主要体现在：在组织上，通过互助社在学生运动中起核心作用；通过中华大学的学生林育南等，间接领导武汉学联会。在思想上，他的社会改造观影响了一批进步学生，这批人是武汉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同时，武汉学联会的重要文件，几乎均出自他之手。根据恽代英日记的记述，由他起草的主要文件有《武昌学生团宣言书》《呜呼青岛》《提倡国货办法大纲》《武昌中等以上学生放假留言》《武汉学生联合会宣言书》《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等，此外，学生团、学生联合会致社会各界、政府等许多公函、电文也多半出自他手。

六一、六三惨案的发生，血的教训教育了武汉地区的先进分子，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湖北地区的运动必须打破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只有调动社会各团体的力量，运动才能取得胜利。六三惨案发生的当天，恽代英渡江到汉口访问了武汉巨商刘子敬、马刚侯等，希望商界声援学生。6月7日，他再次到汉口，在汉口各团体联合会举行的会议上发言：“学生但望商界继起，以为国家，虽死伤亦所甘心。”他鼓动商界举行罢市，支援学生运动。

在恽代英、施洋等人的组织和推动下，6月10日上午，汉口数十家商店首先罢市，有的商店门首书写“国耻痛心，休业救国”。当局十分紧张，夏口县知事、警察厅的官员和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的会长等纷纷出动，逐户劝说开市。下午，汉口总商会接到上海总商会10日开市的通电，立即向各商店、各帮做宣传，有的商店开门营业。恽代英见状，写了《为什么要罢市？》的传单，上面写道：

上海、宁波、南京、镇江、芜湖、汕头、杭州、南昌、汉口均已罢市了。罢市的好处如下：可以争回青岛，可以挽回利权，可以惩办卖国贼，可以取消亡国密约，可以救被捕学生，可以不当亡国奴，可以提高人格，武昌明日一律罢市。

学生们在街市上散发罢市的传单。恽代英还将鼓动罢市的内容写在四把扇子上，十分巧妙地通过传递扇子的方法进行宣传。第二天（11日），汉口租界区、二码头、华景街（今华清街）、前后花楼及后城主要繁华区的商店纷纷罢市，爱国商人将写着“不惩办国贼，誓不开市”的标语贴在门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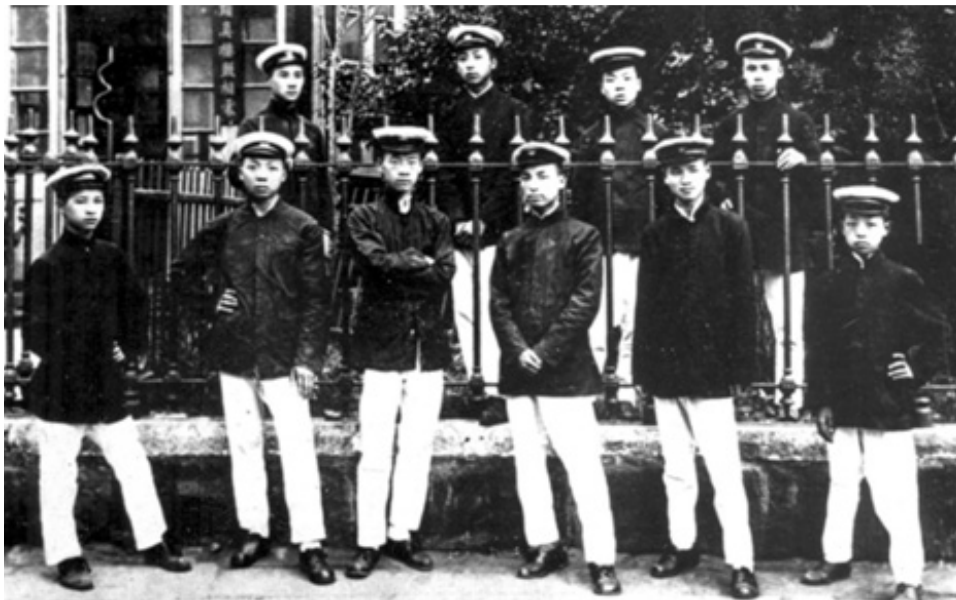
这一天，武汉的报纸刊登了北京政府批准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辞职的消息。武汉人民欢欣鼓舞，恽代英对此保持

警惕性，在日记中写道：“曹汝霖已免职，然如此轻淡的‘准免本职’四字，实由‘徐图登用’的出产。惟愿吾国民能善用此民气，以扫政治界中之妖气耳。”为了使广大市民和学生认清当前的形势，将斗争进行到底，他为武汉学联会起草了3000余字的宣言书，力主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对卖国贼的免职，应明令宣布其罪状，交法庭审究；对卖国条约，政府应该设法废除；请速召开和会促成南北统一；恢复旧约法所赋予人民的一切权利，对学生联合会及其各项出版物、演讲会应明令正式承认。对湖北政府，要求将纵容军警杀伤学生的警务处处长崔振魁革职，将指挥军警杀伤学生的督察长杜杰革职后，交法庭惩办；应准武汉学生联合会发行公报，并指定地点定期举行演讲等。

武汉的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关注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学生运动兴起时，他们和广大市民一道，对在街上游行宣传的学生给予支持。6月2日，贫民大工场织机部的工人曾组织国货贩卖团，每日派10人将本场生产的产品挑上街巷售卖，积极参加提倡国货的活动。上海工人阶级支持学生举行罢工后，也行动起来。但武汉地区的罢工规模小，影响有限，不能视为武汉地区工人以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

在全国爱国运动的推动下，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派中华大学潘德芬、武昌高师蒋之龙出席会议，随后加派恽代英的学生林育南、文华大学余尚垣参加全国学联会的工作。林育南代表武汉学联会向全国学联会提出意见书。这份由恽代英撰稿的文件有5000余字，全面阐述了武汉学界对国家政治形势的看法和要求，以及对全国学联会的建议与希望。

武汉学生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是该地



1918年6月，互助社部分成员在武昌合影，前排左三为恽代英

区先进知识分子打破地域界线，走向全国联合的第一步。6月28日，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至此，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8月18日午后1时，湖北各界联合会在爱国公司成立，负责人为马刚侯、施洋等。这个组织是一个松散的团体，由于自身的弱点，加上军阀的阻挠和破坏，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实践已经证明，中国革命需要组织严密、代表最有前途阶级的利益、并有科学理论作指导的政党来领导，才能开新局。

（二）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成为恽代英人生旅途中的转折点。

首先，世界观开始发生根本转变。恽代英生于忧患，国家危机日益沉重，救亡成了社会的第一要务。他生活在苦难危亡的时代，从小就立志改造国家，树立振兴中华大志。最初他是从传统的爱国主义中寻找精神力量，西学涌进后，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无

政府共产主义，主张道德救国、思想革命。他认为每个人都培育善的观念，全社会养成善势力，用善势力去战胜恶势力，从而破除私有制度，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黄金世界。那么实现黄金世界的力量何在呢？青

年！像他那样的有知识、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有高尚品格的进步青年。

在五四运动中，他看到了改造社会的还有另外一股力量，即工农平民的群众力量。特别是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力量，使他从学校走向社会，从知识青年走向工农大众。改造社会根本力量的转变成为他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标志。

其次，确定阶级斗争为改造社会的主要手段，确定社会主义是振兴中华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最初他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理念保持一致，主张用改良主义改造社会。如前所述，他主张在思想上革命，而非社会的根本改造；他避免阶级斗争的手段，主张平和的人心革命。因此日本新村的乌托邦传入中国，立即引起他无限的憧憬：“我们的新生活。这是创办一个独立的事业，投身生利场合的第一步，实行一部分的共产主义，试办近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团体。有机会以尽力于工读互助主义，尽能力为社会兴办各项有益事业。”为此，他设计在农村、城市

办一个共产主义新村，知识青年聚集在一起，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动新生活，通过工读互助、新村使中华民族振兴。

1920年10月，他发表《未来之梦》，集中反映了他早期的思想脉络和改造中国的方案。基本点就是通过不触及社会的根本改造，用改良的意识形态，使中国走上复兴之路。此时，他的学生刘仁静、林育南在北京沐浴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们写信给老师，反思老师追求的道路，指出其空想性。林育南致信：“我们的理想是仿佛对的，但审查社会情形和我们的力量，恐怕终久（究）是个‘理想’，终久（究）是个‘梦’呵！”陈独秀的批评则严厉多了，他说：“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的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象（像）北京工读团即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这些批评让恽代英深刻反省。在现实生活中，他的改造方案又不断受挫，促使他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识到只有社会的根本改造，才能实现经济生活的改造，从而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最后，恽代英确定要救亡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恽代英早就有建立“死党”救中华的思想。1917年10月8日，他和爱国青年黄负生、林育南、刘仁静等在中华大学创立了爱国团体互助社。《互励文》彰显了他们结成团体救国的思想：

我们都晓得：今日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我们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所能尽的理论，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懒惰，不应该虚假，不应该不培养自己的人格，不应该不帮助我们的朋友，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

不过那时救国思想是克鲁泡特金的空想社会主义。通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的团体救国思想发生革命性的飞越，主张用阶级斗争救中华。他反省：“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在少年中国学会讨论团体的性质时，他明确地反对把少年中国学会办成一个学术、文化团体，主张：“学会有树立一定明确旗帜的必要，实无调和的余地。”少年中国学会要成为“波歇维式的团体”。所谓“波歇维”指的是俄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

1921年7月16～21日，恽代英等23位革命青年聚首湖北黄冈回龙镇浚新小学，成立了共存社。毛泽东创办的湖南文化书社的代表易礼容参加了会议。共存社的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专制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这个“组织严密，俨然一国家”的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团体，与共产国际、中共早期组织没有组织关系，是以恽代英为代表的革命青年，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自发地组织布尔什维克式（波社）的团体，说明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势在必行。中国共产党权威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共存社的出现说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共同愿望”。

（田子渝：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董必武：从同盟会员到中共党员

◇ 邓正兵 谢 忱 刘佳欣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斋，号壁伍。1886年出生于黄安（今湖北红安）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5岁开始在县城广善庵私塾随父跟读，10岁又随父到麻城县张煜村私塾读书。他学习刻苦认真，除熟读四书五经外，还经常翻阅家中藏书，向同学和亲友借来《三国演义》等小说和历史著作阅读。1903年，18岁的董必武赴黄州府应试，考中秀才。但是在参加科举考试中，他亲身感受到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官僚的反动腐朽，决心同“求取功名做官”的道路决裂，乡试前断然弃考回乡，在黄安县城一所高等小学任教。为了进一步深造，1905年春，董必武再次来到武昌，考入省文普通中学堂，10月入学，学制5年。在等待入学期间，他租住在武昌

司衙巷一间私人小屋里。那时，距司衙巷不远的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阅报室，就成了董必武为寻求新知识每天必去的场所。

董必武在这里结识了著名革命党人刘静庵等人，阅读了大量宣传反满革命的书刊，萌发了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民主主义思想。因此，董必武十分崇敬刘静庵，后来常以刘静庵为自己革命思想的启蒙老师。

1910年10月，董必武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本想继续攻读，但因家庭经济困难，只得应了黄州府中学堂校长邀请，回乡担任该校英文教员。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正在黄州府教书的董必武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无比激动，愤然割断头上的辫子，连

夜赶赴武昌起义的前线，参加推翻清王朝、保卫临时革命军政府的激烈战斗。同年，董必武加入同盟会。不久，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董必武忧国忧民，他怀着追求真理的愿望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学习。当他听说孙中山在日本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即怀着敬仰之心去谒见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中华革命党，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

从辛亥革命到护法战争，孙中山领导的斗争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董必武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他在思考着，努力探求革命道路。

正当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苦斗、先进分子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2月，董必武到上海后，正当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上海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期刊、杂志如雨后春笋。3月，湖北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旅沪同乡公推董必武和张国恩驻会主持会务。此时，董必武结识了李汉俊。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1918年年底由日本帝国大学土木系毕业回国，带回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日文书籍。李汉俊住所与湖北善后公会隔街相望，他几乎每天来公会，与董必武、张国恩、詹大悲交谈，热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and 苏俄的近况，并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在日本出版的介绍新思潮的新书刊推荐给他们看。董必武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所有找得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他们4人几乎天天见面，共同学习，互相讨论，积极赞成以《新青年》为代



董必武（1886～1975年）

表的新文化运动，深入研究中俄两国革命道路的问题，反复探讨：“为什么俄国的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中国的革命却不断地失败？”1919年夏天，董必武与张国恩、詹大悲等人由于经济上缺乏接济，生活异常清贫，为购买新书和维持生活，将蚊帐甚至身穿的布衫都典当当了，有时仅剩下一条裤子和一件汗衫，只好把裤子每晚洗了次日再穿，长衫几人共用一件，谁外出由谁穿。但他们从不把这类生活上的事放在心上。

在上海，董必武经历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深刻感受到群众运动的极大威力。他认识到，今后的世界，将变成劳工的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将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董必武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考虑问题，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

的道路，必须像俄国那样实行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革命。他总结孙中山领导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在于：不依靠工农而总是依靠军阀的路子不对头，缺乏广大群众的基础。董必武认为中国的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革命党人要唤醒民众起来参加革命。因此，董必武决心从头来，接近民众，唤醒民众，打下革命的群众基础。他同李汉俊、詹大悲、张国恩商议，确定当前应当做两件事：一是办报纸向人民大众宣传革命，二是办学校以培养革命干部。

1919年8月，董必武、张国恩返回武汉，拟办一个专为宣传革命思想的《江汉日报》，并积极筹集办报资金，但终因筹款无着落，计划夭折。接着，董必武和张国恩、陈潭秋着手筹办学校。他们联合几位进步教师办学，校址就选定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涵三宫街南面小巷内的前清支郡师范甲丙堂旧址，开办经费全在创办人中募集。董必武因手中无积蓄，便将身上穿的一件皮袍子

典当了，又写信向在山西当排长的表弟张醉华借了一点钱，凑足了他作为创办人捐赠的20元开办费。经过大家数月努力，1920年3月，私立武汉中学终于筹备就绪，正式开学。第一学期有两个班，共100多名学生。

武汉中学是为革命而办的，一开始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董必武团结所有进步教师，大胆创新，用革命的方法组织教学。学生的报考费和学费低于其他学校，便于贫苦子弟入学；男女生同校同班；国文教学文言、白话兼用，准许学生用白话文考试；设班主任，辅导学生自习和课外阅读；引导学生注意国内外时事，研究社会问题；组织学生会参与学校的校务领导等。为了克服学校经费上的困难，董必武带头不支薪，其他教职员也都是低薪或不支薪。全校只用校工一人，由董必武的外甥张培鑫担任，既是文书，又是收发员、事务员。许多校务劳动，师生一齐动手。这些做法，开启了湖北教育改革的先声。这所新型的学校吸引了鄂、豫、湘数县的工农子弟和进步青年前来求学，培养出一批革命人才。

董必武担任国文教学，除在课堂上注意对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教育外，还经常选用杂志上的白话文为教材，宣传新思想，指导学生会主办《武汉中学周刊》，编写《政治问答》读本，让学生交流读书心得，议论时事政治，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



私立武汉中学旧址

章。特别是1920年8月董必武、陈潭秋等建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后，他们更加有意识地学习俄国革命，武汉中学成为武汉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小组成员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约他们在武汉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领导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董必武当即约陈潭秋商量建党的问题，热切盼望中国实现俄国那样的“工人之国”的陈潭秋亦热烈赞同。他们两人进行了初步酝酿，然后又找包惠僧、张国恩作进一步酝酿。

这时，在上海入党的刘伯垂受陈独秀委派回到武汉组党。刘伯垂带来了一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和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他到武昌后，分别找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四人商议酝酿，取得一致意见，由他们五个人发起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刘伯垂还按照陈独秀的意见，找了文华大学校工郑凯卿，郑也表示愿意参加。

1920年8月，董必武和张国恩在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的寓所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刘伯垂、包惠僧、陈潭秋、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刘伯垂主持会议，首先介绍了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的情况，然后讨论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董必武、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等一致同意在武汉建立中共早期党组织，党组织建立后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加强党在工人中的工作。会议还讨论了党组织的生活制度，规定每周开会学习一次，每次会议由专人作读书报告或国内外形势报告。这次会议标志着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

最初建立的6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标志着武汉先进知识分子经过长期艰苦探索，终于迈向无产阶级道路。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董必武与陈潭秋等又建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把他们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董必武经常去讲课，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教育青年把学习理论与从事革命活动结合起来，要求青年学生经常到工人区去走访，了解工人的现状，支持工人的斗争。

为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向工人群众通俗宣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董必武和武汉党组织成员还分别办起了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平民夜校、工人子弟学校和识字班等，董必武亲自到平民夜校给工人群众讲课，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动他们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党组织成员和青年团员还通过学生的家长，在工人中进行串连发动、组织工会，逐步发展武汉的工人运动。

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被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推举为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的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以后，董必武把自己的一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邓正兵：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谢忱、刘佳欣：江汉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

党的创立时期武汉地区党员考证

◇ 孙 勖

武汉是最早成立中共早期组织的城市之一。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等在武昌秘密成立共产党武汉支部。从1920年下半年到1923年年底，即党的一大到三大前后，武汉地区的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中央也曾向武汉地区党组织派遣过干部。长期以来，由于史料相对匮乏，发掘难度较大，对这段时期内武汉地区有多少党员活动，都是谁，依据是什么等问题，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1922年，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报告时曾提及：“去年（一九二一）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余人，现有党员人数计……湖北二十人。”但到中共三大召开后，在党的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湖北区委员的报告中，没有任何关于党员人数的信息。至于武汉地区的党员数量，更是无踪可寻。

现在，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整理和研究的逐步深入，加上省、市编著的党的组织史、革命史著作相继问世，对党的创立时期武汉地区党员的认知度有了一定提升。本文拟择取权威资料，对党的创立时期（1920年下半年到1923年）在武汉参与早期党组织创建或入党，以及被党派到武汉来主持党务工作的党员予以考证。

1. 刘伯垂

刘伯垂是武汉地区的第一个共产党员。1920年夏秋之交时，刘伯垂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加入了党的早期组织，然后被派回武汉筹建党组织。包惠僧回忆：“同年夏秋之交，刘伯垂由广州过上海回武汉，他在上海同陈独秀会谈了几次，陈独秀即吸收刘伯垂入党，并派他到武汉发展组织，介绍郑凯卿（文华书院的工友，是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到



刘伯垂（1887～1936年）

武汉讲演时结识的）和我做他的助手。刘伯垂回到武汉，即找董必武、张国恩（他不久就脱离了）、陈潭秋、郑凯卿、赵子俊、包晦生（包惠僧）、赵子健等商谈，都同意加入共产党，即以上述这几个人为基础成立武汉临时支部。”

2. 董必武

董必武既是辛亥革命元老，也是武汉地区最早接触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是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创立者。1920年秋，在董必武、张国恩的住所召开了成立武汉共产党组织的会议。董必武本人回忆：“武汉中学开学后，到秋天，上海的李汉俊、刘伯垂征求我与梅先的意见，搞共产主义运动。我与潭秋谈搞共产主义小组，找了包慧生（即包惠僧）、梅先（即张国恩）、赵子健……我的思想转变是1919年在申（即上海），北方李大钊文章有影响。1920年加入党组织，介绍者为李汉俊、刘伯垂两人……组党是1920年，武汉中学头一年，在上海的李汉俊等谈的。”包惠僧回

忆：“约在一九二零年九月中旬，刘伯垂……便和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创立了中共武汉临时支部。支部第一次会议是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寓内举行的。在这次会议中，阅读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刘伯垂报告了党的上海早期组织的相关内容，最后选出支部书记，并决定租定武昌山前多公祠五号为机关部。”

3. 包惠僧

包惠僧在1920年2月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两次访问在武昌文华书院讲演的陈独秀，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同年秋，刘伯垂从上海来汉，给包惠僧带来了陈独秀的信，并吸纳他入党。武汉地区党组织成立后，包惠僧还被选举为第一任支部书记。包惠僧回忆：“约在一九二零年九月中旬，刘伯垂到大关帝庙十二号来看我并带来陈独秀给我的一封信，我们谈了很久，吸收我参加了党。不久，他便和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创立了中共武汉临时支部。”“武汉支部于一九二零年九十月间成立，我是第一任支部书记。机关设在多公祠五号，这里是刘伯垂律师的事务所，门口还挂着他的牌子。刘伯垂是陈独秀留日时相识的，在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入党。陈叫他回武汉发展组织，成立支部。他回武汉后，就介绍我入党。”

4. 陈潭秋

1919年夏季，陈潭秋在上海结识了董必武。1920年3月，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陈潭秋受聘任英文教师。五四运动后，经过认真学习思考，陈潭秋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0年秋，陈潭秋应董必武邀请筹建共产党组织，出席了武汉共产党支部的成立会议，日后在武汉地区党组织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董必武回忆：“我与潭秋谈搞共产主义小组……组党先与他（即陈潭秋），

他同意。陈一参加党,拼命干,湖北党的建立,主要是他(即陈潭秋)、我到处奔走。我有点火作用,潭秋把火搞大了。陈在党组织建设中起了作用。‘二七’前后,发展党的工作,潭秋是主要的。”“那时,武汉中学成为湖北共产党的中心……在创建湖北党支部的五个人中,有三个人离开了党,一个成为自由职业者,一个现在在南京,一个现在在汉口当律师。只有陈潭秋和我坚持信仰。”

5. 李汉俊

李汉俊是上海地区党组织的创建者,中共一大代表,也是董必武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并协助创建了武汉地区党组织。1922年春,李汉俊由上海到武汉,参加了武昌S.Y.妇女运动、社会教育委员会的工作。1922年3月20日,中共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包惠僧致国昌信中写道:“弟明日或可进报馆去住,以后来信,可寄汉口商场督办处李汉俊转交。”



包惠僧(1894~1979年)

6. 张国恩

1919年春,张国恩在上海与董必武同住时,就在李汉俊的帮助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了解俄国革命的信息。董必武回忆:“这时湖北旅沪学生成立了善后协会。我与张梅先(即张国恩)住此机关……李汉俊住路北,我们住斜对面路南……我们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先看了些无政府主义的书。从李汉俊那里知道许多俄国的消息。看《资本论入门》和考茨基的书。”1920年3月,张国恩参与武汉中学创办工作。1920年夏,张国恩应李汉俊函约,参与董必武酝酿筹建共产党组织的活动。《鲍庆香致胡冥阶的信》中提到:“C.P.事,楚屏已同汉俊讲过,他极端的欢喜,他说可就近同必武、眉宣两君商量。”同年秋,张国恩出席武汉共产党支部成立会议。董必武回忆:“我们照俄国革命办法搞,与北京联系。李汉俊来信,介绍张国恩入党,我同意。”

7. 郑凯卿

1920年2月,郑凯卿在武昌文华书院当校工,结识了当时在书院讲学的陈独秀,在与陈的谈话中深受影响。同年秋,陈独秀嘱咐刘伯垂到汉后要联系郑凯卿,郑因此出席武汉共产党支部成立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第一名工人党员。包惠僧回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在党纲草案中已经规定下来了……但是在武汉支部初期,党对工人运动是比较陌生的,同志中只有郑凯卿一个人是工人出身。”

8. 赵子健

赵子健1920年年初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即在武汉中学任教。据董必武、包惠僧回忆,同年秋,赵子健加入武汉共产党支部。

9. 黄负生

1917到1922年,黄负生先后在中华大学中学部、汉口致忠中学、湖北女子师范等校任教,宣传进步思想,并与恽代英一起组织进步社团互助会。1921年秋,黄负生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宣传委员。包惠僧回忆:“1921年,在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秋末,我奉中央之命,第二次回武汉区工作,我同陈潭秋同志、黄负生同志当选为区党委,分工:包惠僧任书记,黄负生任宣传工作,陈潭秋同志任组织工作。设机关部于武昌黄土坡16号。”李书渠回忆:“一九二一年秋,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不久,武汉党区委员会也成立了。除原共产主义小组的人外,加了黄负生等人,由陈潭秋任书记。”

10. 刘子通

刘子通早年是日知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1921年秋,刘子通在湖北女师任国语教师期间,经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袁溥之回忆:“刘子通早年是武昌革命团体日知会会员,从事推翻清政府的斗争。辛亥革命后,他曾在黄冈军政分府任职,后与黎元洪派发生冲突,去职后从事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入了党,宣传革命思想。”包惠僧回忆:“一九二一年初冬,我奉派回武汉主持党务……当时武汉机关部在武昌黄土坡二十五号楼上,住在机关内的有陈潭秋、陈荫林、刘子通、黄负生夫妇及我。《武汉星期评论》的编辑部就在此处,是刘子通、黄负生负责。”

11. 赵子俊

赵子俊是武昌平湖门外纱局失业工人。1920年秋,由郑凯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包惠僧回忆:“赵子俊是个失业工人,生活很苦,后来由党介绍他进黄埔军校第一期,



陈潭秋(1896~1943年)

毕业后干军事工作,不知所终。”李书渠回忆:“发展党员,以知识分子较多,工农分子较少……还有一个赵某(名字记不起了),武昌平湖门外纱局失业工人,是郑凯卿介绍的,因赵一直不能开展工作,而生活要组织维持,二二年由包惠僧介绍到广州参军,以后下落不明。”包和李的回忆相互比照,可以推断出李书渠所说的“赵某”就是赵子俊。但李所说赵子俊去广州参军的时间疑有误。1924年5月赵子俊才由党组织介绍进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生第2队学员。

12. 李书渠(李伯刚)

李书渠,又名李伯刚,是恽代英发起组织的进步社团利群书社的主要成员,并主持书社日常营业工作。1921年秋,由包惠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初夏后任中共武汉地方兼区委宣传委员。李书渠本人回忆:“一九二一年秋,包惠僧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在徐家棚开办粤汉铁路工人补习

学校。”“……接着组织利群书社的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刘光国和我入党。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间，一度改推刘昌群任书记，陈潭秋搞组织，我搞宣传。”在《张绍康致和森信——关于武汉S.Y.工作情况》（1922年11月20日）中明确提到：“因为自六月迄今，工学潮纷至沓[沓]来，努力运动的人，不上一打（如育南、昌群、书渠、潭秋、何恐、求实、白昊、德隆、卢斌），且完全是C.P.分子。”（该资料中还提到下文所述党员，不再重复引证）

13. 林育南

林育南是五四运动时武汉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与恽代英一起参与创建进步社团利群书社、共存社。1921年冬，林育南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联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2月2日大会闭幕，林育南在归国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包惠僧回忆：“一直到一九二一年冬天，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针对华盛顿举行的太平洋会议而在伊尔库茨克举行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我们吸收利群书店的分子林育南为武汉学生的代表出席远东弱小民族会议（中国代表团是张国焘任团长），林育南从伊尔库茨克回来以后，才加入共产党，这是一九二二年春天的事。”

14. 林育英

林育英是林育南的堂兄。1921年7月，林育英加入共存社；1922年春，由林育南、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工作。林育英本人于1938年在延安填写的《党员登记表》上写明：“1922年2月由林育南、恽代英介绍入党。”

15. 项德隆（项英）

1921年，项德隆是武昌模范大工厂织

布工人。同年10月到12月间，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参加工作，但没有脱产。12月被派往江岸筹备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1922年1月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任秘书。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本人回忆：“粤汉路发生一个罢工，以及由施洋（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以后加入党，在二七事件中被军阀枪毙牺牲）所领导的最有名的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的罢工，反抗法资本家和法巡捕，结果胜利，成为武汉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这时我经朋友的介绍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但未脱离生产，仍在工厂做工，以进行工会工作。一九二一年陇海路罢工胜利影响了京汉路（即现在平汉路）的工人，要求组织工会（主要由党的发动），京汉路南段汉口江岸机车工人请求劳动组合书记部派人领导他们，于是党派我到京汉路江岸去做工会秘书，来指导和帮助他们组织工会，同时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包惠僧回忆：“我们在一起工作了约近四个多月的光景，我就介绍他入党，他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是在一九二二年三四月间。”

16. 许白昊

许白昊原为杭州电机绸缎厂机修匠，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1年冬，许白昊被推举出席在苏联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许白昊被党派往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到党的二大召开前，许白昊一直在汉从事工运领导工作。项英回忆：“到下半年第三国际召集远东被压迫民族的代表会议，白昊同志被推为代表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白昊同志参加会议后，更引起他对于革命运动的热忱与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信仰，而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六月，白昊同志遂被

党派至武汉工作，当他到了武汉的时候，正值汉阳钢铁厂为组织工会，被厂主与军阀肖耀南勾结，将工会用武力封闭而激起群众罢工，以表示反抗。白昊同志遂积极参加这次指导罢工的工作，颇得着全体工人的信仰，不久罢工完全胜利，工会恢复后，由群众推选为工会秘书。”

17. 刘昌群

刘昌群是武昌中华大学毕业生。1921年12月，他参加发起成立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底，刘昌群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刘昌群致国昌信——关于派张绍康出席广州大会的原因》（1922年5月29日）中明确提到：“候一两天内张君返鄂后，即请他加入（我现已加入‘本科’）。”信中打了引号的“本科”，经考证，系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员的暗语。

18. 施洋

从1919年起，施洋一直在武汉当律师。五四运动中，他积极支持爱国学生运动，被选为湖北各界联合会副会长和赴京请愿团团长。1921年12月到1922年1月，施洋担任汉口人力车夫工会和江岸江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法律顾问，1922年夏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包惠僧回忆：“约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中，许白昊、项英两同志提出介绍施洋入党。第一次在区委会没有通过，陈潭秋还说他政客的气息很重，有风头主义的毛病……因他与刘伯垂同行，我就问刘伯垂意见，刘伯垂说：‘只要他革命，政客气息与风头主义何害？我们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学究，怕那些干什么呢？我同意他加入我们的党。’我也同意刘伯垂的意见，在第二次提出区委会讨论，才通过他入党。”《施伯高传》中记载：“1922年……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成了工人阶级作战的参谋部，很得

工人的信赖了，伯高是武汉劳动运动的一个打头阵的急先锋，同时也可说是一个最富于谋略的司令者。他此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很忠实有力的共产党员。”

19. 李求实

李求实早年是进步学生，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到1921年，李求实追随恽代英，先后加入了进步社团利群书社和共存社。1922年春末，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李求实传》记载：“一九二一年秋，求实随代英到四川泸州师范附读，因闹学潮，一九二二年初回到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表示革命的决心，改名为李求实。”

20. 张绍康

张绍康是武昌中华大学学生，1922年4月在武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即被派往广州出席团中央大会。后因出席大会的代表必须具有党员身份，团武汉地委复信回答团中央关于张绍康代表资格的诘问。《刘昌群致国昌信——关于派张绍康出席广州大会的原因》中称：“此次武汉S.Y.派非‘本科’学生张绍康代表出席……本定介绍他加入‘本科’，因时间仓促，没有介绍他加入。先期因谭秋知会中孚过。你们考察的结果，既以为他可以升入‘本科’，我们前已认为他很可靠，当然没有异议。昨日‘本科’开会，已正式通过。候一两天内张君返鄂后，即请他加入（我现已加入‘本科’）。”

21. 卢斌（陆沉）

1920年，卢斌加入进步社团利群书社，1921年加入共存社。1922年春，卢斌在武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具体入党时间不明。包惠僧回忆：“林育南从伊尔库茨克回来以后，才加入共产党，这是一九二二年春天的事。接着恽代英、

芦斌、李书渠、李求实等都加入了共产党，这是后话。”结合《张绍康致和森信——关于武汉 S.Y. 工作情况》（1922 年 11 月 20 日）证明，卢斌入党的时间不晚于 1922 年 11 月。

22. 孙瑞贤

孙瑞贤是粤汉铁路徐家棚总段机务厂监工孙镜芳之子，汉口私立致公中学学生。黄负生、李书渠通过孙瑞贤，结识了孙镜芳弟弟孙叠芳（孙叠芳是机务厂工匠，在工人中颇具威信）。在孙镜芳、孙叠芳、孙瑞贤的支持下，徐家棚工人补习学校于 1922 年秋成立，孙瑞贤任算术教员。孙瑞贤入党时间大致在徐家棚工人补习学校成立前后，具体时间不明。李书渠回忆：“我到徐家棚去办粤汉铁路工人补习学校，通过我的学生孙瑞贤的关系（他的父亲孙镜芳是粤汉铁路徐家棚工厂监工），取得工作上的便利，因而他被吸收入党。”

23. 何恐

1917 年 12 月底，何恐考入湖北省外国语专科学校，思想进步。五四运动中，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被选为学生代表团成员。1922 年 7 月，何恐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伍修权回忆：“……陈潭秋同志亲自做我的入团介绍人。1923 年冬，他同武汉党组织负责青年团工作的何恐同志一起，主持了我们的入团仪式。”

24. 李之龙

李之龙原是烟台海军学校学生。1921 年 6 月，因组织校工和水兵学生罢航抗议当局克扣军饷，被海军学校开除。同年夏秋时结识董必武、陈潭秋，并来到武汉参加革命活动，在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 S.Y. 四月九日第七次大会报告——介绍新团员及改选各委员会委员长情况》（1922 年 4 月 9 日）

中提到：“‘五·五’广州大会共推李之龙出席（他此刻已到上海），提案推林育南、董贤珏、刘昌群筹集起草。（注：李因故未赴会，由张绍康代）”“五·五广州大会”即 1922 年 5 月 5 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规定，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必须具有中共党员身份，因此可证明当时李之龙已是中共党员。

25. 刘光国

刘光国于 1914 年到武昌求学，是中华大学中学部学生，辅仁社、利群书社成员。刘光国不晚于 1922 年 4 月加入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不晚于 1922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春光致 × × × 信——关于团湖北区成立情况和对 C.P. 中央的意见改选分工及文件收到情况》（1922 年 12 月 20 日）提到：“再有一点不同，就是执行委员五人，候补三人，委员长光国，余四人系（我）、德隆、求实、东洋；候补——育南、白昊、卢斌，皆是 C.P. 分子。”证明当时刘光国已是中共党员。

26. 林祥谦

林祥谦早在 1912 年就通过技工考试进入京汉铁路江岸机厂当钳工，因与工友共同开展过小规模罢工斗争，在工人中素有威望。1921 年 12 月，林祥谦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会议，并作为发起人之一筹备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1922 年 1 月，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林祥谦被选为干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书渠回忆：“二七前，江岸是党小组，负责人是项德隆（项英），项是包惠僧介绍入党，林祥谦、施洋是二七前入党的。”

27. 周天元

周天元在 1919 年考进京汉铁路江岸机厂做木工。在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

第二次筹备会上，周天元被推为俱乐部庶务干事。1923年，周天元经项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书渠回忆：“周天元是江岸工人，‘二七’前入党，‘二七’后失业……九一八事变后，因宣传抗日被国民党枪毙。”

28. 向忠发

向忠发早在1921年就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冶萍公司工会的副委员长，在工人中颇具声望。但关于其入党的时间，却有几种说法。最普遍的一种是称其在1922年入党，但没有任何原始史料和当事人回忆为依据。第二种称其在1921年入党。向忠发叛变后的供述，被敌人编辑为《前共党中委向忠发的履历自述》，发表在敌刊《转变》上。《自述》中供称：“我入共党的经过是在汉冶萍公司工会，担任工会付委员长时（一九二一年）由许白豪（此人已死）介绍加入C.P。”但现在有部分研究者怀疑此《自述》为敌人伪造。第三种是称其在1924年入党。罗章龙在《中共党史上的向忠发及其集团》中称：“一九二四年，向看到工人运动渐渐抬头，他摇身一变，想加入革命队伍……过了一个时候，他请林育南替他说话，育南不理。他有一个熟人同乡包惠僧……向又请包惠僧替他说话，包从多方运动支部，最后勉强通过。作候补党员。”

29. 陈春和

陈春和早在1888年时就到汉阳钢铁厂当童工（时年12岁）。1920年与向忠发等在铁厂多次自发反抗工头的压迫，后为该厂轮驳水手。1922年夏，结识中共党员许白昊等人，参与筹建汉阳铁厂工团组织。1923年年初，经许白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武汉地区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同时，陈春和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并担任地方委员会委员长。

30. 黄格谦

黄格谦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系工运领导人，筹建汉阳兵工厂工会并任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纠察大队长。据吴绍云回忆：“我叫吴绍云……一九二四年由项英、周伯敏、黄格谦三同志介绍入党。”证明黄格谦在1924年之前已经入党。同时，黄格谦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并担任组长。

31. 叶云卿

叶云卿是早期工人党员。《C.P. 鄂区谈话会记录》（1923年12月17日）中提到：“次由白昊同志解释书渠同志的几封信。再由叶云卿同志报告……”《恽代英召集临时会议笔记——关于处理育南同志南京代表一案》（1924年1月20日—22日）中也提到：“因当日白昊、书渠、彦彬及徐家棚工人同志均到，便于质证，故提及此事。由工人同志叶云卿说明……”可证明叶云卿当时为中共党员。

32-34. 胡云卿、柯瑞三、柯先发

胡云卿、柯瑞三、柯先发个人经历不明。《恽代英召集临时会议笔记——关于处理育南同志南京代表一案》（1924年1月20日—22日）中记载：“到会人数：柯瑞三、叶云卿、胡云卿……惠僧、白昊两同志迟到，瑞三、叶云卿、胡云卿……早退。”《S.Y. 区委员会记录》中记载：“书渠报告，受区委赴徐参加会议，找胡、叶、柯、廖、杜、柯，……先谈工会情形，后谈及C.P.情形。”“胡”即是胡云卿，出现的两次“柯”应是指柯瑞三、柯先发两人。可参加“谈及C.P.情形”的会议，证明三人当时应为中共党员。

35. 唐继盛

唐继盛是中华大学中学部八班学生，参加过日新社、健学社、共存社。毕业后任

黄陂东乡亲平小学校教员，据《恽代英日记》记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据《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武汉 S.Y. 全体名单》记载，唐继盛还加入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学生运动委员会和社会教育委员会。后来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生。

36. 丁勒生

丁勒生个人经历不明。《恽代英召集临时会议笔记——关于处理育南同志南京代表一案》（1924年1月20日—22日）中记载：“书渠同志发言——我当时在 C.P. 提有办法，谓当由育南同志到徐埠道歉。丁勒生同志说这应因而不承认大会的议决案。白昊同志只反驳勒生同志，并未对我加以反驳。后即决议移交 S.Y.”表明丁勒生当时为中共党员，有资格参加党的会议。

37. 蔡以忱

蔡以忱在 1915 年以绩优分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时，作为骨干，他参与组织发动了武汉地区的学潮。毕业后，相继在一师附小与中华大学任教。蔡以忱的长兄蔡极忱早年与董必武一起参加武昌起义，并结下深厚情谊。在董必武的影响下，蔡以忱也积极投身大革命，于 1923 年或 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38. 梅东洋

梅东洋个人经历不明，不晚于 1922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春光致 × × × 信——关于团湖北区成立情况和对 C.P. 中央的意见改选分工及文件收到情况》（1922 年 12 月 20 日）中有记载（参见“25. 刘光国”），证明梅东洋当时为中共党员。到 1923 年 5 月，梅东洋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正式团员。

39. 马哲民

马哲民即马念一。根据其自述，1921

年经李汉俊介绍加入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他改名为马念一以表示自己的新生。1922 年，马哲民经陈潭秋、刘子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恽代英召集临时会议笔记——关于处理育南同志南京代表一案》（1924 年 1 月 20 日—22 日）中提到：“马念一同志发言——叶云卿同志此次所言，与 C.P. 开会时报告的不同……”证明马哲民当时已经是中共党员，有资格参加党的会议，知晓他人在党的会议上的发言内容。

40. 廖乾五

廖乾五于 1920 年在湖北省军政府交通部长熊晋槐家当家庭教师。1921 年 8 月，经包惠僧、李汉俊介绍，廖乾五同施洋等人参加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次年，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 2 月初，廖乾五和项英、许白昊、陈潭秋、施洋、李之龙等领导了汉口江岸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1924 年 4 月，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进行改选后，廖乾五任汉口地委委员。

41. 陈天

陈天在二七大罢工时是汉口扬子机器厂工人，他从事工会活动较早，颇为武汉工人们所信赖，时任湖北工团联合会委员长。其具体入党时间不明，但肯定早于 1923 年 11 月。《中央局报告》（1923 年 11 月）中记载：“（七）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张绍康、陈天党籍问题……张绍康、陈天均已登报脱离，亦应开除”，说明陈天之前是中共党员。

42. 张子余（张子余）

张子余本名张子余，因“子”“子”二字极易被他人误认混淆，在革命历史文件和有关当事人回忆中，多以“张子余”出现。张子余 1915 年在武昌高师毕业，后

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19年年初毕业后到汉口，应留日同学徐秋平之约到《湖广新报》任主笔。1921年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后改为武汉分部）成立，张子余作为领导成员之一，参与领导武昌徐家棚铁路工人、汉口人力车工人、汉阳钢铁厂工人的罢工斗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书渠回忆：“还有一个《湖广新报》，是一个日本人办的报纸，主编张子余参加过辛亥革命，同施洋认识……他常把比较重要的工运、学运的消息破例登在第一版，并发表支援评论。‘二七’前夕被吸收入党。”

43-45. 周无为、郭寄生、郭聘伯

周无为是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所办《真报》编辑，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斗争。郭寄生是共进会员，武昌起义时，任季雨霖部庶务科长。护法战争时任李书城护法军总司令部秘书。二七大罢工时，也是《真报》编辑。《真报》被反动军警查封后，周无为、郭寄生被迫逃离武汉。两人入党时间不明。郭聘伯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斗争。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提到：“在政治上极力进行反直系大运动。这些不是一时可以成功的，因此一部分同志（周无为、张子余、郭平伯、郭寄生、陈天等）发生自由行动，不服从党的命令，自动到奉天民党等处求援”，据此推断，郭聘伯应跟随遭湖北军阀通缉的《真报》成员去沈阳张作霖处寻求支持。《中央局报告》（1923年11月）中记载：“（七）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张绍康、陈天党籍问题……讨论的结果：……第（七）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四人执行大会决议，开除党籍”，证明1923年11月前，三人均是中共党员。

46-50. 杨子烈、夏之栩、徐全直、陈媿兰、庄有义

杨子烈、夏之栩、徐全直、陈媿兰、庄有义是著名的湖北女师学潮“五女杰”。因为在学潮斗争中表现坚定，她们在1922年5月被吸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刘昌群致秋人信——关于十三日全体团员会议情况》（1922年5月16日）中记录：“十三日全体会议加入新团员：袁之英君，杨子烈女士，丁仲松女士，袁溥女士，夏之栩女士，陈媿兰女士，庄子道女士，李革女士，吴勇女士，共九位。”这份名单里没有提到徐全直。不过，陈媿兰回忆五人是一起入团的：“迄至1922年4月，由于我们五人在学校继续斗争的过程中，表现了异常英勇的姿态和行动，因而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二位负责人，林育南和刘昌群等介绍我们五人一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胡彦彬关于武昌S.Y.工作总报告——成立日期、略史、团员名单及组织、宣传等工作情况》（1923年7月）中，徐全直出现在“三、团员”的下属表格“[b]姓名”中，被标明“现在服务之地点 北京”。

1923年2月前，五人又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在具体时间上，不同当事人的回忆有所冲突。夏之栩在接受访问时回忆：“‘二七’罢工前我们就转党了。共五个人：我、徐全直、杨子烈、陈媿兰、庄有义。”当访问者提及“杨子烈说她自己一人是1922年秋天转党的”，夏之栩反驳：“吹牛，明明是我们五人在‘二七’前夕一起转党，她为什么会先转党？吹牛！”而陈媿兰回忆：“在1922年10月的一个晚上，陈潭秋约我们五人在西川湖五号夏之栩的家里谈话，他这次的态度特别严肃，他说：‘我今天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和你们谈谈：我对你

们在过去一年半以来的表现，尤其是在近一年来的学潮中你们的那种勇敢和牺牲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使我异常感动和钦佩；你们的这种思想和行动，完全是革命的。所以在今年的春季你们已决定为革命事业服务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现在我想介绍你们加入党，以便进一步地受到党的教育和领导；同时也是对你们表示更大的希望，不知道你们的意见如何？’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他说：‘只是我们还很幼稚，如果认为我们够资格入党，那是最高兴没有的事，我们本来早就愿意献身于这一伟大的事业。’他接着说：‘那很好，我再找一位同志和我一同介绍你们入党好了。’”

51. 秦怡君

秦怡君原名陈凤仙，十五六岁时为逃婚从乡下跑到武汉，先后在日资隆茂棉花厂、德资和记蛋厂、英美烟厂做工。1922年积极参加党领导的罢工运动，当选为英美烟厂罢工委员会委员。1923年4月，由林育南、许白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武汉第一个女工人党员。秦怡君本人回忆：

“一九二三年四月，林育南和许白昊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我是工人，入党没有候补期。当时党处在极端秘密的时代，入党的仪式是简单的。用红纸剪了一面红旗贴在墙上，向红旗举手宣誓，由介绍人之一领读誓词：‘永远忠于党，服从党的纪律，坚守党的秘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视死如归。’”

52. 李隆邛（李立三）

李立三在二七惨案后，调至中共武汉区委书记。李立三自填《干部登记表》的履历中写明：“1923年3月至1924年1月汉口任武汉区委书记”。《C.P.鄂区谈话会记录》（1923年12月17日）中也记

载：“能至同志说，当育南同志去南京时，他是负C.P.区委会委员长之责，育南同志去南京的路费是刘昌群同志寄来的……”证明李立三当时确实是武汉地区党组织负责人。

53. 刘季良

刘季良于1920年从武昌高等师范毕业，之后在武昌附小任教。同年，他结识了陈独秀和董必武，思想逐渐倾向共产主义，并积极在教学活动中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1923年，刘季良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季良事略》中记载：“刘君季良，湖北黄冈人，毕业于武昌师范大学，任武昌附小教职有年。民国十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国民党。在北伐军未到达武汉之前，即为共产党努力工作。”《刘季良事略》依据的是在上海的中央济难会于1929年编印的《牺牲》原文，可证明刘季良于1923年入党。

54. 许凌青

许凌青学名许鸿，于1921年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作为进步学生，他发动组织武汉学生联合会，并与董必武、李汉俊、陈潭秋、恽代英等人成立马克思学术研究会。1922年9月，许凌青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武汉团组织干事会第一干部书记、武汉青年学会执行委员会事务股委员。同年，在武昌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许凌青本人回忆：“我是1922年在武昌承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入党的。”

55. 胡彦彬（胡伊默）

胡彦彬，后改名胡伊默，1922年由中华大学附中升入中华大学经济系学习。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武汉青年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兼图书股委员。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昌群致国昌信》（1923年7月）中提到：“武昌地方因委

员长何恐之出席学联总会为湖北理事，现委员长由胡彦彬（C.P.）同志担任，胡兄系中华大学学生……”证明胡彦彬入党的时间应不晚于1923年7月。

56. 任开国

任开国于1920年来到武昌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校学习期间，任开国结识了武昌中华大学的著名青年领袖恽代英、学生领袖林育南等，在思想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其入党时间，目前未找到党的文件或当事人回忆，但在任开国牺牲当天，一则《申报》的报道曾有所提及：“案据本部稽查队呈解共党任开国一名到部，讯据该犯供称，曾于二七运动加入共党，现充湖北共产党技术主任要职……”若此报道无误，则任开国入党的时间应该在1923年2月间。

57. 陈学渭

陈学渭1916年进入省立武昌启黄中学学习，加入过互助社。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陈潭秋等组织的武汉学生联合会。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黄冈中共党组织创始人。《书渠同志致C.P.武汉区委员会暨诸位同志们》（1923年12月17日）中提到：“……当时推举代表时，并有非徐地S.Y.团员C.P.候补党员陈学渭同志、刘念祖同志二人在座，目击此事……”证明当时陈学渭为中共候补党员。

58. 刘念祖

刘念祖于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为学生，具体就读学校、毕业后工作等情况不明。《书渠同志致C.P.武汉区委员会暨诸位同志们》（1923年12月17日）中提到了他，可见当时为中共候补党员。

59. 刘一华

刘一华具体情况不明。《育南给仁静、

安石、代英的报告（第四号）》（1923年11月19日）中提到：“徐埠组织，因C.P.鄂区将刘一华调开，无专人负责，颇为困难。”一周后的《育南给仁静、代英、仲海的报告（第五号）》（1923年11月27日）中又提到此事：“徐埠方面，原有一华同学在此工作，颇可先发展，不料一华被鄂C校区委调开，致工作不能积极进行。”证明刘一华当时是中共党员，且在被调离前组织关系在徐家棚小组。

除上述59人外，另有余世颂，根据《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卷中1923年秋冬到1924年春的多个文件内容，其在胡伊默辞去职务后，担任武汉地区团组织最高负责人。当时团组织的负责人和主要干部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但由于《汇集》中没有文件直接提到余世颂为党员或C.P.，又未找到其他档案材料或当事人的回忆、证言，所以余世颂当时是否为党员，暂存疑问。

综上所述，党的创立时期（截至1923年年底）在武汉地区创建党组织、入党以及在武汉地区党组织活动过的党员，可确定者有59人。

注：文中引用文件、资料、回忆主要来源为《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卷，以及当事人在解放后公开发表、出版的文章、回忆录。

（孙勤：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一处三级主任科员）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自身建设概况

◇ 刘桂芳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六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武汉地区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自身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重思想理论建设

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武汉时间比较短，并且武汉地区没有进行过如北京、上海那样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大的思想论战，多数早期组织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以党员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作为党的建设重点，大力推进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一）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董必武、陈潭秋等以其成员为骨干，成立了公开的革命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早期党员和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研究会会员的吸收主要是靠个人关系进行的，陈潭秋毕业于武昌高师，就负责吸收武昌高师方面的进步学生；包惠僧是一师毕业，就负责吸收一师方面的进步学生；刘子通在湖北省立女师教书，就负责在女师方面活动；武汉中学由董必武、陈潭秋负责活动。主要活动者是这几个学校的，其他如外国语专校、中华大学及一中的学生也有些接触。

研究会成员有20余人，主要是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黄负生、刘子通、施洋等。据包惠僧回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也不过二十多个人，会开的比较少，每次开会都是由我们轮流作读书报告或发给宣传品（如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的各种小册子），开会的地点都是在多公祠五号。”除组织党员积极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理论学习

外，陈潭秋、董必武等人还常在研究会上报告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体会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李大钊、李汉俊来汉时，也曾应邀在研究会上做过讲演。

通过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习、交流、讨论，武汉早期党员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也得到提高。党的一大后，武汉早期党组织在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注意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习，为党组织补充新鲜血液和开展群众性运动做了思想建设方面的准备。那些没有入党的研究会成员通过学习，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和共产主义教育，其中大多数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

（二）建立学习制度，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员的必修课

鉴于多数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党组织成立后，重点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惠僧回忆说：“当时，我们对于学习马

列主义知识是太少了，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我们主要的读物是《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杂志，李汉俊翻译的《资本论浅说》《共产党月刊》，考茨基著的《唯物史观》，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传略》

及关于巴枯林、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的著作及传记，大家都很喜欢读。”

为加强理论学习，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党组织还制定了学习制度。“党支部是每星期开会一次，有时是在抚院街董必武同志寓内，有时是在多公祠五号开，规定每次作工作报告或读书报告或国内外时事报告。”通过学习，成员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三）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刊物作为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前后，武汉地区先进知识分子翻译、撰写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早期党组织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提供了大量资料，创造了有利条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1920年6月，张冥飞编写的《劳农政府与中国》由汉口新文化共进社刊印，这是国内第一本全面系统地介绍苏俄情况的集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驻地——武昌多公祠5号

大成的著作。1920年9月,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经面世即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北京、湖南、武汉等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把它作为学习的必读教材。1921年1月,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由新青年社出版。《阶级争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考茨基对唯物史观的最新阐述。该书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分析中国现状、革命目的、革命手段等基本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促进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此外,恽代英还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家庭部分。1921年6月由田诚撰写、在汉口印行出版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是一本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最高水平的著作。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积极创办革命刊物,派出党团员担任一些报刊的编辑,对党员和广大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1921年春,武汉党组织将《武汉星期评论》改造成为党的机关刊物,使它在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想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董必武为该报撰写了很多批评时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陈潭秋不仅是刊物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主要编辑撰稿人。他在《武汉星期评论》上发表了《我对教职员联合会同仁的希望》《妇女运动:赶快组织“女界联合会”》《“五一”底略史》《快,起来啊!》等5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刘子通、肖楚女、林育南、李汉俊等也常为该刊撰写抨击时政、宣传新思想的文章,支持学生、工人以及妇女的解放运动,无情揭露和批判反动军阀的统治。

《武汉星期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改造、教育改革、妇女解放,不仅大大提高了早期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

平,而且在武汉地区特别是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建党初期武汉的战斗号角。

1922年10月,林育南等根据党的指示,创办了“以拥护劳苦工人及一切无产阶级之利益为天职”的《真报》。1922年年底,林育南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又创办了《劳动周报》(武汉)这一机关报,成为武汉、湖北工人阶级的喉舌。1922年11月,张绍康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S.Y.与C.P.共同的目标:占据舆论机关,已经有三家报馆是我们同志充当编辑,并且能够负完全责任,比我自己办的还妥当些,其外《学生会周刊》和《武汉星期评论》的编辑,又是完全在我们手里。”

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创办革命刊物具有明显效果,一方面,向工农群众和进步青年宣传了革命理论;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早期党组织成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加强组织建设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使党组织机构逐步健全、党员数量不断增多、党的力量由弱到强,初步形成严密、集权的组织体系。

(一)初步建立起党组织领导机构

武汉早期党组织从成立之时就建立了组织机构,明确了书记、机关驻地,对党员的政治活动也进行了规定。“第一次会议是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同志寓内开的,推定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经常驻机关部工作。张国恩管钱,租定武昌山前多公祠五号为机关部。”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后，党的建设有了更明确、更严格的规定。“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须依据左列诸原则：（一）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

1921年秋，武汉早期党组织按照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的规定，成立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直属中共中央管理，包惠僧任书记，陈潭秋为组织委员，黄负生为宣传委员，另设有财务委员。

1922年夏，武汉地方委员会扩大为中共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兼武汉区执行委员会。1923年春，武汉地委撤销，武汉区执行委员会除有区委委员、委员长外，还设有秘书、组织委员、教宣委员和劳动运动委员，区委组织领导机构得以初步建立。

（二）初步建立了党内制度

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后，初步形成了一些制度，包括学习制度、会议记录制度、文件管理制度等。例如，1923年12月17日《C.P. 鄂区谈话会记录》中，明确标明记录人为夏之栩。1923年12月9日《C.P. 区委员会移交林案于S.Y. 区委员会函》、1923年12月26日《C.P. 区委员答书渠同志函》中，有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包惠僧、秘书许白昊的签字。

（三）发展党员有严格的标准，注重发展工人党员

建党初期，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发展党员尤其是工人党员，是党的建设的一

个迫切任务。武汉早期党组织按照党的一大关于“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的决定，慎重、严格地按一定手续发展党员。

恽代英领导的利群书社是一个进步社团，党组织对其成员进行过多次考察，最终认定利群书社的人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适合发展入党。据包惠僧回忆：“临时中央曾有信给我，要我们吸收恽代英及他领导的利群书店的分子。我也去访问过他们，恽代英我也同他谈过，李书渠、廖焕星、芦斌（陆沉）、林育南等，我和刘伯垂、陈潭秋都直接、间接同他们接触过，但他们此刻热衷搞新村运动，办书店，注意个人自修，一个一个都象（像）一个清教徒似的不容易使人接近。我们认为恽代英及利群书店的分子是小心小眼，小手小脚，不满意现状，又怕革命，没有出息就放弃了。李汉俊来武昌，也到利群书店谈过，马迈耶夫同鲍立维来武昌也到利群书店参观过，终没有同他们联系上。”利群书社成员当时是比较进步的，而且上级党组织也有意发展他们，但是经过仔细考察，还是觉得不符合标准，没有吸收他们入党。1921年7月共存社成立后，其成员分别加入党组织。同年，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1年秋，武汉地方委员会在徐家棚粤汉铁路开展工作，利用了学生成分的孙瑞贤的社会关系。孙瑞贤原是汉口私立致公中学的学生，其父孙镜芳是厂长，叔叔孙叠芳是个工匠。党组织得到他们兄弟父子的支持，才在徐家棚筹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但在发展党员问题上，党组织坚持严格审查，仅吸收孙瑞贤一人入党，对其父不考虑，对其叔进行观察，最终也未吸收其入党。

施洋入党也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包惠僧回忆说：“约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中，许白

昊、项英两同志提出介绍施洋入党。第一次在区委会没有通过，陈潭秋还说他政客的气息很重，有风头主义的毛病，决定要我同他多谈两次话再讨论。我对施洋是有些了解，但他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我虽同他谈过几次，仍不敢遽作决断。因他与刘伯垂同行，我就问刘伯垂意见，刘伯垂说：‘只要他革命，政客气息与风头主义何害？我们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学究，怕那些干什么呢？我同意他加入我们的党。’我也同意刘伯垂的意见，在第二次区委会讨论，才通过他入党。”

杨德甫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在江岸区工人中有威望、影响大，但党组织始终没有吸收他入党。后来实践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发展工人党员是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大前，武汉党组织有5名工人党员：郑凯卿、赵子俊、项英、林育英、许白昊。1922年6月，党的二大提出要多吸收工人党员，务求居全数一半以上。根据中央多收工人党员的指示，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兼武汉区执行委员会陆续在铁路、铁厂、机器、轮驳工人中吸收了一批党员。据不完全统计，到1923年2月二七惨案前，新吸收的工人党员有京汉铁路的林祥谦、周天元、张联光，扬子机器厂的陈天，汉阳铁厂的向忠发、陈春和，粤汉铁路的叶云卿、胡云卿、柯瑞三、廖文清等人。

武汉地区大、中学校较多，因而知识分子很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早期党组织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武汉早期党组织在积极发展工人党员的同时，也大量吸收先进知识分子入党，如施洋、李求实、黄负生、林育南、廖乾五、刘昌群、夏之栩、徐全直、何恐、唐际盛等，这是武汉地区党的早期建设的一个特点。

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党组织也得到发展。1922年夏，武汉的党员增至20余人，武汉地方委员会因而扩大为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兼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建立了武昌组、汉口组、江岸组、汉阳组、徐家棚组等基层党组。1923年初春，党在武汉已经建有武昌、汉口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有党员50余人。到1925年9月，武汉共有党员99人、党支部11个。

纪律建设起步

党的二大强调：“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武汉早期党组织严格执行中央的这一精神，对于有违反党章规定行为的党员，严格执行纪律制裁。1923年秋，武汉区委对触犯党的纪律的党员执行纪律制裁，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张绍康、陈天等6人被开除出党，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刘桂芳：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一处处长）

暗夜播火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前后

◇ 宋 健

1920 年的一个秋日，位于武昌抚院街 97 号的董必武、张国恩寓所中，一个秘密会议悄然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 7 人。刘伯垂主持会议，报告了一个多月前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的经过和组织状况，与会者还学习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共产党纲领草案，明确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正式宣布成立共产党武汉支部。

刘伯垂是受陈独秀委派来武汉建党的，这位湖北籍律师早年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参加过辛亥革命，1918 年在广州护法军政府司法部工作，后来辞职，曾在广东《惟民周刊》任编辑，宣传社会主义和新文化。1920 年 6 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他经陈独秀介绍加入共产党，随即被派到武汉筹建党组织。他秘密带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起草的共产党纲领草案，还有陈独秀亲笔写给包惠僧的信件。据包惠僧回忆：“大约是一九二〇年九月中旬，刘伯垂到大关帝庙十二号来看我并带来陈独秀给我的一封信，

我们谈了很久，吸收我参加了党。不久，他便和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创立了中共武汉临时支部。”

也许是因为陈独秀亲笔写信给包惠僧的缘故，加上包惠僧是记者，外出联系工作方便，会议最终推选包惠僧担任武汉和湖北党组织的第一任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张国恩负责财务。会议规定党的组织生活“每星期开会一次”，主要是作读书报告和国内外时事报告。如此频繁地开会，选择什么地方建立党的机关，才能不引人注意呢？经过慎重考虑，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这次会议决定用刘伯垂从上海共产党组织带来的经费，租用武昌多公祠 5 号作为党的机关办公地址。它的附近就是湖北省警察厅，也许这些早期的共产党人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在门口挂了一个“刘芬律师事务所”的招牌。机关则用张国恩别名“梅先”的“梅”字作为暗号，对外

称党组织为“梅先生”。事实证明，这一别出心裁的安排的确非常成功。包惠僧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那里集会，做各种宣传、组织活动，差不多是如入无人之境。”这个秘密机关在一年半时间内，几乎没有遇到过危险和麻烦。

关于保密问题，包惠僧还回忆说：“在当新闻记者时，我差不多是一只野马，思想没有一定的体系，言论行动没有一定的范围。”但“共产党在当时是一个绝对秘密的党，有一套保密的规定，因此入党以后，我不敢感情用事，随随便便”。

“刘芬律师事务所”这个秘密机关建成后不久，就迎来了一男一女两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并不是来请律师的客户，而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助手马迈耶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是受李汉俊委托，来武汉协助建党工作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热情地接待了这两位来自异国他乡的同学，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董必武、包惠僧不懂俄语，而马迈耶夫不懂中文，双方交流就麻烦了。幸亏马迈耶夫会说英语，而陈潭秋又是武汉中学的英语老师，就临时充当翻译。董必武也懂一点英语，他把英汉字典放在膝上，不懂就查字典、打手势，再加上陈潭秋的翻译，总算解决了语言交流问题。

马迈耶夫的到来，使得共产党武汉支部与共产国际开始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筹办外国语学校没能成功，马迈耶夫和他的妻子不久后也离开了武汉，但武汉党组织建设的步伐却进一步加快了。

共产党武汉支部的建立，也推动了武汉青年运动的迅猛发展。董必武、陈潭秋以武汉中学为基地，开始组建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昌高等师范、湖北省立女子师

范、武昌高师附小、启黄中学等学校的进步青年学生纷纷加入。1920年11月7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召开，宣告湖北和武汉地区的第一个青年团组织正式成立。董必武、包惠僧等人在会上向青年团员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武汉支部的7名党员也同时成为了青年团员，包惠僧兼任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1920年冬，共产党武汉支部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地请来了李汉俊这位被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誉为“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讲解唯物史观，介绍西欧各国社会主义的情况。听了李汉俊深入浅出的讲解，黄负生、刘子通等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思想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经陈潭秋介绍，1921年他们加入了共产党。

随着新生力量源源不断的加入，武汉支部的党员队伍也逐渐壮大起来。1921年春，包惠僧离开武汉去上海后，武汉支部的党员数量不仅没减少，反而由创建时的7人增加到了9人。

1921年6月，武汉支部收到了一封上海寄来的信和一笔经费，他们立刻忙碌起来，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中。

信是上海早期党组织成员李达发来的，它通知武汉支部选派两名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寄来的经费则是给代表的路费。

武汉支部收到来信后，很快就开会选出了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汉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此时此刻，这群风华正茂的共产主义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从事一项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彻底改变了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历史。

（宋健：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一级调研员）

周恩来在武汉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

◇ 吴文俊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部分由南京迁到武汉，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9月间，中国共产党派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武汉，成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中国的工作；还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长江局的工作由王明主持。周恩来作为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主要是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

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于1937年12月18日到武汉。21日晚，王明、周恩来、博古同蒋介石会谈，周恩来对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

领、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蒋介石说：“今后两党关系，由陈立夫等与中共代表团共商一切。”

除了处理同国民党谈判和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以外，周恩来在武汉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由于历史原因，周恩来在国民党上层和爱国民主人士中本来就有很多朋友。这次，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武汉，使许多人拉近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距离，或者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接近，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一）

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周恩来十分重视。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他同陈诚、邵力子、张治中等接触

较多,对他们当时的政治倾向有着一定影响。

冯玉祥是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是原西北军的领袖,是国民党内的主战派。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到他的寓所拜访,交谈对时局和抗战前途的看法。他们谈得很畅快,特别是对前一阶段华北和上海作战指挥的得失进行了详细的探讨。19日,冯玉祥又到汉口与周恩来等人见面。周恩来与他谈到正在日见发展的国共摩擦的情况。之后,冯玉祥常派他的专车将周恩来接到寓所晤面,同共产党员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白崇禧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主战派。他是桂系的首领之一,军事委员会改组后,出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同周恩来常常见面。1938年3月上旬,白崇禧奉派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他在行前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他的寓所,请教对敌作战方针。白崇禧走后不久,周恩来、叶剑英又要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这些建议,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大捷。平型关伏击战和台儿庄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取得的两次重大胜利,周恩来对这两次战役的胜利都作出了重要贡献。7月上旬,李宗仁从前线到武汉,周恩来在寓所设便宴招待他,一起谈了加强团结抗战的问题。10月,在第五战区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共产党员钱俊瑞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任主任。周恩来、叶剑英还派张友渔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政治部主任李世璋那里做设计委员,加强同程潜的联络工作。

1938年3月,川军将领、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从河南前线到武汉。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他,希望川军能同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邓锡侯回河南前线

后,曾派人给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八团队留守处送去一批弹药。此后,他的部队移驻鄂北,又经常在枪支、弹药和物资上支援新四军。

对滇军将领,周恩来也做了许多工作。他在武汉会见滇军第一八四师师长张冲(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同名),并答应张冲的要求,派共产党员薛子正担任他的秘书(后任参谋长)。张冲随后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些工作,对解放战争后期川、滇将领的起义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七七事变发生时是第二十九军旅长。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的,就是他所属的吉星文团。1938年年初,何基沣到武汉,周恩来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他到延安去看看。经过周恩来的安排,何基沣在2月间秘密前往延安,受到毛泽东等的接见。离开延安前,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1939年1月被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1948年淮海战役开始时,他和另一个秘密党员张克侠共同担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率领所属第五十九军、七十七军的大部起义,使华东野战军通过他们的防区,直插徐州城下,切断黄百韬兵团同徐州的联系,对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二)

对其他的社会各党派人士,周恩来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都到汉口中央银行楼上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国社党的张君勱,青年党的左舜生等共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分析政治形势,也听取

他们对时局的意见。通过这种经常的开诚布公的交谈,使他们逐渐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为他们中很多人今后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

邹韬奋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所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在全国特别是青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周恩来在武汉第一次同他见面就好像是遇到老朋友一样。谈话中,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他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向他分析抗战的形势和任务。周恩来的热情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

对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钱俊瑞、徐雪寒等主办的新知书店,李公朴、黄洛峰等主办的读书出版社,周恩来都十分关心。抗战爆发前,生活书店总店在上海,分店最后只有广州和汉口两处;抗战爆发后不到一年,全国分店已达50余处,总店先后迁往汉口和重庆。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也都迁往后方。有不少共产党员在这三家书店工作,党组织经常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1938年4月下旬,周恩来同《救亡日报》负责人夏衍谈办报方针,指出办报要学习邹韬奋办《生活》周刊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

周恩来在筹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同时,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把云集武汉的众多文艺界人士团结起来。当时从各地来到武汉的文艺界人士很多,有着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政治部第三厅不可能把他们都容纳进去。为了这件事,周恩来特地拜访冯玉祥,请正在他那里帮助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出来主持文协。冯玉祥答应了周恩来的要求,并对文协给予慷慨的资助。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1938年3月27日成立,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等都出席了大会。

由于经常接见来访记者或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同武汉的新闻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3月,《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汉口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周恩来同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范长江的思想不断进步,到重庆后,就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

周恩来在武汉从事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收到显著的效果。

中共代表团到武汉后,这里既有常驻的外国使节,又有来自全球的各国记者,还常有一些外国团体和人士前来访问。这大大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面。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由王炳南负责的国际宣传组,该项工作归周恩来领导。周恩来指示他们:对在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的联系,凡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都邀请他们参加;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的新闻资料,由于这些资料及时准确,往往比国民党通讯社的资料更受到外国记者的重视;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参加接待。周恩来自己同在武汉的外国朋友也保持频繁的接触。他不仅同斯诺、史沫特莱、鹿地亘夫妇、爱泼斯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武汉期间还会见过美国总领事戴维斯、美国主教鲁茨、美国作家贝尔登等。

1938年1月下旬,由白求恩大夫率领

的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一个深夜，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会见他。周恩来用熟练的英语向他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因为白求恩急于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周恩来就嘱咐王炳南，为白求恩一行去延安作出安排。这样，便开始了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的不平凡经历。

4月，荷兰著名电影工作者伊文思到达武汉。他是受宋美龄邀请来华拍摄新闻记录影片的，又是荷兰共产党党员。周恩来到旅馆去看望他。伊文思在津浦战场拍摄记录影片后，希望到延安去拍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活动，国民党不允许，他很生气。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周恩来作出安排，让伊文思在武汉拍摄了中共代表团活动的镜头。伊文思这次拍成的影片，便是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四万万人民》。周恩来还派人将伊文思赠送的一部电影摄影机和三盒胶片送往延安，帮助开创解放区的电影事业。

6月，长期在华工作的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从上海来到汉口，同斯诺等人筹备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他们计划在全国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希望得到包括国民党政府在内的各方面的资助。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积极支持他们的活动。8月，工合总会在汉口正式成立，艾黎以技术顾问的名义主持实际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工合迅速发展成为有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

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在武汉进行的国际交往，无论对当时和后来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奠定了基础。

随着武汉会战的打响，日军日益逼近汉口，国共两党逐步有序撤离武汉。10月24日晚上，周恩来来到武汉新华日报社，

为《新华日报》武汉版口授最后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排出来后，周恩来又亲自看了一遍。25日凌晨1时，报纸还在开印时接到电话：日军已经逼近市郊。周恩来命令报社其他人员撤退，由留下的工人将最后一天的报纸坚持印出了一部分，张贴散发。周恩来自己在安排报社最后一批人员撤退并检查了政治部对敌宣传科的工作后，才撤离武汉。

这一天，汉口陷落了。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武汉的时间不到一年。但通过他范围广泛的活动，结交了很多的朋友，使很多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在当时对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此后解放战争中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和一部分国民党将领的起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党在国统区的统战工作，许多都是在武汉开端的。

（吴文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文博馆员）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担当篇

DANDANGPIAN

“一五”时期武汉工业化建设及其成就

◇ 许 歌 肖 捷 杜宏英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后，城市工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党的领导下，武汉市委把发展工业作为中心工作来抓。特别是1953年后，国家开始实施“一五”计划，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一批大型重点项目落户武汉。武汉提出“基建第一”的口号，倾力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发展地方工业。此后，武汉重新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并逐步建立起以钢铁、机械、纺织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不仅初步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而且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一五”计划及过渡时期路线的提出

1953年，全国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国民经济渐进恢复，中央出台了过渡时期

总路线，规划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围绕总路线，中央又制订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围绕国家“一五”计划，武汉市亦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那就是：积极支援国家在武汉的重点工程建设，加强城市建设，在充分发挥现有工业优势的前提下，扩建和新建一部分地方工业。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郊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极扩大商品流转，相应地发展运输业。“为把武汉市建设成为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而斗争”，由此，1953到1957年，全市掀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

加快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武汉市政府在完成金融业和航运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着手私营企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引导私营企业和个体手工业逐步朝公私合营和手工业生产小组、供销合作社和合作社方向发展，使武汉工业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国有制经济份额逐渐增多。

（一）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公私合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经步骤，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对于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主要通过赎买政策、加工订货、公私合营等形式，逐步把资本主义工业改造成社会主义工业。

武汉解放后，武汉市政府十分重视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1950年武汉市政府对武昌第一纱厂进行公私合营，拉开了武汉私营企业公私合营的序幕。

1949到1953年，武汉市主要对资本主义大企业进行公私合营。在此期间，共有31户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其中工业企业26户。

1954年4月，武汉市委召开“武汉公私合营工作会议”，贯彻中央“巩固阵地，重点扩张，做出榜样，加强准备”的指示精神，制订了《关于整顿武汉市现有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和《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的计划》，着手对公私合营企业进行整顿。首先，对尚未清产核资的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确定公股私股；对原安排不当的私方人员进行了调整，使他们“有职有权、守职尽责”；对盈余尚未分配的企业，确定从1953年起按“四马分肥”（对国家、企业、资本家、工人四方面按一定的比例分配盈

余）的原则进行分配。其次，1954年，选择了国家需要、产供销平衡和有改造条件的18户私营工业企业扩展为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再次，对中小型企业，采取全行业安排、通盘筹划、改组与改造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公私合营。1954年，全市棉纺、搪瓷、火柴、卷烟、制漆、制砖等行业已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其他主要行业的大厂，如机器制造业的开明、大同，面粉业的福新都实行公私合营。到1955年下半年，全市私营工业10人以上的工厂中，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产值占私营工业产值总数的61%。

1955年12月，市委传达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之后全市各机关团体分别召开代表会，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1956年1月，随着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武汉加快了步伐。到1月18日止，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1月20日，全市工人、店员、农民、手工业者、资本家及其家属，部队、机关和国营企业代表共15万人，敲锣打鼓，分别在武昌、汉口两地举行联欢大会和游行，庆祝武汉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

（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武汉解放前夕，武汉手工业有229个自然行业，从业人员达33078人，主要以缝纫、食品、竹木等行业为主。武汉手工业大多以自产自销的家庭手工作坊为主，劳动生产率低下，每人平均年产值约400元。解放后，武汉市政府对手工业的扶持、引导和改造从未松懈，从1949年5月到1957年，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政府对手工业通过逐步恢复——发展——走合作化道路的方式，使其从个体私有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

1949年6月,武汉市工商局发出第一号通告,对解放前的各种旧合作社限期登记。7月1日再次发布《关于登记合作社的通知》。随后,武汉组织了针织、度量衡、皮件、被服等6个合作社,有社员828人,这是武汉第一批合作社。为了扶持第一批合作社健康发展,政府不仅贷款269313990元(旧币)给这些合作社,还分配大量来料加工业务,来料加工的产值占总产值的44%,如武汉市度量衡生产合作社成立后,市零售公司将苏(联)式粮食比重器20台磅秤介绍给他们,并且由订货单位预付七成货款。

1953年元月2日,武汉市委批转了市合作总社提出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必须采取自愿结合,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原则。3月,武汉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武汉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筹备委员会。1954年4月和9月,中共武汉市委决定成立“武汉市手工业管理局和局党组”。之后,5个城区(武昌、江汉、江岸、硚口、汉阳)分别建立了区联社和党总支,为全面进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做好了组织准备。1955年7月,市委再次指出“关于手工业改造的五年规划问题,应注重巩固一批,发展一批,在组织形式上应强调由低级到高级的秩序前进”。这些具体的政策指导着手工业合作化顺利向前发展。截至1955年,武汉市合作组织发展到296个,人数20724人,其中供销生产小组70个,供销合作社38个,生产合作社188个,手工业产值和利润分别是1953年的7倍多。1955年12月以后,武汉学习借鉴了北京手工业改造的经验,以区按行业先报名批准再建社的办法,通过吸收社员,征集股金,民主选举理、监事会成员,安排生产,在1956年元月16、17、18日三天内,共组织了612个合作社,发展了

39159名社员,至此,合作社总人数已占全市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9.12%,提前实现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构建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

随着武汉工业的接收、恢复与调整顺利完成,武汉地方政府依据中央“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的方针,开始全市工业布局及工业体系的建设。此时,武汉市政府除将接管的国民党所属国企中有生产前途的企业快速转化为人民政府所掌控的国有企业外,还根据武汉工业实际状况,投资兴办兴建了众多新的国有工业企业,其门类涉及电力、冶金、机械、纺织、轻工、化工等,努力构建以国有企业为主、其他所有制企业为辅的工业发展战略。

(一) 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为国营企业

重工业方面。解放后,武汉市人民政府进驻并接管既济水电公司和鄂南电力公司,并发展既济水电公司成为公私合营企业,鄂南电力公司成为国营企业。1949年6月1日,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华中钢铁有限公司,成立华中钢铁公司,筹建武钢。同月,武汉市军管会又接管湖北省机械厂和善后事业委员会机械农垦处湖北分处,改名为湖北机械总厂和湖北省人民政府机械农垦处,后农垦处撤销,成立湖北农具制造厂(现湖北柴油机厂)。同年10月16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没收了日伪阮恒昌机器厂,并更名为武汉机器制造厂,成为武汉市第一家国营机器工厂。1952年1月,武汉市工业局接管乔兴发五金机器厂,改名为国营乔兴发五金机

器厂,1953年7月并入武汉机器厂。1952年、1953年,益民布厂、群力布厂、劳工第一布厂、劳工第二布厂、劳工第三布厂、荣生针织厂和劳生针织厂7家公营小厂合并组建湖北省合作总社染织厂,属湖北省合作事业管理局领导。三年恢复期,武汉纺织业在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救助扶持下,逐渐形成以棉纺织印染为主体,包括毛纺织、针棉织、服装鞋帽、纺织机械等行业门类较为齐全、结构比较合理的武汉工业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轻工业方面。1949年5月底,武汉军管会按政策接收了汉阳炼油厂、中国植物油料厂、汉口化工厂、华中造纸厂,接管了南洋烟厂、宇宙烟厂中的官僚资本股份。接管的两个炼油厂合并后改名为国营武汉油厂,为武汉最早的地方国营工厂之一。汉口化工厂、华中造纸厂、宇宙烟厂随即改为国营企业。1950年,湖北省政府在汉阳沌口兴建全省第一家国营制浆、造纸联合工厂——湖北造纸公司(即汉阳造纸厂)。国营轻工企业由1949年的4家增加到1952年的16家,并逐步发展为骨干企业。

(二) 国家主导兴建国营企业

自张之洞在武昌建立湖北纱布丝麻四局以来,武汉的纺织业便在全国保持领先水平。1950年,纺织工业部决定在全国主要棉产区新建4个棉纺织厂,武汉国棉一厂就是其中之一(另三个是湘潭棉纺织厂、西北国棉一厂、邯郸国棉一厂)。武汉国棉一厂总投资8295645万元(旧币)。1951年1月设计,6月25日破土动工,1952年4月建成,并开始安装设备,有纱锭5万余枚、主机596台、辅机13台。投产后,生产水平稳步提高,工业总产值1952年为646.8万元,1957年达3185.53万元,平均每年递增37.56%。生产的红旗牌20支、21支、

32支棉纱中,供纺织行业生产毛巾、被单的21支棉纱在用户中享有较高声誉,被评为全国优良产品。

随着工业建设的深入,武汉国营工业在电力、化工、机械、冶金、纺织轻工和建材等重要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建立了诸如武汉钢铁公司、武汉国棉一厂、武汉油厂、湖北农机具厂、武汉制药厂、武汉化工厂等多门类大中型国有企业。至195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4.32亿元,是1949年的118.5%。全民所有制企业由39个上升到203个,工业总产值中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上升至25.9%,私营企业总体数量增加但占比下降到37.9%,集体所有制企业为4.9%,公私合营企业占18.5%。

同时,为有效管理国营企业,武汉市政府在国有企业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劳动竞赛、增产节约等运动,以进一步解放企业生产力,实现企业的制度与技术的更新,促进武汉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的建立。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建立及管理制度的逐步确立,使得武汉市政府牢牢地掌握了国民经济的领导权,控制了武汉的经济命脉。并且随着国有企业比重的不断增加,武汉国有企业在企业户数、工业产值、工业增加值、实现利税、出口额、城镇就业领域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有企业曾经作出过重大的历史性贡献,使我国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形成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同时也提高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经济建设中,国有企业支撑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保证了能源、原材料的供给,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为国家发展经济提供了资金。”

掀起武汉工业化建设高潮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 1957 年）期间，国家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 156 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 694 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56 个项目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通过实施“156”工业项目，形成了以沈阳、鞍山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区，以京、津、唐为中心的华北工业区，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工业区，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工业区，以郑州为中心的郑洛汴工业区，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工业区，以兰州为中心的甘肃工业区，以重庆为中心的川南工业区等，使旧中国工业密集于东部沿海的状况发生变化，包括武汉在内的内地工业获得快速发展，城市功能结构得以成功转型。

武汉乃华中重镇，资源富庶之区。1953 年，党和国家把目光投向武汉，中央根据交通便利、生产地接近原材料产地以及毛泽东“钢铁要过江”等条件进行生产力布局，武汉这座地处内陆腹地、具有深厚工业文明底蕴的工业重镇便成为建设要地。国家 7 个重点项目——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相继建成，这些被武汉人亲昵地称作“武字头”的大型国营企业，奠定了武汉工业的基础；武汉还大力发展地方配套工业，兴建、改建、扩建了一大批地方骨干企业。这些国家重点工程和武汉地方重点工程的建设，为武汉工业化乃至全国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却又坚实的基础，武汉成为以冶金、机械、纺织工业为主的南方工业基地。

除此之外，国家又先后在武汉扩建、改建 12 个工业项目，如武汉国棉一厂、武汉印染厂、汉阳造纸厂、汉阳枕木防腐厂、武汉重型铸锻厂等等。武汉市政府在积极建设国家重点项目或大中型项目的同时，也兴建了武汉机床厂、汉口机械制造厂、武汉汽车配件厂等。此后又陆续兴建了武汉冷冻机厂、武汉拖拉机厂、武汉水泵厂、湖北电机厂、武汉鼓风机厂等地方企业，使武汉工业门类更加健全，武汉不仅由一个商业城市开始转变为内地重要的工业城市，而且工业轻重结构和区域布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重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39.9%，轻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21.4%，食品、纺织、缝纫、皮革、造纸等轻工业发展很快，总产值成倍递增。而且，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以国家重点项目和地区重点项目厂址为中心进行新的规划，逐步形成新的工业小区，即以武钢为核心的青山工业区，在传统纺织厂厂址上扩建而成的武昌余家头工业区，以武重为中心的答王庙工业区，以武锅为重心的钵盂山工业区，以武汉船用机械厂为主体的武东工业区，以鼓风机厂为主导的关山工业区，以武汉肉联加工厂为龙头的堤角工业区，以武汉柴油机厂、武汉制漆总厂为主的易家墩工业区，还有以化工为主的葛店工业区。武汉工业发展为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多头并进的格局。

经过“一五”时期建设，武汉成为全国重要工业基地。在 1956 年以后的 30 多年时间里，武汉市在全国 25 个大中城市中，固定资产和总产值水平大多数时间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天津。

（许歌：武汉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馆员；肖捷、杜宏英：武汉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研究馆员）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市农业农村改革开放的回忆

◇ 杜远威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但实际上“三农”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就存在，始终是党中央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历来被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笔者有幸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武汉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和市农业委员会工作，亲历了那段时间在党的领导下我市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过程，见证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放活生产经营方式，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充分激发农民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力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有了很大发展。武汉市郊（当时汉阳、武昌、黄陂、新洲四县未划入我市）于 1952 年开始组织互助组，1953 年开始办初级合作社，到 1956 年年底，市郊农村全部实现了高级

社。那段时间，集体经济显示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杜绝了两极分化的可能，过去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如水利、抗灾等，靠集体力量都可以做到。农民积极性高涨，那几年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但是形势的顺利发展，也滋生了急躁情绪，急于大干快上，使得我们前进探索的道路出现了曲折。当时认为集体化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一度刮起了“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财物，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后来人民公社虽然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左”的错误有所克服，但在“文革”期间，“左”的思潮再度发展，“四人帮”宣扬的“批资产阶级法权”“割社会主义尾巴”等，更加助长了“大锅饭”“平调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洪山区委（当时是郊区）工作，经常下乡住队蹲点，深感推动工作的难度。有的农民对我说：“我

今天锄了地里十行草，只有一行是为自己锄的，那九行都是为别人锄的。”“出工敲破钟，干活磨洋工”的现象普遍，生产效率十分低下。我蹲点的鲁巷大队紧靠城区，自然条件也很好，但年终分配时，队长拿出一把糖对社员说：“今年还算不错，收支搞平了，虽然没有现金分配了，但超支户不多，大家吃几颗糖算是结账了。”所谓收支平衡就是社员工分总收入刚够从队里分的粮食、油料等，再没有现金收入了。这还算比较好的队，许多队有不少工分收入抵扣不了队里分的实物的农户还要欠账，这叫超支户。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冲破禁区、实行包产到户、群众积极性高涨的消息不胫而走。1979年，洪山区永丰公社星火五队也学着把菜地包到户，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出现了“上工不敲钟，干活打冲锋”的可喜局面。区委发现后，让我去调查，还要我组织几个人在鲁巷、马湖几个队也搞几个点试一试。试的效果很好，群众高兴，干部也满意，说：“过去是队长一人着急，一人努力，现在人人着急，人人努力。”区委在星火五队开了现场会，推广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到1980年，每个公社都搞了试点，由于效果好，铺开很快，到1981年年初，全区大概近一半的队实行了包产到户。但是对这个做法的认识分歧很大，有的人甚至认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了解放前。当时，有的领导也怀疑这种做法是否退到单干私有制了，批评不少，甚至要求把承包到户的土地退回来，承包责任制统统作废。在这个关键时刻，时任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王群同志态度鲜明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支持把承包到户继续推开。针

对这些怀疑和反对，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分析它的性质。农民对承包到户有个简单明确的说法：“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表明这个提法还是把国家的任务、集体的提留放在前面的，但是这杜绝了任意的“一平二调”，确保了多劳多得。更重要的是土地仍然是集体的，是公有制，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变。这里只是经营方式变化，而这种经营方式更适合当时农业生产以手工劳作为主、需要机动灵活应对的特点，分散的自主作业往往比群体劳动效率更高。我们通过简报宣传一些包产到户的效果和群众的反映，逐步破除了很多疑虑，减少了阻力。由于市委主要领导态度鲜明和大力支持，全区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加快，到1981年年底，全区基本都承包到户了，在全国大城市以蔬菜生产为主的郊区是走在前面的。据我了解，1975年划入武汉市的武昌县和汉阳县（现江夏区和蔡甸区），也在市委领导下，冲破重重阻力，于1982年全部实现了承包到户的改革。由于包产到户，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被激发了，正如当时许多人形容的，如开闸放水，激流澎湃，不可阻挡。过去队长喊破嗓子，出工到不齐，干活不出力；现在社员起早贪黑，抓紧时机，拼命干活，反映到生产上效果很明显：1984年和1978年相比，全市粮食增长31%，棉花增长26%，油料增长11%，农民年均收入由142元增加到470元，五年时间增长了2.3倍。

放活多种经营，实行产业结构调整，充分释放资源潜能，增加农民收入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以粮为纲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

在执行时,有时也产生产品单一的倾向。“文革”时期,“四人帮”极“左”思潮则走向了极端,形成只有种粮才是社会主义,喂猪、养鱼、种植瓜果蔬菜则是资本主义的舆论氛围。农户喂猪只能一头,养鸡只能两只,门前种树只能两棵,多了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民积极性高涨,除了种粮,完成国家定购任务,还有多余时间和精力,强烈要求发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但是上面有些领导和部门对刚划到市里的几个县很不放心(1983年,新洲县和黄陂县也划入武汉市)。蔡甸、新洲有些湖区的低地易涝,农民种了藕、莲,江夏、黄陂有些丘陵岗地易旱,种了果、茶,多有批评意见,有时还被强令改田种粮。区、乡同志很有意见,我也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反映调查的情况。省里有些领导和部门主要是担心粮食定购任务完不成,盯得很紧。其实这些低湖田、山坡地种粮产量很低,一遇水旱灾害,基本颗粒无收。包产到户后,农民精耕细作,单产提高不会影响任务,而且过去下任务时是按习惯亩,全市耕地300万亩,实测可能要多出近百万亩。除耕地外,全市还有150万亩水面和150万亩山地,这都是可用的自然资源,这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武汉还是几百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几百万市民不光要吃粮,还要吃鱼、肉、菜、果,作为大城市的郊区应当满足这个需要。王群、吴官正等领导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肯定了我们的看法,他们更进一步说,要研究郊区的农业产业发展方针,要与大农区有所区别,要考虑为城市人民生活和城市经济发展服务,要大力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鼓励农民面向城市发展多种经营。此后,我们还约请了省社科院研究农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学者专家来我市调研考察,并通过他们与

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有关人士沟通,我们也与有关城市农业部门联系,共同建立了“城郊经济研究会”。通过协调调研、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凝聚社会共识。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区县、乡村充分发动,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就手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江夏的柑桔、鳊鱼和苗木,蔡甸的莲藕、泥蒿和西甜瓜,新洲的蔬菜、蛋鸡和食用菌,黄陂的芦笋、油茶和鸡鸭,东西湖的蔬菜、葡萄和奶牛业,汉南的牲猪、螃蟹和甜玉米,洪山的快生菜、红菜苔和精养水产等特色产品,逐步形成万亩、十万亩级的规模,成为满足大城市居民需要的蔬菜副食品生产基地。

放活流通渠道,放开农产品市场,全力打通产销阻隔,充分满足市民需求

几百万人的大城市,市民天天要吃菜,而且要新鲜菜,这是民生大问题,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过去长时期按计划经济的办法实行“统购包销”,具体就是“五定四保”。“五定”是定面积、定品种、定数量、定质量、定上市时间,这是市、区、乡、村、户“五级一本账”,一直到农户,十分具体细致。“四保”是国家保收购、保价格、保菜农口粮和农资生活用品的供应。这里的保收购是全部产品由国家收购站收购,再分到国营菜场零售;保价格是从头到尾一个价,不涨也不跌。那时中心城市人口约300万,市里要求确保日上菜300万斤,多少不超过20%,但实际很难做到。天气好,菜长得快,收菜多,大量拥到收购站无法收,菜农把菜拖到蔬菜局门口,造成路口交通堵塞。遇到天气不好,旱涝雨雪天,菜长不起来,甚至死掉,市场上蔬菜断档,市民意见很大。当

时市领导为蔬菜供应伤透脑筋，农商部门虽疲于应对，也收效甚微。为阻止蔬菜走私，甚至派民兵在各要道路口设卡拦截。但这些办法导致越管越紧越没菜，越均衡不了。市委王群书记和吴官正市长多次开会研究对策，也亲自到区、乡调查研究，找有关人员座谈讨论。我也向他们反映，这个“五定四保”看起来是计划周全、完美无缺、天衣无缝，但这个计划只管得了人，管不了天，蔬菜品种几十个，生产周期各不同，它们对气候变化适应皆有异，不一定听计划本子的。统购包销，菜多了出不去，菜少了进不来，菜农与消费者见不了面，信息也不灵，中间环节多，农民得不到好处。“保价格”看起来是保了农民，实际上是菜好菜差一个价，旺季淡季一个价，让农民种好菜、种淡季菜吃了大亏。为了完成上市数量任务，只好“丝瓜丝，黄瓜长，竹叶菜马尾巴长”。市领导经过反复研究，王群和吴官正下了决心，要改掉“统购包销”“五定四保”，放开蔬菜市场。走这步是有风险的，那时全国没有一个城市放开，听说有个中等城市放了几天，菜价猛涨就赶快收回。但我们市领导商量，这一步非走不可。他们是有魄力、有勇气、敢闯敢试的。

1984年7月22日，市里正式作出决定，并通过《长江日报》发布消息，宣布放开蔬菜由国家独家经营局面，实行少环节、多渠道，农民和私人经营者可以进行交易，进集贸，产销直接见面。菜价也随之放开，随行就市。对菜农只要求菜地必须种菜，种什么只提供指导建议，自行按市场需求和自己实际情况，因时因地选择品种。刚放开时大家都很担心，怕出问题，开头一两个月菜价有点上涨，波动比较大，天气不好时也紧俏了几天，但比较快地平息下来了。

我们分析，这是因为：第一，产销直接见面，市场信息直接传到农民那里，菜农马上针对市场需求抢种快生菜、俏销菜。经过几番摸索，农民也摸准了天气和市场变化规律，调整自己的品种播栽时间。第二，放开市场，外地菜可以进入，使得周边如孝感、黄冈、荆州的农民也盯上了武汉市场，他们发挥各自优势，紧盯市场缺口，抢种适宜品种。后来竟发展到附近几个省的农民专门针对我们的淡季（他们那里可能是旺季）种菜。第三，市场放开，城市个体经营户、运销专业户、专业经纪人、批发商应运而生，快速兴起，他们信息灵、反应快、吃得苦，市场紧缺急需的就是他们获利的机遇，因而千方百计弥补缺口，满足需求。第四，放开价格，激发了农民抢种淡季菜和紧俏品种、努力提高菜品质量的积极性，哪怕是冰天雪地，也愿冒着严寒去采菜上市，因为可以抢个好价钱。

随着市场的放开放活，一些必要的宏观调控配套措施陆续出台，如建立菜地建设开发基金、储存淡季菜的补贴、菜情信息的收集与发布、交易市场的基建等，出现了蔬菜市场的繁荣。交易活跃以后，更形成了全国性的交流、大进大出、互通有无的格局。过去政府部门从上到下的干部为保菜供应焦头烂额，也难以保证均衡供应，现在借助市场的力量，轻松地解决了天大的难题。接着其他农副产品也随之放开，如鱼，过去要发鱼票，一年吃不了几次，而且供应的不是死鱼就是冰冻鱼。放开水产品市场以后，农民养鱼的积极性高涨，逐渐形成湖里有人养、水上有人捕、船上有人收、路上有人送、城里有人卖的有序而繁荣的局面，鲜鱼产量节节上升，城里人天天可以吃到活蹦乱跳的鲜鱼。

放开产业限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充分发掘资源、人才潜能，多方增加集体和农民收入

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这样的观念，农民就是务农，不能务工经商。黄陂人多地少，历史上外出人多，号称“九佬十八匠”“无陂不成镇”，许多城市有黄陂街。“文革”期间，在批资高潮中，强行搜索“十万匠人回乡”当作社会主义胜利的典型宣传。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承包，劳动效率提高，剩余劳动力很多，这些能工巧匠到处找活干。几个郊区（县）也都冒出许多专业户、手工作坊、家庭工厂。在此基础上，有些村队集体也开始利用能人和本地资源，办起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小作坊、小企业，配制酱菜、藟头、做油面、摊豆丝，搞建材业、打石头、做砖等；接着一些乡镇和实力较强的村开始办起了小农机厂、化肥厂、织布厂。新洲、黄陂的许多村拉起了队伍承包建筑工程，发展起了建筑业。后来取得国家资质的著名的新七建、新八建公司都是那时候起步的。当时我们收集了一些典型事例编成小册子，通过各类媒体进行宣传、引导，但是也遇到一些阻力和批评，担心这会把人心搞花了，把乡村干部精力分散了，把主业（农业）影响了，个别人还要把那些小册子收回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听取了我们的汇报，认为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发挥了农村人才和资源潜能，是好事，而且还增加了农民和集体的收入，有利于增强集体经济的凝聚力，增强集体经营这个层次在双层经营中的功能和优势。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乡镇企业发展后，许多乡村内部自行实行了以工补农，将企业收入补贴农业的水电费和

水利道路等投入，这有利于农业发展，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市委、市政府态度明确，相应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保护并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方向，进一步增强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动力。这一年，刘善璧被任命为市委副书记，分管农村工作，他花了很大精力去抓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当时有两个机遇被抓住了，一个是工业改革，有许多城市工厂要扩大零部件生产，需要向农村转移扩散。另一个是城市建设发展，城市近郊的一些乡村逐步融入城市，提供了加快城乡合作、城乡融合的机遇。刘善璧同志抓住这两个机遇做了大量调研、沟通、协调、促进工作，并主持出台了一些激励政策措施，推动了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如借助城市工业的扩散，支持远郊办起了机械修造厂、五金结构厂、钢制家具厂、车身厂等。近郊办起了一些大的批发市场交易中心、商贸城、酒店、餐厅等，全市乡镇企业产值1983年仅1亿多元，1985年为3.9亿元，1988年达45.2亿元，1997年超过400亿元，从业人员有41万人。

破除思想禁锢，扩大对外对内开放，持续深化改革，拓展农业农村发展的广阔空间

20世纪80年代初，我市与日本大分市结成第一对友好城市。黎智同志带团去访问，随团带了三名农业专家作为农业组考察了日本农业生产和农业科研机构，随后大分市组织了三次农业交流考察团来汉回访。后经双方商定，武汉市分三批共选派24名农业技术人员作为农业研修生到大分市农户

家，边劳动边进修，实地学习他们的生产技术，这些研修生回国后陆续成为了各行业的技术骨干。在科研人员的交流互动过程中，我市一些农业专家深感要加强科技力量的整合，于是向市领导建议，将全市分散的科研单位和人员集中起来，便于集中力量加强农业科技工作。1984年9月，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武汉农业科技研究中心，后来又改为武汉市农科院，下设七个研究所。这些所纷纷开展了与国内外同行的技术交流活动，如畜科所王秀阁从日本引进奶牛胚胎移植技术和仪器设备，成功实施了将国外良种胚胎进行移植、以改良我市奶牛品质的推广活动；菜科所孔庆东与多地专家交流沟通，从全国收集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水生菜资源圃，培育出优质水生菜品种，繁殖出“试管藕”；林科所与法国相关科技所合作组建了法雅园林公司，从事优质树苗繁殖和园林设计建设的工程，在全市承接了多个绿化、园艺项目。

1987年春，市政府委派我带队到日本大分县考察农业，到町村走访，入农户座谈交流，重点考察了他们开展的“一村一品”活动和农协（农业协同组合）的组织与运作情况。回汉后，我们向市领导作了汇报，提出了发展产业一定要突出特色，形成规模，实施“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方针。日本农业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但是它有个农协，是农户入股组成的合作性质的组织，主要从事为农户的生产进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农户只管生产，其余的都统统由农协包了。由于有了农协的服务，日本农户经营规模比较大，市场化的程度也就比较高。当时王群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说，现在我们实行包产到户后，也是家庭经营了，这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有好处，但是从长远看，光

靠一家一户有许多难题不好解决，将来必将妨碍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实行农业规模化、现代化。我们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还是双层经营，要研究如何把集体经营这个层次的优势发挥出来，我们的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这比日本强。将来集体经营这个层次改好了，应当比日本农协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回过头来看，农村改革这几十年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前行，如今全国规模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兴起，已经验证了这一点。王群的这个深远思考当时就被实践和推广了。市郊的汉南区，是一个以国营农场为主的农业区，20世纪80年代初，也逐步实行了包产到户，时任汉南区委书记陈元林认识到国营农场有大型装备设施，有较强的技术人才和经营骨干，所以在实施包产到户以后，紧接着实行了第二步改革，把与农场和农业相关的经济实体和机构，改革为向农户提供系列服务的组织，这样农户就扩大了经营规模，一户可种上百亩地，同时规模化的养猪场、养鱼场也相继涌现。经营规模扩大，更多劳动力解放出来促进了二、三产业发展。王群抓住这个典型，多次深入考察，并召开现场会，推广“汉南模式”。

1985年，我市接受了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和欧共体的奶类资助项目，加上地方配套资金共计1亿多元。我市派专人到印度、芬兰、匈牙利等国考察，学习集体和家庭奶牛场发展与科学养殖技术。1992年，我参加市经贸考察团到泰国访问，重点参观考察了正大集团的畜牧养殖、加工和销售企业，并与集团高层洽谈引进了新建现代化饲料厂和鸡场项目，由其与我市畜牧发展公司合资，组建武汉正大有限公司来经营，这两个项目带动和推进了市一批集体和家庭养

殖场的发展，使牲猪禽蛋养殖逐步走上了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之路。

1995年，我参加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农业考察团，到欧洲访问。在法国，我重点考察了巴黎兰吉斯农产品批发大市场，这个市场占地约2平方公里，每年交易量达220万吨。同时还考察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埃斯米尔花卉拍卖市场，据说那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卉拍卖中心，面积相当于120个足球场，日交易量1400万支花和150万株观赏植物，他们的提法是“买全球卖全球”。这两个市场使我们看到了大型批发市场对推动生产、促进流通的巨大作用。回国后我向市领导汇报，建议在农产品流通开放后，要加大对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和培育。时任市长赵宝江大力支持，亲自主持出台政策措施，责成各方协同配合，推动建成了舵落口农产品批发大市场，之后又陆续建设了白沙洲批发大市场，从而促进了“买全国卖全国”的农副产品大流通，实现了淡季不淡、均衡上市，保障了老百姓“菜篮子”，也推动了农业市场化的步伐。

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开展对内开放，除了与各地的产品、技术、资金、人才等开展交流合作外，还着重从发展思路、政策措施等方面开展交流、研讨。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城郊经济研究会”和后来一年一度召开的全国“菜篮子”工作会，成为十几个大城市农口进行互学互鉴的平台。这些活动对我们扩大视野、拓展思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加强了与在汉的大专院校，省、市社科院有关专家学者的联系，请他们参与有关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并多次举办专题研讨会，听取他们的真知灼见。如1996年11月举办了为期两天的较大规模的“武汉市农村发展研讨会”，赵宝江

市长亲自参加，到会的有华科大张培刚、武大伍新木、华师大刘盛佳、华农大郭犹焕、省社科院夏振坤等知名学者专家20多人，他们围绕我市农业农村的环境特点优势及改革发展的方向、目标和应采取的政策举措做了深入分析和讨论，对我们今后前进的方向很有启发。我在会上也作了一个发言，提出武汉市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紧密相连，兼有城乡各种生产要素交融及协调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应当把农村经济纳入城市经济大循环的空间范围，作为一个整体考虑。

转眼20多年过去了，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市农村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扩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我市农业农村发展的历程，再次雄辩地证明了党对“三农”的高度重视和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虽有过曲折，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迸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并逐步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可以预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一定会实现乡村振兴，一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必将展现在世界的东方！

（杜远威：原武汉市农委主任）

难忘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龙王庙

◇ 吴世伟

(一)

1998年，长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又一次全流域大洪水。

6月26日，长江武汉关水位进入25.00米设防水位。全市各级防汛指挥长、防汛人员到岗，抢险队伍、防汛物料到位，全力备战长江洪水。6月28日，进入26.30米警戒水位。7月1日，突破27.30米紧急水位。

在严重的洪涝灾害面前，我市军民万众一心，全力以赴投入防汛抗洪斗争，市防汛指挥部加强调度，镇定指挥，逐步增加抗洪力量，不断强化防守措施。

6月30日后，长江、汉江交汇处的龙王庙险段堤内相继出现裂缝、散浸、管涌等各类险情。在龙王庙闸口斜对面的万商广场，标高在25.79米的1#、4#、5#、6#风道口严重渗水。

在这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以夹击之势直逼武汉之时，7月6日，朱镕基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兼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在中共湖北省委贾志杰书记、省政府蒋祝平省长的陪同下来到龙王庙险段，登上封堵闸口的平台，面对长江、汉江，听取武汉市政府王守海市长的汇报：龙王庙险段处河面狭窄、岸陡脚虚、迎流顶冲、水急浪高、船多覆溺。每年汛前，为保岸脚，抛石护脚，却每年抛石不见石。因长期以来未得到根本治理，历年险情频繁，是我市汉口市区堤防的重大隐患，是我市第一险段。朱总理听后神色严峻，只见防水墙外惊涛拍岸，朱总理果断拍板：从中央到地方全力支持武汉人民整治龙王庙。作为市防汛办公室副主任，听了朱总理的决定，我暗暗高兴，龙王庙整治工程有望实现了。

7月20日，市政府召开第21次市长办公会，成立了龙王庙险段综合整治工作领导



1999年5月28日，江泽民总书记（前排右一）视察武汉龙王庙险段综合整治工程

小组，市长王守海任组长，副市长涂勇任副组长。我在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担任副主任，具体组织实施工程建设。

当年汛期，长江水位一路攀升：7月25日达到28.28米危险水位，7月27日达到28.66米，7月29日超过29.00米，8月1日达到29.20米。武汉关高水位一直在持续，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期，市防汛指挥部要求全市人民全力以赴、决战决胜长江、汉江特大洪水。8月10日，长江第四次洪峰到达武汉，武汉关水位达到29.39米，离保证水位29.73米仅有0.34米。

武汉汛情牵动着中南海，江泽民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部署长江抗洪抢险工作，发出“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的战斗号令。

8月14日，在长江抗洪抢险的关键时刻，江泽民总书记、温家宝副总理在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的陪同下视察龙王庙

险段、武昌月亮湾险段，查看水情，向战斗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军民表示亲切慰问。

在龙王庙险段，江泽民总书记向全国发出了决战决胜、誓夺抢险最后胜利的总动员令，发出了“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誓言。

江总书记、温副总理随后来到了月亮湾险段，在这里，他们听取了市

委书记钱运录关于月亮湾险情的汇报。钱书记说，月亮湾600米岸线，深泓逼岸，脚虚易产生崩岸，汛前已采取抛石护岸的措施，确保汛期安全。江总书记满意地点了点头。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给武汉抗洪军民注入了强大动力，我市各级领导运筹帷幄，按江总书记的“三个确保”，始终坚守一线，身先士卒，划片包干，确保大堤安全。

8月19日，长江当年入汛以来最大的洪峰和汉江历史上最大洪峰在武汉相遇，武汉关水位一路攀升，达到29.43米。市防汛指挥部下发了第9号命令，指挥全市人民全力以赴迎战长江、汉江特大洪峰。各路防汛军民严防死守，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誓夺防汛抗洪的全面胜利。

整个汛期，面对洪水压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38万名防汛人员、上万名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奋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洪水展开殊死搏斗，先后战胜了长江8次洪峰和汉江历史上

最大洪峰，有效排除了 2215 处险情，确保了大堤安全。

武汉胜利了！

（二）

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1998 年大水后及时作出了灾后重建、整治江河、兴修水利的英明决策，一场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堤防建设在长江沿岸掀起。

11 月 20 日，在中央领导的直接关心、支持下，主要由国家投资，总投资达 2.34 亿元的龙王庙险段综合整治工程正式动工。

龙王庙开工典礼在大型机械的轰鸣声中拉开了序幕。从此，我扎在龙王庙工程之中，成为施工现场第一责任人。23 家施工单位、上千名建设者精心组织、科学施工，连续奋战了 200 多个昼夜，在汉江口岸奏响了一首降龙曲。短短一个冬春的枯水季节过后，汉江两岸筑起了千秋堤防：14.36 万立方米的抛石准确到位，11.5 万块铰链沉排丝丝入扣护底，793 根大型灌注桩坚固挺拔，973 米长的钢筋混凝土 L 型墙稳如泰山。

1999 年 5 月初的某一天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两位同志在市水务局有关同志的陪同下，在施工现场向我了解工程进展。我简

略地汇报了整治工程的原则，着重地汇报了综合整治工程各项目的有关内容。两位同志听后很感兴趣，并说，江总书记要来视察龙王庙工程，并建议由我来汇报。当时，我直摇头说：“我不行，由市长汇报吧。”

为了迎接江总书记的到来，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两位同志的要求，我们制作了一幅龙王庙整治工程的鸟瞰图（即各项目布置的示意图）。江汉区防汛办还准备了一幅横幅，上面写着 24 字的抗洪精神，横挂在迎江面的防水墙上端，很显目。

市里通知，江总书记亲临龙王庙工程施工现场，并要接见各参建单位的领导。我按要求一一通知各单位，请参建单位的书记或总经理按时到达龙王庙现场。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1999 年 5 月 28 日下午 4 时 30 分，江泽民总书记在时任省委书记蒋祝平、原省委书记贾志杰的陪同下来到龙王庙工程施工现场。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罗清泉逐一向江总书记介绍在场人



1999 年 7 月 12 日，朱镕基总理（前排右三）、温家宝副总理（前排右二）来到龙王庙视察

员，江总书记与每一位同志一一握手后巡视了龙王庙工程施工现场，并听取了王守海市长的汇报。

王守海市长用指挥棒指着大型彩色示意图说，汉口岸 1080 米堤防有防岸固脚工程、护坡防冲工程、驳岸墙加固工程、驳岸墙防渗工程、防水墙内侧排水工程，汉阳岸 1225 米岸线有消坡工程、护岸工程、驳岸平台工程。龙王庙工程是一项“御洪工程”，是一项“环境工程”，是一项“整治工程”。听到这里，在场人员无不心潮澎湃。在龙王庙主体工程即将全部完成之时，江总书记亲临现场，并慰问全体参建人员，给予参建单位和广大建设者极大鼓舞。我们信心十足，感谢党中央、江总书记对武汉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保证如期完成主体工程。

江总书记很满意王市长的汇报。汇报结束后，王市长请江总书记在此留影，江总书记欣然同意。当走到休息长廊时，王市长请江总书记题字，江总书记问写什么呢？王市长拿出准备好的字条，就题龙王庙吧！江总书记走近长桌旁，拿笔沾上墨汁，在宣纸

上题写了“江泽民，一九九九年五月廿八日于武汉龙王庙工程”。这是龙王庙工程极其珍贵的一笔。

（三）

整个工程开工以来，各施工单位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在大家的共同奋斗下一直是好的。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确保质量、确保工期，圆满地完成任务，向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市人民交一份圆满的答卷。1999 年 6 月 8 日，主体工程竣工；7 月 5 日，主体工程通过汛前阶段验收。

1999 年 7 月 12 日，当长江第二次洪峰逼近武汉的时刻，朱镕基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在时任省委书记蒋祝平、原省委书记贾志杰的陪同下再度来到龙王庙视察。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罗清泉向朱总理逐一介绍迎接人员，朱总理与每一位同志握手问好。随后，在龙王庙闸口叠积的平台上，王守海市长向总理汇报，龙王庙工程按照“扩宽口门、改

善河势、除险加固、综合整治”的原则进行建设。现在，汉江入长江河口扩宽了，水顺了，龙王庙除了险，堤岸加固了。一周前，长江委组成的专家组通过了汛前阶段验收。现在，请总理验收。朱总理听了王市长的汇报，看到昔日的历史险段已得到整治，当



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的龙王庙堤段是武汉堤防的重点险段，1998 年年底，龙王庙险段综合整治工程正式动工

年汛期龙王庙工程正在发挥防洪效益，正接受大洪水考验，朱总理笑了。

经过汛前阶段验收的龙王庙，也经受了1999年7月23日长江武汉关水位达28.89米这一武汉历史上第三高洪水位的严峻考验。2000年11月24日，国家验收组数十位专家经过听取汇报、察看现场、查阅资料，对龙王庙险段综合整治工程作出了质量优良的评定，一致通过竣工验收。

经过整治后的龙王庙更加体现了江城两江交汇、三镇鼎立的壮丽景观及龟蛇锁大江的城市意境。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此基础上建设龙王庙景区，实现险点向景点转化，2001年4月18日上午工程开工。龙王庙景区建设工程有5个项目：一是垃圾码头至打扣巷码头防水墙上嵌“洪水滔滔”“军民抗洪”“严防死守”“顽强拼搏”“八方支援”“科技神力”“力挽狂澜”“欢庆胜利”等八幅98抗洪图大型花岗岩浮雕，高3.45米，总长度102米，一幅图一个故事，再现98抗洪精神；二是改造十一码头，开辟“水上世界”景点；三是拆除龙王庙堤内周边5564平方米建筑，形成近4000平方米绿色停车场；四是结合闸口改造，建设景区入口，形成近700平方米的观景平台；五是对原来的两座亭子和白水泥双龙进行改造。2001年年底，全部项目按设计要求圆满完成。

通过龙王庙景区工程的建设，使龙王庙堤段真正实现由险点到景点的变化。当年，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我时，我说过险点不仅要除险，还要把险点变为景点，给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地。

2002年6月6日，朱镕基总理偕夫人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第三次来到龙王庙。他们走在铺筑了彩色地砖的路面上，走到江边，手扶花岗岩栏杆，依傍在庄重典雅的楚

文化风格的照明灯灯柱旁，眼望着对岸南岸咀。李宪生市长向朱总理汇报龙王庙工程及景区建设情况，朱总理边听汇报边参观，不时露出笑脸，频频与有关同志合影留念。

朱总理走在龙王庙新建闸口平台时，聚集在闸口前的市民高喊：“朱总理！朱总理！”朱总理频频挥手致意。当朱总理及夫人坐上考斯特，马路两旁人山人海的市民高喊：“朱总理！”“朱总理好！”朱总理拉开车窗向人群挥手，向欢送的市民致谢！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今日的龙王庙、南岸咀大堤固若金汤，武汉人民已经彻底根除了这一心腹水患。能在龙王庙两次见到江总书记、三次见到朱总理，是我一生中最难忘记忆。

（吴世纬：武汉市水务局原巡视员）

东风汽车和武汉的不解情缘

◇ 谢 勤

二汽选址，与武汉擦肩而过

“我们一个省顶欧洲的一个国家，将来我们还要有第二汽车厂、第三汽车厂，生产更多的汽车；将来我们的汽车也要出口。”1952年年底，在一汽建设方案确定之后，毛泽东主席就作出了“要建设第二汽车厂”的指示。

1953年年底，中央正式决定由湖北省承建第二汽车厂，并在武汉成立了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由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刘西尧任筹委会主任，黄正夏任副主任。1953年至1955年，在两年多时间里，筹备组在武昌选择二汽厂址，编制总体平面布置方案，并与苏联专家接触商谈。1955年春，国家建委、一机部和汽车局指出：“二汽厂址定在武汉，从经济条件讲，城市利用率大，投资较为节省；武汉位于全国中心，产品好销好运；但从国防条件看，武汉离海岸线约800公里，工厂比较集中，万一发生战争，

正处于敌人的空袭圈内。武汉厂址介于沙湖与东湖之间，空中目标显着。”因此否决了在武汉设址的方案。1955年9月7日，国家计委正式决定二汽厂址由武汉迁至四川成都东郊的保和场一带，甚至在成都郊区牛市口附近建了近2万平方米的宿舍。但是在全国“反冒进”的形势下，1957年3月27日，汽车局宣布二汽暂时下马。

1958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计划又被重新提出。6月，二汽再次上马。到1960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二汽第二次下马。1964年，中央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二汽第三次上马建设。

这一方土地，是东风人轿车梦开始的地方

从1952年到1964年，“两下三上”的漫长波折终于结束，二汽转入筹建的正式轨道。1965年冬，二汽筹备处召开第一次誓师大会。1966年10月，二汽厂址确定在十堰。

1967年4月1日，在十堰红卫大炉子沟举行了开工典礼。

1969年元月，武汉军区在湖北省十堰市召开了二汽建设现场会议，成立了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总指挥部。二汽建设总指挥部的成立稳定了二汽建设的局面，二汽开始逐步开工建设。下半年，十万建设大军陆续进入十堰基地，9月28日，第二汽车制造厂大规模施工建设的序幕正式拉开。这一天也就成了东风公司的厂庆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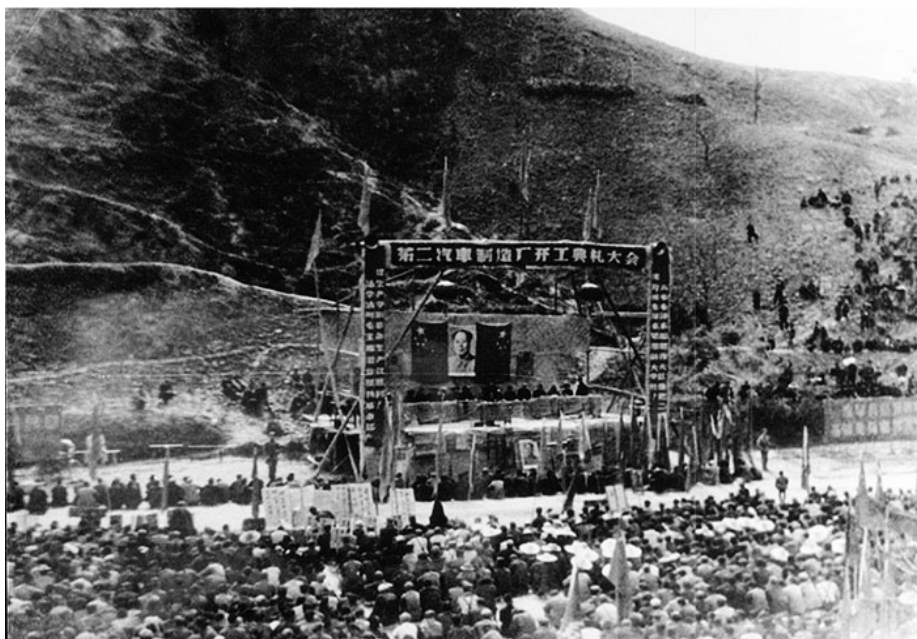
二汽是我国第一次完全自主设计、建设的大型综合汽车制造厂。为了适应我国当时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主持二汽创建工作的饶斌同志提出了按照汽车的总成分工，由国内汽车厂家和设备厂家分别包建的建设方案。包建单位实行“四包”，即包设计、包生产准备、包人员培训、包生产调试。在包建任务中，一汽包建了11个分厂，上海包建了6个，北京包建了1个，武汉包建了1个。

1972年3月17日，饶斌同志在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就响亮地提出：“生产准备工作要以调试为中心，保质量、上能力、打基础。”努力将二汽引向良性建设轨道。紧接着，陈祖涛等主要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也逐步归队。二汽在他们的管理和带领下，渐渐恢复正常的建设秩序。1972年年底，军代表全部撤出。12月

27日，中共湖北省委决定成立二汽临时党委，任命饶斌同志为二汽临时党委第一书记；12月30日，撤消二汽建设总指挥部，重新按照工厂的生产管理体系建制。

从1976年至1979年，二汽生产的EQ240系列越野卡车，迅速装备至全军各主要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经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东风军车一战成名，成为部队军车装备的主力军，东风成为国家重要的军车生产基地。

1984年10月4日，“三省五方”（鄂、川、闽、武汉、二汽）向国务院呈送了共同发展轻型车的联合报告，还与福特就共同发展轻型车和零部件等事宜进行过14轮商讨。1986年7月12日，因种种原因，二汽轻型车项目终止，改上轿车项目。1987年8月，中央同意二汽轿车建设项目立项。1988年1月16日，二汽30万辆轿车项目经国务院批准，随后开展工厂选址和法方谈判的工作。武汉因交通状况良好、经济基础雄厚、选址



1967年4月，第二汽车制造厂开工典礼在湖北十堰红卫大炉子沟举行

的地理条件好，成为了30万辆轿车项目基地。1990年12月19日，二汽与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合资生产轿车项目在巴黎签约。1992年5月18日，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东风与武汉终于结缘。1992年8月27日，二汽第一辆合资轿车“富康”在神龙襄樊装试厂顺利通过工艺调试，正式拉开了东风公司轿车发展的序幕。1993年2月26日，神龙轿车项目第一期工程在武汉沌口开工奠基，神龙公司进入实质性的建设期。同年9月8日，总装线启动，到12月6日，调试装车1000辆。

改革调整，江总书记送来礼物

20世纪90年代，东风汽车公司为彻底解决产品结构偏窄的矛盾，勒紧裤带，义无反顾地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开展以轻轿车建设为重点的第三次创业。但由于自身财力所限，轻轿车建设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支撑，而造成贷款规模攀升，财务费用过高，企业发展难以步入良性循环。

1999年，东风面临着现金断流的危险，几万名员工情绪低落。恰在此时，1999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东风，带给东风2万辆军用卡车的订单（总货款15亿元人民币），并指示：二汽有困难，各个部委都得支持和帮助。时任总经理苗圩提起这段往事依然会眼眶发红：“15亿对东风这样一个企业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它的精神价值远远大于实际的物质价值。那个时候，我们到哪里都抬不起头，到哪里听到的都是指责，这15亿让员工看到了希望。”

1999年11月25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与东风汽车公司控股子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23.4亿元

债权转股权协议在武汉签字。同年12月30日，东风汽车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等5家金融机构的“债转股”框架协议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澳门厅举行。这次东风汽车公司“债转股”协议总额为46.41亿元。“债转股”优化了公司的资本结构，缓解了公司的财务负担。同时，东风汽车公司成功地实现了股份制改造。

武汉，东风开放发展的实验场

1999年以后，历经改革脱困的东风汽车公司产销持续强劲增长，效益连年倍增。走出困境的东风汽车公司，不但重新回到中国汽车工业领航者的位置，而且改革发展步入一个新天地：由产品结构单一、市场应变能力不强的东风，发展成为产品宽系列、拥有市场发言权的东风；由管理一个工厂转变到管理一家集团企业；由一个在困境中艰难抗争的东风，一跃站到一个新的起点，满怀信心向着做强做大目标迈进；由一个位于鄂西北的东风，转变成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步入国际化经营的东风。但是，东风也深知由于特定的发展背景和地域环境，主业不突出，辅业太多，社会负担沉重，现有的技术储备和创新能力不能适应新的竞争要求，设备老化，产品急需升级换代，企业运营效率不高。这成为东风持续发展的内在制约。

2003年7月16日，东风汽车公司与本田公司在武汉以50:50的股比成立东风本田汽车（武汉）有限公司，起步产品为CR-V运动型多功能越野车。东风与本田整车合作项目，为中国汽车业界传扬的“在融入中发展，在竞争中合作”的“东风模式”

再添活力，实现了东风与本田的“三步走”（零部件——发动机——整车）战略。

同年，东风汽车公司作为国有独资公司，与国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 57.14:42.86 的比例组建成立东风汽车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母公司代表国有公司出资人，行使战略决策、资本运营、跨国运作、多元化经营等重大职能。按照决策中心、信息中心、管理中心、控制中心等职能的定位，对下属子企业单位的资产收益、重大决策、重要人事实行有效管理。同时，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

总部迁移武汉的那些事儿

2003 年 9 月，东风总部迁址武汉。将行政中心迁至武汉，是东风公司着眼国际竞争合作、实现做强做大战略目标的重要一步，标志着东风在推进国际合作、深化内部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又迈出重要一步。

东风总部迁移武汉是一次成功的战略迁移，是事业发展的内在需求。随着东风的进一步发展，十堰的地理和区位优势与汽车产业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和产业关联度高的特征已不相适应，其资源禀赋已不能满足东风发展的需求。以十堰基地为依托，向山外发展，成为东风发展的必然选择。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 WTO，汽车业面临巨大的机遇与挑战，东风确立了“融入发展，合作竞争”的战略目标，并加快了战略重组和国际合作步伐。随着与悦达起亚、日产、PSA、本田等跨国汽车公司一系列重组与合资案的进

展，融入国际化竞争大循环的大东风发展战略日益彰显。

面对中国汽车业高速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以及跨国汽车集团纷纷来华投资的新形势，东风总部必须适应国际合作的需要、汽车市场竞争的需要和自身全新布局的需要，实施战略性迁移。

由于涉及东风公司十堰基地 10 万名职工的稳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东风公司一直承受着较大压力。迁址武汉，几度动议，几度搁浅。为加速推进新体制的调整到位和理顺各方面关系，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在与各方充分沟通下，东风公司 2003 年 9 月正式将行政中心迁至武汉。时任东风公司总经理苗圩曾表示，东风公司最终决定总部迁移武汉，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总部迁往武汉，可以解决蜗居深山、交通不便给东风公司带来的许多不利影响。十堰地处秦巴山区腹地，当时进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火车，坐火车由武汉至十堰最长时间需 10 多个小时，火车提速后也需要五六个小时。交通不便使东风公司在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对外合作等方面丧失了不少大好机会。

其二，总部迁往武汉，可以解决东风公司人才、技术和信息等资源相对匮乏和不足的问题。武汉地处华中，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众多，人才、科技和信息资源集中，区位优势明显，整体对外辐射能力强，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此前，东风公司将神龙汽车和电动汽车项目放在武汉建设，从中已尝到了不少甜头。

其三，武汉尤其是其中已初具规模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外来企业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2003 年 9 月 28 日，东风公司在武汉经

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了总部新址建设奠基仪式。以此为标志，东风总部正式由地处鄂西北深山的十堰迁移至有着“九省通衢”之名的武汉。此次迁移涉及东风总部的12个职能部门和6个项目平台小组。

东风公司总部搬迁至武汉之初的办公环境非常艰苦，曾租用中信大厦办公两年多，当时总部只有一百余人。即使这样，公司仍然义无反顾地把管理重心移到山外，目的就是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谋求事业的更大发展。借助总部掌控东北、西北、华东、华南等地的子公司，东风公司加固了其产品链条的衔接。

200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东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扛鼎湖北汽车工业发展，这对于推动湖北打造中部崛起战略支点，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如果从2004年中部崛起战略提出算起，至今已经过了17年。这些年来，东风的快速发展大大拓宽了湖北汽车产业和区域发展的空间，为湖北工业树立了一道标杆。一股发力的冲动在产业间萌动，激发了湖北工业深层次的“脱胎换骨”。

湖北汽车工业更趋成熟，现代服务业愈加丰满——以东风完整的产品格局为先导，需求拉动，省内汽车零部件品种齐全、配套能力极强。伴随着零部件和整车运输需求的提升，一批现代物流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涵盖汽车金融、售后服务、二手车交易等领域的汽车水平事业的繁荣，加速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主要布局于湖北境内的东风自主品牌年度销量历史性跨上百万辆台阶。自主商用车传统优势得到巩固，湖北首个自主乘用车品牌得到市场认可。新能源汽车方面，湖北

初步形成了整车、电机和电池等较为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拥有了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行业企业。东风襄樊基地和武汉基地双双列入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成为国家探索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施载体和战略性功能区。

湖北保持了产业投资的强劲增长势头，投资需求结构更加合理——东风乘用车公司、东风十堰新基地、零部件工业园、东风本田、岚图、东风新能源工业园等一批投资额巨大的重大项目建设，拉动了湖北工业投资的增长，进一步提升了产业投资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使湖北经济发展格局更加合理。

湖北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掀起了大型跨国公司来鄂投资的浪潮——东风与日本、法国、美国、韩国等汽车巨头的成功合资合作为湖北省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口碑。如今，法国在华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集中在湖北，与美国康明斯的成功合作吸引了美国信息、通讯等现代制造企业的到来，韩国工业园、日本工业园林立而起。

作为湖北省经济的“顶梁柱”，东风公司与湖北省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荆楚大地涌现出了一个个与汽车有关的现代化都市——中国车都、中国汽车新城、国际商用车之都、中国专用汽车之都……它们依托东风，协同前行，差异化发展，为湖北经济重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谢勤：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部干部）

一路风雨一路行 ——见证武汉城市转型

◇ 袁善腊（口述） 周 敏（整理）

我是1976年2月从蒲圻县（现赤壁市）羊楼洞茶场抽调到武汉市农业局工作的，1983年8月调市委研究室，1991年调东湖开发区，2000年至2012年1月在市政府工作。30多年间，我参与并见证了武汉市综合配套改革的全过程，更是见证了武汉这座老工业城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杀出一条血路并走向复兴的艰辛。

在市政府工作期间，我曾经分管外经、外事工作，看了很多武汉的友好城市。改革开放初期，外交部给武汉推荐的几个友好城市都是以传统工业著称，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德国的杜伊斯堡、美国的匹兹堡，都是著名的老工业城市。这些城市的政府代表团、企业代表团来武汉考察，包括我们去这些城市访问，从相互交流的信息来看，在老工业城市转型中，武汉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典型。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老工业城市转型

和发达国家一样，都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调整过程。如，杜伊斯堡所处的德国重要的鲁尔工业区，很多煤矿都关闭了；曼彻斯特是世界最早的纺织工业基地；匹兹堡曾经是美国最早的钢铁生产基地，也是美钢联总部所在地。这些城市都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初步完成了转型调整。我曾经陪同杜伊斯堡市市长绍兰德先生考察武钢，他当时认为武钢的改造升级很成功，很了不起，对武汉的发展给予了很高评价。

最近，我看了世贸组织发布的2021亚洲百强城市榜单，武汉位列第15位。中国同样是老工业基地的城市中，武汉处于前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武汉的崛起。

关于武汉这座老工业城市的成功转型，可谓一路风雨一路行，涉及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件事。

市委、市政府下决心建设两个国家级开发区，抢占新兴市场制高点

改革开放之初，武汉这座曾经有着光荣历史的老工业城市，正经历着一个痛苦的调整。在对外开放的冲击下，沿海城市及发达国家的产品长驱直入，武汉的传统产业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寒冬，面临着调整、转型的艰难选择。当时，我们拥有10多万名产业工人的纺织工业，由“摇钱树变成了苦菜花”；食品工业被批评为“吃广东粮，喝珠江水”；不论是“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还是“新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都被挤出了市场，包括曾经风行一时的荷花洗衣机、长江音响、莺歌彩电，无一幸免。那是武汉产业发展最艰难的时期。即便如此，市委、市政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毫不动摇。记得王群老书记多次在市委会议上强调一个观点：决不保护落后，不怕打破坛坛罐罐，要通过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我曾经参加市委一个小型座谈会，时任市委书记郑云飞要求市纺织局尽快拿出“关停并转”方案，市政府提出政策支持。市纺织局领导最担心的是10多万名员工怎么办，郑书记明确提出武汉纺织行业现有装备迟早要被挤出市场，早调整早主动。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武汉市在1991年前后启动了国家级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

要建设，首先就面临一个资金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吴官正同志任市长时，全市一年财政收入仅10亿元；赵宝江同志任市长时，全市一年财政收入也只有50亿元；90年代后期，王守海同志任市长时，全市一年财政收入才达100亿元）。当

时，开发区仅“七通一平”每平方公里就需投入4亿元，这对于90年代初只能“保吃饭”的市财政而言是非常艰难的。为此，市委、市政府提出“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即开发区的供水由市自来水公司负责投资，供电由市供电公司负责，通信由市电信公司负责，道路由市建委负责……动员全市勒紧裤带，集中力量，建设两个一流开发区。记得赵市长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他陪同李鹏总理考察武汉的两个开发区，总理关心地问市领导，武汉哪来的财力同时大规模建设两个国家级开发区？

30年过去了，如今两个开发区已成为武汉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已成为武汉快速成长的主引擎。就全国而言，这两个开发区的综合实力也处于同类开发区前列。据统计，目前两个开发区内的员工数已超过100万名，其中邮科院3万人、华星光电1.5万人、联想1万人、华为7000人，也就是说在一批传统产业衰落的同时，资金和劳动力实现了向新兴产业的流动。

我是1991年7月23日到东湖开发区工作的，正是建设起步的时候（开发区于1988年初创，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高新区）。记得当时区内仅有100多家企业，年财政收入1000万元。到2020年，开发区市场主体已达16万余家，地区生产总值达2001.85亿元（疫情下仍实现5.1%的正增长），GDP总量和增幅、工业投资总量和增幅、招商引资到位资金总额等重要经济指标都位列全市第一。最重要的还是产业竞争力，科技部官方微博“锐科技”发布的“高新区发展30年”专栏第一期——《“因光而兴、聚光成谷”——东湖高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一文介绍：30年来，东湖高新区坚定不移发展高新产业，培育形

成了以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等五大千亿级产业为主导，集成电路和新型显示、数字经济两大新兴领域蓬勃发展的“5+2”产业体系。其中，光通信产业优势进一步加强，是我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生产基地和最大的光通信技术研发基地，也是全国三大激光研发和产业基地之一（以中国信科、长飞光纤、华工科技为代表）。生物产业领域，光谷生物城综合实力位列全国108个生物产业园区前三位。半导体产业上，总投资300亿美元的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长江存储正在加快建设，32层三维闪存芯片实现量产，64层三维闪存研制成功；总投资过1000亿元的全球最大中小尺寸显示生产和研发基地基本建成，形成了面板、模组、终端产品等较为完善的光电显示产业链，“芯屏端网”万亿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雏形初显。

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给武汉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首先是全省18家烟厂的重组。湖北是烟草大省，却不是烟草强省，经济效益曾长期排在全国20多位。主要原因是湖北小烟厂太多，卷烟品牌长期处于“战国时代”。18家烟厂有如18路诸侯，各自为政，多数企业经济效益难如人意。即使是武烟，年产量也一直在50万箱左右徘徊。

2002年年初，有关部门对湖北烟草工业进行了一次调研，结论是：如果三五年内武烟还不能发展壮大起来，进入国内六七家烟草寡头行列，就极有可能被别人吃掉，湖北省、武汉市的最大税源就将流失。要么异军突起，要么等待重组，到了必须作出重大抉择的“十字路口”。为此，省委、省政

府决定实施“以武烟为主、实施全省烟草整合”战略，做大做强武烟集团。市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2003年4月，专门把市委常委彭明权同志派去武烟集团，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全力抓这项工作。我没有参加武烟重组的全过程，只参加了部分会谈，记得几件小事。

联合重组的第一个目标是宜昌的三峡烟厂。2003年年初，陈训秋书记带队，田承忠副书记、彭明权常委和我参加，启动了和宜昌三峡烟厂的谈判。陈训秋同志是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和宜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座谈，他讲话很谦虚，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是落实俞书记、罗省长、坚卫常务副省长的指示精神，推动湖北烟厂重组。”吃完晚饭后，田承忠同志、彭明权同志和我一起，就武烟兼并重组三峡烟厂与宜昌方面展开具体谈判。整个过程很艰难，分歧点是“同增同减”还是“保8%定额增长”，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4点钟。武汉的意见是“同增同减”，宜昌要求“保8%定额增长”。第二天一大早，谈判继续。10点左右，双方终于就兼并重组达成一致，按定额增长方式签字。记得陈训秋书记很高兴，他在签字仪式最后讲话中说“今天的签字仪式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后面的重组谈判我没参加，但知道田承忠同志调到襄樊任市委书记，襄樊烟厂的谈判很顺利，按同增同减方式签约。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第二件小事是开拓全省卷烟市场。彭明权同志主持武烟工作后，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抓市场。当时湖北烟草市场以湖南常德烟厂的占有率最高，特别是在荆州一带。也是在2003年年初，段轮一同志到荆州担任市委书记，用了很大精力，让汉烟尽快进入荆

州市场。可以说，省委的决策，各地市都是全力支持的。

第三件小事是2007年的年末，我接到市政府通知，根据罗清泉书记要求，我陪同李春明副省长、彭明权董事长到哈尔滨，争取武烟集团和黑龙江省烟草合作。当时我们得到消息，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钱运录同志即将到北京工作了。这是涉及80万箱指标以及东北大市场的大举动。记得当天下午近5点，我们一行人到了哈尔滨，晚上6点，钱运录同志及省烟草局局长接待了湖北省代表团一行，双方谈得很顺利。

现在武烟集团已进入全国前列，年利税稳定在700亿元，高档烟已超过上海烟厂，这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对恩施、红安、大悟等贫困山区小烟厂提供了财税保障。大概在五六年前的一次全国两会上，恩施州州长就说：“感谢俞主席支持烟厂重组，我们现在一年就有60亿税收。”

第二是东风汽车“下山”。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风起云涌，偏居秦巴山区的东风公司备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和人才难聚的切肤之痛。一系列问题深深困扰了企业的发展，阻滞了企业前进的步伐。20世纪90年代初，东风公司开始实施“三级跳”的战略构想，但公司总部迁址一事，几度动议，几度搁浅。进入新世纪，在省委的大力支持下，东风总部终于搬迁至武汉。我记得苗圩同志是2005年5月调任武汉市委书记的。东风总部搬迁武汉的决策，给十堰压力很大，但省委态度很坚决：东风总部不搬迁武汉，就有可能搬到广州或其他沿海大城市，这也是东风公司作为国际性大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当然省委、省政府也给了十堰很好的政策，做出了统筹安排，最重要的是税收保基数、保增长。

现在看来，这个决策对东风公司、对武汉开发区的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上汽通用在武汉建基地也是省委、省政府积极支持的结果。2011年下半年，上汽通用悄悄启动第四基地选址，目标位置是中西部。听到风声，成都、重庆、郑州、长沙等迅速加入竞争行列。记得2011年9月27日，我陪段轮一副省长带着李鸿忠书记、王国生省长致俞正声书记的亲笔信，飞赴上海，争取上汽通用在武汉建厂。这一项目，湖南、河南之前已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是抱着即便只有一线希望，也要全力争取的态度去的。记得刚下飞机，就听到了上海地铁出故障的新闻。我们当时还担心俞书记会见的事可能改期。晚上，段副省长告知我，明天上午会见时间不变。会见前，俞书记秘书李强要求我们控制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但那天俞书记很高兴，他非常关心湖北、武汉的大项目，包括武烟重组、半导体芯片项目、80万吨乙烯工程等等，整个汇报会持续了近一个小时。10月2日，国庆节的第二天，我们就接到上汽集团的通知，我又陪着段轮一副省长赶到上海，和上汽集团会谈。上汽董事长胡茂元、总经理陈虹、总工程师及规划部负责人都参加接待。公司办公室主任跟我们讲，公司高层都参加，表明对这件事的高度重视。一见面，胡茂元董事长就和段轮一副省长说：“今天我们就是研究落实俞书记指示精神。”到武汉投资的意向非常明确。当然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还有大量具体工作要做，比如需要做好东风公司的工作，协调三江集团将三江雷诺汽车牌照转让给东风公司，还有湖北三环集团将汉阳特种汽车的牌照有偿转让给武汉。这些都是在省里支持下做的。这样，既稳定了东风公司的工作，也确保了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的项

目审批。现在，上汽通用在江夏基地产销形势非常好，显示了其强大的竞争力。

第三是支持武汉建设80万吨乙烯工程。乙烯工业是石化工业的“龙头”，其生产规模 and 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石化工业技术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武汉就积极争取乙烯项目，1975～1979年，曾组建了武汉第一个乙烯办公室，洪山区那块地，市委、市政府一直为乙烯项目预留。但国家乙烯项目布局一直放在长三角、环渤海湾和珠江三角洲。

2003年2月，省委、省政府抓住中石化集团主要领导到湖北武汉考察的机会，正式提出武汉石化上马乙烯工程。到2007年12月，武汉乙烯工程开工，前后5年时间，从中石化到国家发改委、环保部、国土资源部，一直到国务院分管副总理、总理，都是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一起努力去争取。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记得很清楚。2004年元月17～18日，应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武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邀请，中石化王基铭总裁、章建华副总裁带领中石化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行来武汉商讨发展湖北武汉石油化工产业事宜。其实，王基铭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与长航方面谈判终止内河原油运输合同。中石化建设的仪长（仪征——长岭）原油输送管道计划当年投产，但问题是，中石化此前与长航有运输合同，长航还专门购买了船只。这次武汉之行，王基铭担子不轻。由于王基铭先前对武汉发展乙烯项目有一定顾虑，武汉方面对王基铭此行高度重视，市委书记陈训秋全力以赴，全程陪同王基铭，包括王基铭与长航总经理刘锡汉的谈判都陪同参加了。陈书记利用各种场合做工作，阐明武汉建设80万吨乙烯项目的理

由。几天下来，王基铭很受感动，虽然他的态度依然谨慎，但已经有了明显转变。元月18日，中石化、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三方共同签署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武汉石油化工项目的会谈纪要”。在此后的工作中，王基铭总裁成了武汉80万吨乙烯工程的坚定支持者，即便退居二线仍然关心并支持武汉乙烯工程。

省、市领导对这一项目的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包括白玉山的农民还建房，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都是亲自关心过问。时任市委书记苗圩要求确保拆迁农民安居乐业，确保还建房2009年建成交付使用。那段时间，我先后陪同杨松书记，周坚卫、李宪生常务副省长，阮成发市长分别到工地调研。经过各方努力，农民还建社区于2009年9月竣工，12月农民开始入住，共提供住房3500套，门面房6万平方米，安置村民约7000人。

现在，80万吨乙烯工程是青山地区效益最好的工程，每年100多亿元的税收，利润20多亿元。2021年4月，王忠林书记、程用文市长还拜访了中石化领导，武汉80万吨乙烯项目还将进一步扩产。

第四是支持武汉高起点发展半导体产业。芯片作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代表了目前人类制造最精密的工艺。记得2002年3月，周济同志担任武汉市市长期间，我陪他去美国考察Intel公司。考察之前，周济同志就和我讲：“光谷仅凭光通信是站不住的，要想达到硅谷这样的水平，必须上半导体和TFT（玻璃基板技术）项目。”可以说从那时开始，市里就着手布局半导体和TFT产业。应该说，这是很有远见的。当时正好有一个信息：中芯国际想在国内扩产、建

厂。我和唐良智同志马上到上海，访问中芯国际。总体来说，谈判很艰难，中芯国际新布点这么大的企业，它自身又没有资金，很是犹豫。2003年8月，省里接待港澳代表团到三峡考察，知道了中芯国际总裁张汝京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市委马上派张代重副书记赶到宜昌，一下船就把他请到武汉来了。省里、市里都非常重视，盛情接待，俞书记、罗省长多次接见张汝京，下了很大的决心。张汝京后来回忆说：“政府有这样的意愿，中芯有这样的发展规划，我们自然就走到一起。”当然谈判过程也很艰难，中芯国际有意促成项目，但核心问题是它不出钱。

2006年3月，俞书记、罗省长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委托周坚卫副省长召集有关方面研究资金落实问题。周坚卫同志主持会议，当时定了两个政策：第一是资本金20亿元，按3:3:4比例，省政府出30%，市政府出30%，东湖开发区出40%。此前，省政府从来没有为一个项目拿这么多钱出来，6亿元现金。在省、市共同努力下，2006年6月28日，中部地区第一条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在东湖开发区破土开工。武汉芯片厂由湖北省、武汉市和东湖开发区联合投资建设，产权归武汉新芯公司，委托中芯国际经营管理。以光电产业著称的“光谷”，由此结束了“无芯”的历史。

第二个政策更是延续到现在，就是东湖开发区的税收新增部分上缴省里全额返还。当时东湖开发区上缴省里的还不多，所以省财政厅罗辉厅长说他是咬着牙答应了。没想到后来多了，现在一年就是几十亿元的返还。省、市领导换了多届，这一政策到现在都一直在执行。这不容易啊，是省里对开发区、对武汉的巨大支持。为什么东湖开发区敢上这么多项目？两个TFT、一个半导体，

省、市资金给予了很大支持。两个TFT项目，一个华星光电、一个天马，如果加上东西湖区的京东方项目（10.5代液晶生产线），武汉市就有三个TFT项目、一个半导体项目，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全国都少见。这些都属于资金密集、人才密集、技术密集的项目，都处于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高端、前沿。

半导体项目涉及银行贷款。记得我和孙亚同志陪同苗圩书记向国家开发银行陈元董事长汇报100亿元贷款事宜时，陈元董事长当即表态：半导体产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不仅仅湖北省、武汉市政府要支持，国开行也要全力支持。为防止汇率风险，国开行先安排10亿美元贷款，不足部分再安排人民币贷款。国开行资金确保了中芯半导体项目顺利启动。

市委常委会研究确定这个项目时，苗圩书记要求办公厅向每位与会者发一本胡启立同志主编的《“芯”路历程》，这本书介绍了上海“909”工程，即由中央政府投资100亿元的半导体工程。考虑到常委会上争议很大，苗圩书记要求每个常委会后在会议纪要上签字，这是很不容易的。武汉半导体项目的上马，可以说意味着在新一轮竞争中，武汉在高科技领域抢占了制高点。

第五是省、市全力支持武钢、武船、武重、武锅、长动、461、471等老工业改造，使得我市钢铁及装备制造业继续保持了竞争优势。我记得当时武钢的两个“五年计划”，投入1000亿元，省、市都给予全力支持。武钢现在的硅钢、汽车板、高铁轨道钢、桥梁钢都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武重、武锅、长动、江车、武车的整体搬迁改造，都是省、市领导出面，给予支持。这一批老企业完成整体搬迁，大大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

汽车、钢铁、石化三大产业是一个国家腾飞的基础。客观说，武汉市这三大产业都具备国际竞争力。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省委、省政府这些年来的重大决策，为武汉复兴、为武汉走上健康发展快车道打下了坚实基础。

武汉抓住了中央启动内需的机遇，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民生工程进行了大规模投入，实现了老城市脱胎换骨的改造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重创，各国实体经济出现不同程度的放缓或衰退。针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政府迅速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于当年11月推出4万亿元投资计划以及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

实际上，当时理论界对中央4万亿元启动内需投入颇有争议。我从武汉这座老工业城市实践看，认为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刺激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据统计，2007年武汉固定资产投资为1700亿元，到2010年达到3700亿元，三年时间增长近1.2倍。那几年，城市的拆迁量一年就达到2000万方，对武汉这个老工业城市而言，真正实现了脱胎换骨般的改造。包括硚口区整个化工片的外迁，武重、长动、武锅等一大批老企业外迁，实

现了“腾笼换鸟”。同时大规模启动了轨道交通建设，开工建设二七长江大桥和城市三环、四环。这一时期，天河机场三期、武汉城市圈城际铁路、武汉新港、花山新城、汉街也先后开工。另外，民生工程也抢抓了一批项目，新建了市中心医院后湖分院、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市精神卫生医院、市中医院改扩建都获得了中央财政支持，同时完成了市儿童福利院、市第二社会福利院的搬迁等。2009年，国家又拿出460亿元，用于解决国有困难（破产）企业退休人员社保统筹的遗留问题。其中，拨给湖北省的有26亿元左右。武汉老企业多，改革改制留下的包袱很重，市级财政压力很大。为了争取省里对武汉市加大资金支持，杨松书记亲自出面，三次和分管副省长张岱梨同志以及省人社厅、财政厅、发改委的领导座谈沟通，最终做通了省里的工作，拨给武汉的资金从2亿元增加到8.3亿元，加上我们自己匹配一部分资金，使得我市遗留下来的15.6万名退休人员全部纳入社保统筹范围。紧接



2007年，省、市领导在乙烯拆迁现场检查指导工作，左一为袁善腊

着,武汉市又一鼓作气,将8万特殊人群——“五七工”“家属工”也纳入养老保险,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遗留问题。

武汉城市转型的故事还有很多。如1984年,武汉市计划单列,享受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1993年,中央又批准武汉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激发了城市活力。又如三峡工程的建成,为武汉提供了一个稳定发展的环境。市委、市政府坚持调动各城区积极性,形成了竞相发展的局面,武昌区、江汉区、东西湖区财政收入目前都在200亿元左右,江夏区、黄陂区财政收入也过了百亿元,各区发展了,实际也增强了整个城市的抗风险能力。在工程设计领域,大桥工程局、中铁十一局、中建三局、中交二航局、一冶、中冶南方、铁四院等一批大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上也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再如我市的现代服务业一直保持了强大竞争优势,尤其是商业,记得多年前,老领导王明权曾称赞武汉商业的红旗不倒。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商、中百、中商等商业龙头企业,在保证市场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在电商和国外商企大举进入武汉市场的背景下,武汉商业也保持了很强的竞争力。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武汉的软实力。我曾经在很多场合提到:企业是城市的脊梁,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建党百年之际,应《武汉文史资料》之约,将城市转型往事成文,以期存史、资政,颇多感触。我曾看到网上一篇财经报道,评价武汉的产业转型:对武汉这么一个中部老工业城市来说,在一部分传统工业衰落的同时,竟然发展出了四个全新的支柱型产业,这种成绩真如神迹一般!当然这些不是几年干得下来的,一方面是全省集中力量支

持武汉的结果,武汉也不负众望;另一方面是多届市委、市政府数十年如一日,咬定目标,锲而不舍,接续奋斗,长期耕耘的结果。

怎么保持武汉今天发展的势头,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如何在新兴市场中保持强大竞争力,我认为一定要有危机感,一是在高科技领域,要关注人工智能、互联网(武汉缺少腾讯、阿里、抖音等量级的企业)、5G及生物技术;二是围绕中央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在新能源产业上抢占制高点;三是在创意产业、文化产业上要有大的突破(国内学习长沙、杭州,国外学习日本、韩国);四是继续保持现代服务业的竞争优势,特别是重视传统商业的转型升级。我看到消息,沃尔玛投入巨资开发在线销售网站,阿里巴巴、京东,包括亚马逊也纷纷进军实体零售市场和无人商店领域。市场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的传统商业如果不转型,也面临着淘汰。

值得高兴的是,习总书记最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支持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武汉发展提供了又一个千载难逢的新机遇。在中央支持的大环境下,有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全市上下接续奋斗,武汉一定会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好势头。

(袁善腊:原武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敏:《武汉文史资料》副主编)

武汉长飞光纤光缆项目建设回顾

◇ 杨能森

(一)

1984年年初，我从市民用建筑设计研究所（现更名为武汉市民用建筑设计研究院）调至市计划委员会（简称市计委），并被安排到基建计划处工作。当年委内处室调整，基建计划处一分为二，调整为基建投资计划处和基本建设管理处，我被安排在基本建设管理处，主要职责是负责建设项目的设计审批，竣工验收及项目建设过程中跟踪、协调和服务等管理工作。当时，正值武汉市成为计划单列市初期，即武汉市享有基本建设计划直接对口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的权力，基本建设项目可直接对国家计委上报计划和申请补助资金。全委各处室在市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热火朝天、集中精力编制上报国家计委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大约向国家计委上报了120个工程项目，从而开启了武汉市计划单列后基本建设的新局面。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湖北省、武汉市的决策者们以超前的战略眼光和胆识，多次召集省、市各相关部门领导和专家进行战略研讨，组织调查小组深入调研，在全省营造“充分发挥湖北武汉的科教优势，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舆论氛围。

1984年5月，国家计委以计交（外）〔1984〕955号文批准引进光缆通信成套技术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当时该项目为邮电部直属项目，最开始邮电部并没有明确将其定点在武汉市，而是在邮电部所属山西电缆厂等地进行筛选。

得知此情况后，市政府及分管市计委工作的副市长姜兆基等领导果断决策，对该项目的厂址选址、水电配套、优秀人才引进和资金大方向提供了不少优惠条件，促成了邮电部同意将该项目定点在武汉市。姜兆基等领导之所以对这一项目高度重视，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该项目属高新技术项目，前景光明，对武汉市功能提升大有好处；以

武汉邮电科学院的技术优势作为支撑，对项目的后续发展大有好处。经过努力，国家计委以计交〔1986〕2332号文《关于武汉光纤光缆生产线项目可行性研究修改报告的批复》，同意邮电部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委托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作为中方合营者与荷兰飞利浦公司成立合营企业，合资建设、经营光纤光缆厂。

由于武汉市政府及分管市长重视，狠抓各项配套工作的落实，我委各处室工作认真到位，项目进展顺利，各方对项目前期工作比较满意。1987年，国家计委以计交（贸）〔1987〕1673号文《关于武汉光纤光缆生产线项目改变隶属关系问题的批复》，同意该项目由邮电部直属项目转为武汉市地方项目，以武汉市为主进行经营管理。1988年，外经贸部批复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合同和章程。该项目能落户武汉建设，这是我委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特别是在姜兆基副市长的直接指导下，对项目全方位积极跟进、配合、争取、参与、协调努力的结果。

（二）

长飞光纤光缆建设项目是“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是适应我国邮电通讯事业发展的需要，由邮电部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武汉市信托投资公司和荷兰飞利浦公司三方合资，并引进飞利浦公司PCVD光纤制造技术（等离子体激活化学气相沉积工艺）和NKF公司光缆成套生产技术的规模较大的高新技术中外合资项目。工程初步设计由飞利浦公司AIB工程部和机电部电子第十一设计院联合设计（简称十一院，地址在四川绵阳），施工图由十一院设计，工程施工由冶金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施工总承包。

长飞项目初步设计阶段，先由荷方提出项目的设计方案、相关资料和设计参数，由十一院完成初步设计的初稿后，长飞公司组织相关部门的人员于1989年1月赴飞利浦公司AIB工程部进行中荷双方的设计联络工作。赴荷兰设计联络的人员有长飞公司董事长赵超凡、办公室主任兼翻译吴志强、光纤厂负责人黄成浦，十一院参与工程设计的各专业主要设计人员，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副总经理王明焕、计划处处长，武汉市建筑设计院戚传斌和我（时任市计委基建处处长）。其目的是参观荷兰埃因霍温市荷方的光纤工厂，了解、学习和考察该厂的相关情况，并与飞利浦公司AIB工程部的技术人员对十一院提供的初步设计初稿按专业逐个进行技术交流，从工艺流程、设备布置、选型、各种工艺管道布置、拉丝车间净化处理、建筑平面及空间布置以及技术参数取值是否合理进行交流、商讨和研究，以保证设计符合引进的技术先进性。

在荷期间，我们每天进行交流和讨论，经过半个多月的有效工作，设计联络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为提供正式的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按照国家规定，初步设计审批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重要程序，此次设计联络为初步设计的正式审批创造了条件。在荷方举行的有飞利浦公司领导及技术人员参加的中荷双方全体人员欢迎会上，我代表武汉市对荷方的工作安排表示衷心感谢，并且阐述了武汉市政府对长飞公司项目的重视、关心和支持，祝设计联络进展顺利，项目合作成功、愉快。联络期间，1月17日，我和长飞公司吴志强、黄成浦等同志到长飞公司项目第一任总经理贝克先生家走访作客（贝克先生是荷方的光纤专家），感谢贝克先生为设计联络的良好

安排，使联络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完成联络工作的各项任务即将回国时，飞利浦公司相关领导施密特先生在埃因霍温市旅荷华侨开设的中餐馆为中方全体设计联络人员举行欢送晚宴，祝贺设计联络工作圆满成功。回国抵京时，我向邮电部基建司领导报告了赴荷设计联络情况，并受到邮电部分管基本建设工作的副部长吴基传的接见，吴部长对赴荷设计联络及武汉市对长飞项目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并祝项目进行顺利、成功。

由于前期工作较充分，市计委及时组织了全市各相关部门和部分专家对长飞公司项目进行了初步设计的审批、协调，解决了存在的问题。初步设计顺利通过，市计委以武计管〔1989〕100号文《关于中荷合资武汉长飞光纤光缆生产线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加速了施工图设计的进程，为施工准备创造了条件。为了使工厂建成后能及时投产，我委又以武计管〔1990〕118号文《市计委关于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缓建800平方办公室提前建设的批复》、武计交〔1990〕160号文《市计委关于建造外籍专家住宅工程项目的批复》，提速相关配套工程的建设，为试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

长飞光纤光缆项目于1989年8月26日开工，1991年年初基本建成，从国外引进的光纤光缆生产线，在以外方专家为主、中方专家配合的双方共同检测后，光纤生产线于1991年5月投入试生产，光缆生产线于1991年9月投入试生产。到1992年5月，光纤达到年产60000公里、光缆达到年产6000公里的生产能力，超出了合资合同要求年产光纤48000公里和光缆4500公里的设计生产规模，产品质量优良，长飞公司成为我国最大生产能力的光纤光缆企业。工

程按要求全部建成、各单项工程已组织单项验收合格的基础上，市计委于1992年11月及时组织了项目的初步验收，对项目的竣工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审查，检查了各单项建筑工程和配套设施，参观了光纤光缆生产线，了解了光纤光缆生产经营情况，审查了工程竣工图纸和有关的原始资料记录及项目投资使用情况。初验小组认为长飞公司提交的竣工报告如实、客观地反映了建设工程总的情况，工程建设文件、图纸、图片等资料收集比较齐全、分类有序，经过试生产，其生产能力超过设计规模，产品质量优良，具备正式验收的条件。

（三）

初步验收后，1992年12月9日，我委及时以武计管〔1992〕603号文《武汉市计委关于中外合资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建设项目进行竣工验收的请示》上报国家计委，请国家计委组织项目正式竣工验收。

当年12月28日，国家计委以建设〔1992〕2591号文《关于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建设项目验收工作的复函》正式委托武汉市计委组织有关单位进行项目验收工作。经请示市政府，成立了以市政府为主任委员单位，国家计委重点建设司、邮电部计划司、武汉市计委、武汉市外经委为副主任委员单位，国家计委投资司、邮电部基建司、武汉市经委、武汉市重点建设办公室及市有关局等单位及部分专家为成员的项目验收委员会。市政府分管市计委工作的副市长吴厚溥为市政府的代表负责验收工作，各项准备工作全部由市计委负责，并由基建管理处具体实施，联系落实成员单位代表人员。为了感谢国家计委、邮电部、外经贸部等部

委领导对项目的支持和对武汉市的支持，经请示市政府领导同意，基建管理处代市政府拟定了特邀邮电部部长杨泰芳和国家计委国际咨询公司董事长兼国家计委重点建设司司长王武龙参加长飞项目验收的邀请函，由市计委主任楼隆极定稿后，请赵宝江市长亲笔签名。带着市长签名的邀请函，我和长飞公司总经理乔秉仁一起赴京，向邮电部和国家计委领导送达了市长的信函。1993年1月5日，邮电部部长杨泰芳在办公室接见了我和乔秉仁同志，欣然接受邀请，国家计委重点建设司王武龙司长也同意来汉参加验收。他们对项目都十分重视，对工程的顺利进行十分满意。

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1993年1月13~14日，在长飞公司对光纤光缆项目进行了国家级竣工验收。1月13日，由于北京各部委来汉参加验收的领导和人员较多，长飞公司与民航部门联系包了一架专机当天来回武汉和北京，以便北京客人的集中接送。杨泰芳部长等领导莅临武汉出席验收会议，对项目的建成和投产感到非常高兴。杨部长、湖北省副省长韩宏树、武汉市市长赵宝江在会议上对工程给予充分肯定，祝贺项目圆满成功。经过正式验收，验收委员会认为：该工程生产厂房、设备安装和配套设施已按批准的建设内容和设计要求全部建成，按照国家有关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评定标准进行了各单项工程验收，经过一年多的试生产，证明该项目生产工艺和设备是先进的，具有当代国际先进水平。工程建设进度快、质量好、效益高，是一项较成功的高新技术引进合资项目。

几十年来，长飞公司产品被广泛应用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信运营商，以及电力、广电、交通、教育、国防、

航天、医疗等行业。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开始建设的八纵八横通信干线，几乎所有国家一级通信干线全部或部分采用了长飞公司的产品。一些国家重点工程如西气东输工程、驻港部队通信项目等，也由长飞公司提供配套的通信光缆。长飞公司高质量的产品为我国通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为武汉市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长飞公司是武汉的知名企业，也是中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制造企业。它的发展无疑为“武汉·中国光谷”这只凤凰的涅槃提供了最为有效的保障和助力，也成为中国中部地区催生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大手笔和中国武汉的一张抢眼名片。

回顾长飞公司项目建设，市计委自始至终都参与其中，从委领导到各处室具体工作人员都尽心尽力为建设项目服务，发挥政府综合经济部门的职能作用，在工程建设的关键节点，参与、配合和协调工作，为企业排忧解难，从而促进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加快了项目的建成投产和效益的发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市计委从计划经济时代一路走到市场经济时代，名称从市计划委员会到现在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政府下设的国民经济发展综合职能部门。为党和政府当好参谋，策划和实施全市重大和有影响力的建设项目，推动项目建设，是其重要职责；为建设项目服好务，当好政府政策的参谋和践行者，为全市的经济发展尽职尽责，是每一个发改人的光荣和使命。

（杨能森：武汉市发改委原副巡视员）

我们走在脱贫攻坚路上

◇ 谭本忠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为脱贫攻坚提供了一把“金钥匙”。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为了兑现这个承诺，一场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战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

如果说脱贫攻坚是一场战役，农村便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精准扶贫则是斩荆棘、破瓶颈的攻坚利器，我们广大“三农”人就是脱贫攻坚的中坚力量。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让任何一个群众掉队，是我们“三农”人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

理清思路，精准组织

2015年对我来说是特殊的一年，市政府扶贫办公室设在当时的市农委，我作为市

农委主任，挑起脱贫攻坚的重担义不容辞。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成立市扶贫攻坚领导小组的通知》（武办文〔2015〕65号），时任市委书记、市长亲自挂帅，50余家市直部门共同参与，我被任命为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面负责领导小组的各项工作。责任重大，时间紧迫，我在接到任务后，随即协调有关市直部门，抽调专人，组建了综合协调组、统计分析组、督查考核组、宣传报道组、资金管理组等5个工作专班，并根据任务职责，将各项任务分解到人、责任到人，这便有了领导小组早期的组织构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员到位了，具体的工作怎么开展是摆在我面前的重要问题。我市属插花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蔡甸、江夏、黄陂、新洲4个新城22个街（乡、镇）。为了全面了解我市贫困地区的具体情况，正值酷暑，我带队分别赴蔡甸、江夏、黄陂、新洲等区开展

调研，广泛听取区、街（乡、镇）、村各级的意见和建议，认真梳理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帮扶需求等问题，以吃透民情。随后又组织专班赴鄂州市、随州市考察学习，借鉴省内其他插花贫困地区扶贫攻坚的经验和做法。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市直有关部门的对接协作，准确掌握各行业扶贫政策，积极争取支持，形成工作合力。

调研结束后，我便启动了全市贫困人口核查登记工作，为后续工作积累一手数据。经核查，蔡甸、江夏、黄陂、新洲4个新城地区当时共有贫困户80750户、贫困人口163031人，贫困村271个。进一步掌握了贫困人口底数后，我们立即根据贫困村、贫困人口分布情况和减贫脱贫年度计划，加班加点绘制了全市精准扶贫攻坚作战图，这为我们之后的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高度重视扶贫攻坚工作，先后召开7次专题会议、

3次市委常委会及市政府常委会听取全市扶贫攻坚工作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相关市直单位的支持下，我们组织拟订了“1+8”的文件，即1个《中共武汉市委 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力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的决定》（武发〔2015〕8号）和帮扶、投入保障、区级资金整合、激励、考核、问责、约束、精神支撑等8个配套机制文件，并积极克服人员不足、时间紧迫等问题，在蔡甸区召开了全市首次精准扶贫现场推进会，时任市委书记阮成发出席会议并讲话，时任市政府市长万勇作工作报告，对全市扶贫攻坚工作发出总动员。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在白云黄鹤之乡拉开了帷幕。

发挥优势，精准帮扶

作为市政府扶贫办主任，做好精准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组织实施至关重要；

作为市委农办主任，还要抓好农业产业扶贫、做好本单位对口扶贫。2015年10月，全市各单位组建市驻村扶贫攻坚工作队，进驻到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我带领市扶贫办专门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压实驻村工作队责任的实施意见》及《武汉市驻村帮扶工作考核办法》，加强对各级驻村工作队的管理。我局也第一



2018年4月，武汉市农委谭本忠主任（前）到新洲区李集街建新村督导精准扶贫工作，实地查看已建成的扶贫项目——90KW光伏发电现场

时间响应号召，先后共选派7名同志，全脱产参加驻村工作。工作队的到来，为贫困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工作力量进一步充实，实现了帮扶工作的全覆盖和精准发力。

扶贫要想长远，关键看产业。在夯实力量的基础上，我充分发挥农业局的各项优势，不断加强政策指导。2016年，在对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产业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武农文〔2016〕56号）；2018年，印发了《武汉市农业产业扶贫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18-2020年）》（武农〔2018〕30号），明确武汉市产业扶贫以绿色化、特色化、精细化、品牌化为主攻方向，以优化供给、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内涵式发展道路；2019年，成立了农业产业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了组织领导，印发了《构建农业产业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工作重点。

积极指导贫困地区做好产业规划，结合全市种植业供给侧改革，在平原湖区和土壤肥沃、地势平坦的地区，重点发展瓜、果、菜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在有种植水稻习惯的地方，发展稻田养虾、养鱼；在丘陵岗坡地和水源较差的地区，重点发展耐旱的旱杂粮，如薯类、甜玉米以及水果、茶叶、木本油料等。目前，全市贫困地区蔬菜生产面积达到6万亩，已有45个贫困村开展了稻田综合种养模式，享受市级稻田综合种养项目奖补政策面积达到1.59万亩，奖补资金710万元。

除此之外，品牌建设和电商发展也尤为重要。2016年以来，先后引导贫困地区申报认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179个，其中江夏山坡光明茶、黄陂黄牛被农业农村部评为

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在贫困村建设农村电商综合服务站271个，在贫困乡镇建设电商示范网店26个，引导贫困地区农特产品进电商销售，拓宽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

根据2019年年底的统计数据，我市建档立卡贫困户37226户，其中有劳动能力贫困户14948户。通过特色种养、加工、文化旅游、电子商务、现代服务等乡村特色产业带动贫困户9557户，带动率63.94%；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8473户，带动率56.68%。

全面发力，精准施策

2017年，为实现市委提出的武汉市要在2018年年底率先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任务，我多次向省、市相关领导汇报，积极争取加强市扶贫办的机构设置，增加专职扶贫工作人员。经过努力，当时的市农委（原市农业局）加挂市政府扶贫办的牌子，我担任市扶贫办主任，另外配了正局级、副局级的专职副主任各1名，下设3个处室，均配备了年轻有为、勇于担当的处长，力量大大加强。扶贫办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在2018年年底，完成了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出列的目标任务，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3.6%下降到2018年年底的趋近于零，基本结束了武汉市农村存在绝对贫困人口的历史。这份成绩单的取得极为不易，凝聚着无数扶贫干部的汗水和心血。借着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我市贫困村的面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欣喜地看到，271个贫困村都成立了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积极依托当地资源条

件，培育和壮大扶贫产业，发展村级集体经济。2018年，271个贫困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4406万元，村均收入达到16.3万元，改变了贫困村集体经济“空壳”状况，村集体有财力自主解决村级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我局对口帮扶的新洲区建新村为例，目前该村建有光伏电站1座，种植油茶700亩、绿茶及白茶150亩、黄金茶150亩，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不足3500元增长到2019年的15590元，村集体年收入从2015年的2万元增长到2019年的21.2万元。

我欣喜地看到，我市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没有劳动能力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对象全部纳入兜底保障范围，并定期调整保障标准。目前，武汉市农村居民每人每月680元的低保标准、1280元的特困供养标准远高于脱贫标准。

我欣喜地看到，蔡甸、江夏、黄陂、新洲四个新城区均开通了轨道交通。271个贫困村动力电、公交车、通讯、宽带、广播、电视信号实现村村通，硬化路实现了湾湾通。“四个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实施，农村居民逐步过上亮化、洁化、绿化、美化的新生活。乡村游大幅升温，2019年全市赏花游（乡村休闲游）接待游客人数达5718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208亿元，辐射带动了革命老区发展。

我欣喜地看到，271个贫困村都建有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电商综合服务站、村卫生室、图书室、文化广场、健身器材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备了相关工作人员。全面推行“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改革，实行强化党务、规范村（居）务、优化服务、拓展商务、协调事务“五务合一”，村民看病就医、买卖

商品、存贷资金、办理事务基本可以不出村。

我欣喜地看到，我市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安全等四个方面问题开展“清零行动”。通过送教上门、特教助学解决少数上不了学的特殊儿童、少年的就学问题；通过调整规范“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补充保险”四位一体健康扶贫政策体系，加大社会救助、慈善救济等帮扶力度，确保“985”政策的平稳推进，贫困户看病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90%以上；通过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等“四类对象”住房开展全面排查鉴定，完成所有C、D级危房全覆盖改造；通过实施三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实现贫困户安全饮水100%达标。

授人以渔，精准长效

行百里者半九十。这些年，我作为全市脱贫攻坚的组织者、亲历者，见证了全市脱贫攻坚工作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厚积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一路蹄疾步稳、勇毅笃行。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又遭遇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给我市农业生产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冲击，这对我们巩固脱贫成果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虽然在2019年武汉市机构改革时市扶贫办已经单列出去，但作为市委农办主任和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我还担负着全市“三农”发展的重任和全市农业产业扶贫的责任。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从正月初三起就主动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始终坚守抗疫前线。在市委书记王忠林的指导下，我迅速召集市直相关部门成立了疫情防

控指挥部农村工作组，下设扶贫攻坚组，重点关注贫困户的生产生活现状，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排除万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为了大力扶持带贫主体复工复产，我们积极协调市财政局，落实扶贫小额信贷延期偿还政策，向有需求的农户给予贷款支持，为34户到期还款困难贫困户争取小额信贷延期共152.3万元。组织654家企业落实纾困资金5.9亿元。扶持贫困地区种植快生菜24794亩，落实奖补资金743.82万元。推动落实金融扶贫政策，发放扶贫小额贷款1.5亿余元。4月8日武汉实现“解封”前，全市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市级以上示范合作社、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复工率均达100%。

为了切实解决贫困地区农产品滞销的问题，我们组织新城区近150家农产品生产企业（含扶贫企业3家）建了农产品销售群，协调41家电商平台建了电商农产品采购群。为帮助蔡甸区消泗乡七壕村（贫困村）武汉七壕沉湖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鲜桃，组织电商销售扶贫企业农产品专场对接1场，成功对接美菜网、吉及鲜、兴盛优选、食享会等电商平台，帮销鲜桃8万斤。积极参与农超工贸对接会，帮助132家扶贫产品生产企业（合作社、贫困户、贫困村）畅通销售渠道，疫情期间，累计帮销扶贫产品达1.14亿元。

为了解决贫困户的农业生产问题，我们专门遴选了农业产业技术指导员，对全市271个贫困村提供一对一技术指导，重点开展产业研究、技术培训及对科技示范户的指导，农技人员通过电话、网络及应用终端先后为贫困村农户提供服务700多人次，利用市、区、乡推广体系，以文件形式发布14期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为了进一步拓宽贫困户的就业渠道，我们积极督导各区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复工复产，引导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优先聘用贫困户劳力，防止贫困户因疫情返贫。强化光伏带贫效益，进一步开发村级公益岗位，鼓励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强化就业扶贫政策落实。通过设立公益岗位、组织开展网上招聘、促进扶贫企业复工复产、落实各项就业补贴政策等多种方式，帮助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这场疫情的考验，让我更加明白，只有进一步建立健全扶贫长效机制，不断增强贫困户“造血”能力，才能切实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果，帮助贫困群众早日实现小康梦。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脱贫攻坚工作责重山岳，时不我待，唯有迎难而上、一鼓作气、撸起袖子加油干，落实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才能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在武汉脱贫攻坚的路上，我一直履职尽责，让我市脱贫攻坚成效得到人民的认可，经得住历史的检验，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谭本忠：武汉市政协委员，市农业农村局一级巡视员，本文写于2020年）

武汉有座习总书记批示建立的纪念馆

◇ 赵晓琳

位于汉口胜利街与黎黄陂路交界处的一座红房子是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现在这里已成为一座革命纪念馆。这座外观普通的纪念馆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自批示建立的。

意外的惊喜

2014年元月9日，我和筹建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专班的同事们获悉一个重要消息：五天前即元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湖北省委报送的筹建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的请示作出了批示，内容是：“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同时还获悉，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同意武汉市建立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名称为武汉

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新年伊始，这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极大鼓舞了武汉市文化局和所有参与筹建的工作人员。大家没想到，不仅筹建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获得批准，而且习总书记在百忙之中对建馆工作作了批示。兴建一座纪念馆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批示，这在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兴建史上尚属首次，其他工程项目也不多见。

筹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是武汉市委、市政府于2012年2月正式做出的决定。根据工作安排，武汉市文化局承担建馆任务，我和十几位从武汉各纪念馆、博物馆抽调来的文博人组成了工作专班。经过一年多努力，在规划、设计、建设、文物、党史、江岸区等多方的通力合作下，相继完成建馆方案、陈列大纲、居民腾退

等一系列前期工作，下一步就是上报中央，等待批复。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相关规定，新建纪念馆遵循从严控制原则，须履行严格的报批手续。因此，筹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须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获准后才能建设立项，落实资金，开工建设。

2013年9月，我们准备好上报材料、代拟了请示文件，经中共武汉市委、由中共湖北省委上报中共中央办公厅。当时全国已有上海、瑞金、延安、西柏坡等依托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建立的革命博物馆，对于党中央是否批准武汉建立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大家还不是完全有把握。所以，请示报上去以后，大家都充满着期待。等待是焦急的。大概在11月的一天，市文化局博物馆处孙颖处长跟我说：“能不能打听一下？”我想也是，不能就这么干等着。于是就利用与中宣部宣教局的工作关系询问报批进展情况，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的建馆请示正在走程序，不久就会有结果，还得知湖北省同时报去的另有一家待批复的纪念馆。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处于期盼之中，所以当获批消息传来，同事们都很高兴。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建馆工作作出批示是所有人没想到的，这给了包括市领导在内的所有筹建人员一个意外惊喜。大家还分析猜测，我们所做的文字方案、绘制的效果图一定摆在了习总书记的案头经他过目审阅。筹建团队很受鼓舞，坚定了建好纪念馆的信心。这一消息也通过省、市各大主流媒体、《中国文物报》等迅速传遍省、市各界以及全国的文博界，那时我接到多位外地文博朋友的来电表示祝贺和羡慕，社会各界对筹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宣传，筹建工作也加快了步伐。

非凡的历史

位于汉口四民街61号的这座红房子曾经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兴建一座纪念馆会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大革命时期的“中南海”，这是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对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的评价。中共中央在武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我们在研究中通过文献资料还原了这段历史的概况。

1927年上半年的武汉被称为“赤都”。1926年年底，中共中央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从上海迁来武汉，一大批党的领导人来到武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共中央秘书厅迁汉后设在汉口四民街61号（今胜利街165~169号）。这是一栋中西结合的三层居民住宅楼，砖木结构，红墙赤瓦。当时设在这里的有中共中央秘书厅文书、发行、财务、警卫等办事机构。一楼是警卫室，住着中共中央特务工作处警卫人员，二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室。陈独秀、蔡和森等党中央领导人曾在此居住和办公，周恩来、瞿秋白、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任弼时等数十位领导人常在此工作或居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曾在此召开很多重要会议，领导革命斗争。四民街61号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

1927年，在中共中央机关东侧有一栋三层西式洋楼，原为著名矿业冶金专家王宠佑的私宅，曾经是英商怡和洋行高级职员公寓。当年在中共中央机关与怡和洋行公寓之间的巷道里停放着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用的小汽车。在中共中央机关西侧是一栋带花园的西式三层楼，原是武汉大富商韩永清的公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

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的指挥部，被称为“唐公馆”。唐生智公馆和怡和洋行公寓当年与中共中央机关没有关系，如今成为纪念馆的展厅。

中共中央在汉约一年时间。其间正是大革命由高潮转向失败的特殊历史时期，风云变幻莫测，艰难险阻频发，武汉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写下了辉煌篇章。

在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工农运动，一举收回汉口和九江英租界，取得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重大胜利；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在武汉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蒋斗争，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镇压工农的罪行；4月27日至5月9日，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唯一一次在汉召开的党代会，大会选举产生党的第一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创造多项第一，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在汉领导了击溃夏斗寅叛乱等军事斗争；党中央在汉开始了军事工作方针的转变，为南昌暴动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大革命遭到失败。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实行改组，“五人临时中央”临危受命，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危机，决定并领导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武汉成为人民军队的策源地。

8月7日，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坚决纠正党内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的重大转折。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在“天柱折、

地维绝”的危急时刻，竖立起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两座巨石，顶起塌下来的天，托起陷下去的地，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革命、挽救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从此，中国共产党从失败中重新站起来继续前进。八七会议后，党中央从武汉派出许多干部赴各地发动武装起义。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率先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国各地党领导的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建立了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和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一重大转变的源头正是在武汉。

中共中央在武汉波澜壮阔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的一段艰难历程。当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中央工委、中央农委等工作机构分布于汉口、武昌的多条街道，一大批早期党的领导人在武汉三镇留下奋斗的足迹，四民街61号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是见证这段历史的典型代表，也是全国尚存不多的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是学习党史的好教材。

习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党史学习教育，他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他要求全体党员学好党史必修课，从党的历史中得到启迪，获得智慧和力量。他几乎每到一地都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地，参观革命旧址。2010年1月22日，他视察了位于汉口的八七会议会址和位于武昌的毛泽东旧居、农讲所旧址。兴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就是为了保护好这一红色资源，利用好这部教科书，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践

行初心使命的奋斗精神，从中汲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智慧和力量。我想，这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建设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的根本原因。

铭记与传承

习总书记的批示“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不仅是对建设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的要求，也是全国文物工作的指导方针。

2014年元月15日，在习总书记批示一周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一行来到武汉，调研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建馆，指导旧址保护修缮工作。那天，陪同来现场的有湖北省文化厅（文物局）巡视员沈海宁、武汉市政府副市长刘英姿、武汉市文化局局长陈邈馨等领导。

励部长实地考察纪念馆所属的三处历史建筑，他详细询问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情况、与相邻两栋建筑的关系、建馆计划、如何使用等。我一一介绍和解答。励部长指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是中国大革命历史的见证，也是全国尚存不多的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要坚持修旧如旧、保留原貌的原则，不得改变文物建筑的主体结构、内部格局和外观，切实维护其历史原貌。修缮方案要统筹考虑原状展示和党史陈列的使用需求。励部长还要求原状陈列要朴实，符合历史实际，不要奢华。

在建馆过程中，我们始终遵循习总书记的批示精神，按照国家文物局的指导意见，完善旧址修缮方案，严把各项质量关，尽最大努力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在修缮方面，首先是拆除违规搭盖搭建，还原房屋的

框架结构，然后在文保专家指导下采用原材料、原工艺，从里到外恢复历史面貌。在旧址原状陈列中，我们全部征集和展示民国年间的家具陈设与生活用品，近千件复原展品没有一件是新制作的，整个旧址复原符合时代特征，充满历史气息。同时，做好与旧址毗邻的唐生智公馆和怡和洋行公寓两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修缮，充分利用这两处建筑举办辅助陈列和临时展览，使纪念馆三组建筑形成一个整体。纪念馆周边没有大拆大建，只是进行了清理和整顿，最大限度保留了环境的原貌。

如今，走进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犹如走进20世纪20年代的老汉口，外墙红砖上的刻字述说着房屋建筑的百年沧桑；复原房间里摆放的药瓶、烟斗等老物件讲述着94年前的故事，仿佛主人公刚刚离去；辅助展厅里，满眼的历史图片、珍贵文献、重要实物将观众带入轰轰烈烈、风云突变、奋而崛起的历史场景之中。这座纪念馆遵循了修旧如旧原则，恢复了历史原貌，朴实而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辉煌历史，它将一直用这种方式传承红色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记得当初有位市领导说过：习近平总书记批示的纪念馆他会来看的。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落成后，所有参与建设者都期待着这一天，我和他们一样，期待着习总书记的到来。

（赵晓琳：武汉革命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

不负习总书记深情厚望，为居民守好社区这个家

◇ 陶久娣

（一）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城乡社区成为抗击疫情的第一线，社区工作者担负起前所未有的重任，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就说我们社区，最艰难的时候，18名工作人员要扛起1.27万余名居民的防控重任，这种压力可想而知。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若问我怕不怕，坦白地讲，当然害怕，但紧要关头，保护居民的任务更加紧迫，容不得我瞻前顾后；面对繁重的防控任务，若问我累不累，实话实说，累到崩溃，但危难时刻，守护社区的信念更加坚定，支撑着我不能倒下。

社区里一名居民确诊后，她的家人作为密切接触者，却不愿意进行隔离观察，每天打十几个电话给我，非要去医院里陪床，怎么劝都不听。为了排除疫情传播隐患、保护全体社区居民的安全，我和社区工作人员叫来民警，摆事实，讲道理，从防控

大局讲到社区安全，大家轮番耐心劝导，努力帮这家人打消顾虑，整整10个小时，终于把工作做通。此时的我已经累得不想再说一句话。

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逐渐认识到，社区防控是一场持久战，更是一场消耗战，人困马乏、透支运转不是办法，这种被动的局面必须尽快扭转！

社区封闭管理后，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发布了招募志愿者的消息。没想到，第二天就有72名志愿者来社区报到。紧接着，下沉干部、基层民警、物业人员、辖区单位党员……在各方面的协调支持下，增援部队陆续到位，与社区工作者共同组成一支215人的生力军。防疫宣传、物资保障、心理疏导、卡点管控、卫生消杀……大家发挥所长，投身社区疫情防控。

社区疫情防控千头万绪，哪一个环节都不能放松。最费时费力的就是上门排查。按照楼栋单元分工后，我带着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门。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我们上门，我

们心里清楚人家是怕感染病毒。是啊，谁不怕呢？每敲一家门，只要屋里有人答应，我们就隔着门喊：“别着急开门，先带好口罩。”三天的大排查，我们跑遍了社区内的住房和周边商铺，每天都工作到大半夜。睡眠不足，再加上着急上火，大家又是起口疮又是嗓子哑，有的人颈椎病犯了脖子都动不了，但没有一个人叫苦；为了坚守岗位，家里老人没人照料、孩子功课没人辅导，但没有一个人撂挑子，每次有任务，大家都抢着干。

有家难回、夜不能寐，这些经历都是战疫期间社区工作者的“标配”。面对疫情，作为居民的主心骨，我们横下一条心：危难关头，再苦再累也决不能退缩，一定要为居民守好社区这个家！

疫情期间为解决社区居民的吃饭问题，我们联系爱心企业，为居民发放蔬菜 200 余吨，并采取“线上自选+无接触配送”模式，每天为居民提供米、面、粮油等物资的平价团购，还与小超市合作，满足居民个性化需求。在保证居民基本生活和防护需求的同时，我们还重点为患者家属、孕妇送去鸡蛋、牛奶等营养品，为医护人员、孤寡老人、贫困户和滞留社区的外地人员送去必需的生活用品。

为缓解疫情期间部分居民出现的恐慌、焦虑情绪，我们组织开展心理辅导，动员具备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工作人员运用专业知识辅导困难群众、独居老人 200 余人；邀请专科医生对一线工作人员进行辅导，让大家既学会疏导他人情绪，也学会自我情绪疏导。同时，对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以及困难群众，残障人士，高龄、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加大帮扶力度、加强心理关怀，确保防疫的同时不失关爱，隔离病毒不隔离爱。

社区战疫能取得现在的成果，与各级党组织的支持和帮扶分不开，与居民群众的理解和参与分不开，与志愿者、下沉干部的辛勤付出分不开。最让我感动的是，不管是谁，只要来支援社区抗疫都会说：“陶书记，听你指挥，你让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看到我们的社区有这种一呼百应的号召力、众志成城战斗力，我就知道，没有咱打不赢的仗。

（二）

最难忘、最激动人心的是 3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来到我们社区考察。下午 1 点多，我们社区抗疫工作人员 10 余人等候在小区 8 栋门口，总书记在此下车后，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听了总书记的话，我感到既温暖又充满力量。当在楼上居家隔离的居民群众看到总书记来了时，都纷纷从阳台和窗户中探出头来，挥手向总书记问好，有的摇着国旗高呼：“武汉加油！中国必胜！”习近平总书记不时驻足，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你们好，你们辛苦了，再坚持坚持下！”步行到物资集中配送点（社区 7 栋门前，我们社区的生活物资集中配送点设在此处，分为爱心菜发放点、平价菜供应点、团购包配送点三部分）后，总书记沿着一个个摊位详细了解蔬菜、肉类的价格、发放时间、配送人群等。“今天总共有多少份菜要送？菜怎么送到居民手中？肉多少钱一斤？是所有人都有吗？”总书记问得很详细，并用手指着配送点的粮油、蔬菜问：“这都会送到家里去吗？”总书记还关心地问，爱心菜是不是每天有？有哪些品种？生活物资套餐怎么采购？下沉党员、志愿者汇报：“这里有免费发放的爱心菜，主要优

先发放困难群众、高龄老人和特殊群体。”到了爱心菜的发放点，他问志愿者，这个菜要钱吗？工作人员说这个是政府免费发放的。他问有没有肉？志愿者就跟他讲，有肉有肉，10元一斤。总书记问了很多，问的是那样的详细，让我感到这位大国领袖对百姓的深切关怀。在这里，总书记说武汉人喜欢吃鱼，要尽可能的多组织，他还当场强调，要千方百计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

离开物资集中配送点，沿途路过社区警务室、物业企业、卫生服务站，我为总书记一一做简单介绍，总书记对我们的疫情防控工作表示肯定。随后，总书记来到了东湖新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在门口测量体温后进入大厅。总书记首先对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慰问，随后了解社区实行网格化管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情况，对社区的工作表示肯定。

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总书记和我们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开始是我发言，

我向总书记的到来表示感谢。我说，总书记的到来给奋战在一线的基层工作者巨大的鼓舞。在这次严峻的斗争考验中，社区党组织发挥了堡垒作用，非常感谢居民群众的坚守，居民志愿者、下沉干部辛勤的付出，感谢社区民警、社区工作团队、还有辖区单位东湖飞跃公司的大力支持。随后，总书记听取了3位代表的发言。社区委员熊文静首先发言，讲述在社区防疫工作中的艰辛及疫情的防控过程。志愿者代表谢小玉第二个发言，她讲述了疫情期间在社区当志愿者和其他地方当志愿者的不同。下沉干部孔祥峰最后一个发言，称在疫情期间开展服务工作非常艰辛，看到了社区工作者的不容易。总书记对大家的工作充分肯定，对武汉人民牺牲奉献精神 and 全中国同舟共济精神表示赞扬，对下一步的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相关要求。他说：“我在路上就一直在想，武汉是多么好的一座城市！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这里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在这次抗击疫情斗争

中，武汉人民展现出了不怕牺牲的精神、勇于担当的精神、顾全大局的精神，还有甘于奉献的精神。这些精神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我们一定要好好总结、好好发扬。我相信，通过这次抗击疫情斗争，武汉必将再一次被载入英雄史册！”

“大武汉有上千万人，通过封城来控制疫情蔓延扩散，难度很大，下这个决心是非常不容易的。确实是一个十分



2020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东湖新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同社区工作者、基层民警、卫生服务站医生、下沉干部、志愿者等亲切交流

艰难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湖北人民特别是武汉人民作出了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很了不起，你们为整个抗疫斗争立下了大功。”“一个是疫情防控，一个是逐步恢复经济社会秩序，这两件事要统筹兼顾，有序推进。”“社区在这一次我们的保卫战、阻击战中立下了大功。在此，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国的社区工作者和全国在抗疫一线的社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对群众出现的一些情绪宣泄，我们要多理解、多宽容、多包容，更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包括心理疏导、解决实际困难。”“给人民群众当服务员，不能干巴巴、硬邦邦的，要让群众如沐春风。”

（三）

3月10日总书记考察社区以后，社区的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为了向总书记表达感谢和继续坚守阵地的决心，我们又给总书记写了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信。总书记在信中对城市解封后的社区防控提出了要求。我知道总书记的心里一直都牵挂着我们社区工作者！这让我们深受感动，鼓舞着我们振奋精神、继续前行。

4月8日武汉按下“重启键”后，我带领广大党员群众持续完善常态化社区防控。持续关注困难群体、孤寡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广泛动员志愿者用心解决群众诉求，贴心服务社区居民。在全民核酸检测攻坚行动中，以网格为单位，分楼栋、分时段依次有序组织居民进行了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分类做好境外返回人员、出院康复人员、无症状感染者等的管理，按网格划分归属，督促网格员定期询问体温，了解健康状况，动员邻居、亲友共同做好日

常观察，确保有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同时，广泛开展社区文明新风尚宣传，坚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引导居民养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省、市党委和政府也非常重视和关心社区，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相继出台了关爱社区工作者、加强社区治理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我们按照省、市部署要求，大力推进党建引领加强社区治理工作，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多元共治合力，努力补齐社区治理这个短板。在下沉党员的助力下，我们集合社区工作者、下沉单位、辖区单位、报到党员、社区民警、物业人员、社工团队、志愿者队伍八支力量，形成了新时代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全面调动八支力量服务群众，着力解决居民所需、所急、所盼。现在，社区党组织架构更完善，凝聚力更强，小区环境进一步提升，“老东湖巡逻队”“抗疫先锋队”“谢小玉志愿服务队”等居民自治队伍越来越多，各类党史教育等红色文化文体活动也更丰富，居民都说生活在这个小区，感到越来越幸福！

现在的我感到，在社区这个小天地工作奋斗，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非常强，今后我也将一如既往在这里干下去。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抓细抓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用心用情为群众服务，把社区工作这门学问弄懂、弄通、做扎实，把总书记的关心厚爱传递到所有老百姓心里，竭尽所能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再立新功！

（陶久娣：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东湖新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特刊

团结篇

TUANJIEPIAN

回忆 1984 年武汉创设“双月座谈会”制度始末

◇ 王功安（口述） 范前锋（整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讨在全国渐掀热潮，正方兴未艾，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在学术理论界及统一战线、人民政协的实际工作部门，“两个纳入”，即推动“将协商民主纳入国家宪法”“将政党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 1984 年，有着很多很好多党合作历史传统的光荣城市武汉，就在全中国首创了地方性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双月座谈会”，并将之程序化、规范化而形成一项多党合作制度，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当时，这一地方性先进做法及宝贵经验，很快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充分肯定和赞赏，并于 1985 年 1 月专门发文

颁行全国各省、市、区统战部，也很快在全国各省、市、区范围内开花结果，得到广泛多层推广。后来经过不断发展创新，延续至今，成为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之一。30 多年来，“双月座谈会”这一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形式在中共各级党委同民主党派、无党派的多党合作实践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创新，已成为今天我国政党协商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一种协商形式。

制度创新

记得是在 1983 年 12 月的一个冬日，我正在北京参加由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座谈会。中央统战部党派工作局的负责人宋堃（几年后担任了中央统战部

的副部长），非常关心武汉统战工作的情况，他手里拿着一份由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向这次会议提交的交流材料，利用中午开会间隙来到我的房间，说是受阎明复部长的委托，来看望会议代表。随后，他专门听取了我关于武汉市民主党派工作的口头汇报，还就此对武汉统战工作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建议和期望要求。最后，他对我说：“你们武汉高校众多，科研院所和大中型国有企业众多，是全国民主党派成员较多、民主党派组建及工作起步早的特大城市之一，在全国都有影响。而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民主党派工作又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长期重点方面，希望武汉市在这次会议散会以后，能下大力气抓好民主党派工作，积极让民主党派成员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政议政，推动他们在武汉地方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在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真正发挥作用。”他还对我们武汉提出了希望能在多党派团结合作方面，为全国多创造出一些经验的具体要求。

开完会回到武汉后，我立即向市委主管领导彭沈元同志（时任市委书记，当时市委设有第一书记）和市政协主席辛甫同志汇报了宋堃局长关于抓好武汉市民主党派工作的具

体意见和要求，当即得到了两位领导同志的鼓励、信任 and 大力支持。此后，我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查阅学习我国多党合作历史及武汉市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发展史等档案资料上，并专门请来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的黄铸、李青、华毅等专家讲授党中央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团结合作的历史过程，还经常到市级各民主党派机关做调研与论证。我们得知，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以前），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中央组织的负责人、知名党外人士等曾经建立过类似“最高国务会议”“双周协商座谈会”等的高层政治协商会议形式。一共召开了由国家主席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20余次，在全国政协里面一共召开了“双周协商座谈会”100余次。

最后，我们基于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再结合武汉市的统战工作实际，形成了一个书面报告，包括建议在武汉实行“双月协商座谈会”和“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两个备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89〕14号文件精神，由中共武汉市委组织召开的“双月座谈会”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图为20世纪90年代初召开的一次“双月座谈会”场景

选方案，向中共武汉市委做了专题汇报。在市委常委会开会讨论我们提交的意见时，邀请我列席了会议，并做了一些补充说明。时任市委第一书记的王群同志一锤定音，主张采取“双月”的形式召开协商座谈会。他认为“双周”的时间周期过短，过于频密，不利于民主党派深入开展问题的调研，也不利于市委集中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最后，经市委常委会集体研究决定，采纳王群同志的这一意见，并专门发文，正式建立中共武汉市委“双月座谈会”制度。文件要求将这项制度纳入到下一年度（即1984年）的全市统战工作计划之中，从1984年起，开始正式实行。

现在回想起来，这项制度在实行伊始，还碰到了一点小麻烦。1984年7月以后，市委主抓办公厅工作的一位新任领导（市委秘书长），由于对“双月座谈会”制度的性质和意义了解不深，觉得这种会议如果放在市委里来召开，势必会增加办公厅会务工作的工作量，因此主张这个会议就放在市委统战部里召开。我们市委统战部和市政协不同意这个主张，并认为这种主张不是代表市委的意见，坚持要求由市委主持召开的会议一定要放在市委里召开，而具体的会务组织实施工作应由市委统战部负责。经过向这位市委领导同志陈述这项协商制度的重要性质和意义，并同时取得了市委其他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市委最后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这件事还得到了中央统战部的高度赞赏。宋堃同志当年10月来武汉，出席武汉市统战工作史上第一个组建的市统战理论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他对我说：“你们统战部和政协的坚持，无疑是对的，最后武汉市委的决策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做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决不是哪一家子的事。今后

你们如果还遇到什么困难，可直接来找我，找中央统战部。”

此后三十多年来，中共武汉市委坚持把政党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主动就重大问题广泛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党外代表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并长期坚持和推动“双月座谈会”制度的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使这项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和成熟。

制度设计

我们当初对这项崭新政党协商制度的设想是，市委“双月座谈会”制度是中共武汉市委同市级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和社会各界代表人士，进行高层协商对话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中共武汉市委执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帮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基本职能的一项基本协商制度。市委“双月座谈会”制度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加强中共武汉市委同市级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代表人士的联系，定期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等党外代表人士对中共武汉市委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并就全市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大政方针、重大决策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向党外朋友通报情况，进行协商，接受监督。市委“双月座谈会”制度的会议主题要突出全局性、务实性、可行性、前瞻性及开放性。

参加市委“双月座谈会”的人员主体当时分为固定的和不固定的两种：固定的是指中共武汉市委同市级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人、无党派知名人士、宗教团体主要负责人。另一种是不固定的，主

要是根据每次市委召开“双月座谈会”的临时主题和内容需要，参会主体视情况可由第一种“固定主体”扩大到各有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文、教、卫、体界的知名人士参加，这一部分参会人员一般是不固定的。

制度组合

市委“双月座谈会”制度经过几年的推行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又根据武汉市统战工作发展的现实需要，积极回应市级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及全社会统战成员的新期待、新需求，坚持发展“大统战”，坚持“全党办统战”“社会办统战”，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又发展成熟了一个配套制度：市委“七党四联会议”制度。

市委“七党四联会议”制度是中共武汉市委与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以及其他具有统战性质的人民团体、社会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沟通的政治性合作形式及经常性联系协调机制。这里的“七党”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指的是除台盟以外的七个市级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因市级台盟组织在那时尚未建立起来）；“四联”指的是武汉市工商联、市台联、市侨联和市青联四个具有统战性质的社团组织。市委“七党四联会议”制度与“双月座谈会”制度实现有效对接，规定每年召开至少一次会议，邀请上述各组成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其参会人数远多于“双月座谈会”，其会议规模在“双月座谈会”的基础上有所扩充。这个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七党”和“四联”各个单位上一年度的工作，交流经验、联络情谊，“社会办统战”，又要讨论部署新一年度的工作，做到全市的统战工作真正是在中共武汉市委的集中统一领导

下（通过统战部）统筹协调，互联互通，协商一致。每年的这个会议都是由市委统战部负责筹备召集，市委主管统战工作的书记也驻会指导，发表重要讲话。会期一般安排在三天左右，有的年份也在三天以上，所以要求参会人员一律都住会。在有的年份，“七党四联会议”除了集中开大会，还安排了外出参观、考察活动，进一步沟通感情，联谊交友，把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心坎上。

在我主持市委统战部工作的十年间，一共筹备和主持召开了近60次市委“双月座谈会”及8次市委“七党四联会议”。最后，我口占一首五言短诗来结束本文：

改革之初大武汉，

多党合作写新篇。

双月协商座谈会，

“萧规曹随”四十年。

（王功安：武汉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委统战部原部长；范前锋：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四级调研员）

我与世纪之交的政协工作

◇ 刘善璧（口述） 游迎（整理）

1998 ~ 2006 年期间，我先后担任九、十届武汉市政协主席。站在跨世纪的门槛上，市政协提出了高举一面旗帜（邓小平理论），突出两大主题（团结和民主），围绕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履行三项职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基本工作思路。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我们充分发挥政协组织的智力优势，高起点、高效率、高质量履职尽责，实现了新世纪政协工作的发展，为促进武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

我曾在武汉市委分管经济工作，其中一块就是农村经济，那时每年都往乡镇跑，对农村的现状了解得比较清楚。当时我发现，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中央的政策

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也比较高，曾经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最大亮点，发挥过巨大的政策威力。但是，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农民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很难有大作为。

农民如何致富？如何通过解放农民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我思考了很久。

1998 年，转到政协工作以后，我继续思考着经济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带着这个问题我到农村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一是发现农民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自身经济实力和资金都有限，很难抵御市场变化。因为无法判断可靠的市场信息，许多农户在生产经营中往往习惯于凭经验和直觉。曾有一个村里几十户见上年种的青椒好销，第二年家家户户都种上一大片，结果当年却来了

个大跌价，全都亏了本；二是了解到很多地方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外出，农村出现了“有田没人种”的状况，而且即使他们不耕种，也不愿意把自己承包的耕地使用权让给别人。

经过多次组织市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展开一线考察调研后，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存在

着的四个方面突出矛盾在我脑海中日益清晰起来，即农户超小规模经营与现代农业集约化的要求相矛盾、农民因土地承包而产生的恋土情结与发展土地规模经营的客观需要相矛盾、按福利原则平均分包土地与按效益原则由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要求相矛盾、分散经营的小农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相矛盾。

如何破局？怎样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如何发挥土地资源的最大效益？土地使用权能否作为股份入股呢？

在调查走访中，我了解到，当时很多企业不愿意投入农村，主要是因为在农村发展要买地、租地，这要花一大笔钱。武汉和平科技集团的负责人黄崇胜跟我谈到想在江夏农村买些地发展高科技生态农业，我就建议他让农民入股，这样既可以少花钱，又能使企业发展与农民切身利益挂上钩。2000年10月28日，武汉和平农业公社有限公司在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村宣告成立。这个拥有1.3万亩土地的农业公社是以企业为主、农



1998年1月，在武汉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八届市政协主席李岩与新当选的九届市政协主席刘善壁（左）亲切握手

民土地经营权入股的股份合作制农业企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农庄使每家农户的平均收入增加了几千元，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前农民愁销路，没有科技作为农业的领头兵，而加入公社后，这些都由公社的专家作保证，产前忧种子优劣、产中忧田间技术管理、产后忧销售的“三忧”问题得到解决。把小生产变为大生产，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的经营，真正实现了把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发展落实到了千家万户。不仅如此，农民入股后成为企业的职工，员工福利、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都按企业行为得到保障，而且不论企业经营的怎样、土地跟谁走，股权总在农民手中，农民承担的风险也小了。一种全新的农业经营体制在江汉平原诞生了。

在这一对农村发展新的探索的背后，我有了更加成熟的思考：在明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家庭承包权、放活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由有经济实力的大户、集体经济组织或投资于农业的工商企业发起，

农户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按照自愿原则组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份合作制农业企业。企业统一经营农民的土地，农民既可按股分红，又可在企业工作，按劳取酬。在股份的构成上，农民主要以土地使用权入股，也可以资金、技术、设备入股。在用人机制上，企业与农民实行双向选择，企业原则上优先招收土地股民。土地经营权入股不能搞强制手段，也不能一刀切，还应遵循平等协商、自愿互利，稳定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原则。

对以上思考进行系统梳理后，2001年2月8日，我在湖北省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提出了“农民变股民——21世纪农村改革的方向选择”的新思路。

当年3月，我还把这一观点带到了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也把武汉市加快土地制度创新、解决现代化农业规模生产与土地分散经营矛盾的做法推向了全国，并形成了《实行土地经营权入股，变农民为股民》的提案，由武汉市8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大会提交，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讨论，对党和国家进一步完善农村政策起到了参考作用。

当时在武汉，这种模式正在探索试验阶段，除了和平科技集团，还有江夏区的万亩花卉园和洪山区九峰乡等地区都展开了这一新型的农业经

营方式的探索；位于江北地区的竹叶山集团也加快步伐，通过实施产权制度改革，成功地完成了城中村“农民变居民、村民变股民”的完全股份制改造。种种迹象表明，实现土地经营权入股，对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转移剩余劳动力、促进土地规模经营与农业产业化、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等都具有重要作用，是实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与现代农业顺利对接的有效途径，是农村改革的方向选择。

至此，我从1998年开始的能否将土地使用权由实物形态变成价值形态的思考也有了圆满的答案。

（二）

20世纪90年代末有一个观点：“21世纪经济看好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看好中国，中国看好长江沿岸。”我认为，地处长江经济带的武汉，位置居中，得中独厚，肩



2001年9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王文元（前排右二）来汉出席第二届中国武汉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开幕式期间，视察汉口龙王庙

挑两头，辐射圆周，在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以长江为杠杆，沿江伸入和推移，既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武汉发挥承东启西战略支点作用的最佳选择。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的武汉，通过多年来的不断发展，产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形成了钢、车、机、新四大支柱产业。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首届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简称机博会）在汉举办。提到机博会的筹备工作，每届请中央委员都是由政协出面，由此我也想到了一件往事。

2001年9月下旬，第二届机博会召开在即，我们与全国政协联系邀请领导来汉参会事宜，了解到领导们已分赴全国各地学习考察或视察调研，离武汉市最近的一位是在江西开会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当即，我请全国政协工作人员向王主席报告，同时和市政协副主席肖志钢一起第一时间赶赴江西。当时九三学社中央在江西开会，按照会议议程，王主席要作总结讲话。我们跟王主席汇报相关情况后，跟他商量，能否请他将讲话提前，然后到武汉参会。王主席是黄陂人，一直情系湖北武汉，听到这话，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2001年9月22~24日，第二届机博会如期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出席并讲话。这是武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推进对外对内开放的一项重要举措。

几届机博会的成功举办也让我对武汉的城市定位有了更新的认识：武汉应该在振兴长江经济带、促进中西部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带着这一思考，我又一次走进了全国两会的会场，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备而来，做足功课。经过深入扎实的调

查研究，在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会的开局之年，在2003年3月在京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我慎重地提交了《加快长江中游武汉经济区的建设，实现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提案，我建议，将长江中游武汉经济区作为中国第四个快速发展的重点经济区纳入全国统一规划，使长江的“龙腰”武汉实现崛起。

我的这一建议当即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既宣传了武汉，又促进了中央对中部地区、对武汉发展的关注和支持。

2004年3月，我们驻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上持续关注加快武汉发展、促进中部崛起这一主题，提出29件提案、5份书面发言，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其中《关于支持壮大湖北地区船舶制造业的建议案》提出后，国家海关总署5月31日正式批准青山船厂设立备料保税仓库。

同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这也让多年来为之奔走的我们感到由衷的欣喜。

2005年3月，我们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9位驻汉全国政协委员，向大会提交提案30余份。与往年相比，委员们关注的目光更加集中，7份提案从不同角度关注同一主题：“中部崛起”。其中，《关于将武汉明确为我国中部地区物流中心》的提案，受到国家发改委的高度重视，在编制《中长期综合交通运输网规划》中将武汉纳入国家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同时在编制《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的区域布局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将武汉列为物流枢纽和国家一级物流节点；《关于建议在武汉建立中部地区科技自主创新基地》

的提案，科技部会同湖北省和武汉市加快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科技自主创新的龙头，并带动和引领中部地区其他省市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为“武汉制造”向“武汉创造”的产业升级奠定了基础。

会议期间，我还积极利用多平台、多渠道发声，为的是凝聚起更为强大的建言资政合力。

全国政协组织召开的提案办理专题协调会邀请各提案党派、提案人与承办单位面对面，沟通协商办理工作。武汉乃至中部六省全国政协委员密切关注的“中部崛起”议题引起国际国内的关注，成为了会议内容的当然之选。武汉市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我也充分抓住了这次绝佳的机会，就中部崛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力陈武汉作为中部唯一特大城市，在中部崛起中的重要作用，并一一列举出武汉在科教、区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六省加一市”格局的构想，并建议中央将武汉明确为我国中部地区的物流中心。应邀参会的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粮食局等 10 家承办单位

的负责同志先后发言，对委员们广泛关注的制定中部崛起战略规划、将中部崛起纳入“十一五”规划、加大对粮食主产区支持力度、增强金融支持等 9 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协商。他们纷纷表示，要在规划编制、财政税收、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开发、金融、扶贫等方面制定出台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支持中部地区发挥优势，实现中国经济东西南北的协调发展。

3 月 10 日，我和全国政协常委、河南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河南省九三学社主委张涛先生，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战略组组长、首席经济学家牛文元教授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就中部崛起话题与网民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我认为，中部地区要崛起，中央要制定一个中部发展的整体框架，应该根据各省不同的条件和特色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不能“齐步走”，发展应该有重点。武汉作为中部地区唯一特大中心城市，应在中部崛起中发挥带动作用。同时，中部崛起不能“等、靠、要”，只有依靠发掘自身潜力，立足自身优势，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武汉市政协《关于把防汛当产业抓，提高城市防洪综合效益的建议案》推动下，武汉江滩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去处

后来居上；要加强区域合作，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要互相的支持，互相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样的发展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发展。这些看法都引发了方方面面的广泛共鸣和普遍认同。

为进一步促进中央关于中部崛起战略的完善，5月16～1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率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到湖北等地进行专题调研，在座谈时他强调，中部地区不能“等、靠、要”，要争取主动权，调动积极性，艰苦奋斗，争取主动，早日实现崛起。次年5月16～18日，张思卿再次来汉，就“加快长江经济带发展”展开调研，他对武汉建设发展寄予殷切希望，他说，担当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武汉责无旁贷，责任重大。

中央提出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后，湖北把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打造湖北乃至中部崛起核心增长极和战略支点，作为湖北加快发展的重大决策。促进武汉城市圈建设，人民政协同样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怀着这样一个共同的心愿，2005年5月25～26日，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9个城市的政协主席主动走到了一起，共商促进中部崛起的百年大计。会上达成了应大力支持和引导武汉建设成为中部发展的区域中心城市、承担起中部崛起“高速引擎”的战略重任的共识，还由武汉市政协发起成立了武汉城市圈政协主席论坛，每年举办一次，形成固定的协商交流平台，由9个城市政协轮流承担，其发展至今已成为政协系统联动助推武汉城市圈提档升级、谋划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当年8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视察湖北时提出，湖北应该加快发展，走在前列，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湖北武汉，也因此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时任武汉市委书记苗圩说到：“武汉的建设与发展，人民政协功不可没。”

（三）

“参政参到点子上，议政议到关键处”，是我在政协履职之初就给自己定下的标准。

一路走来，不管是1999年形成《关于把防汛当产业抓，提高城市防洪综合效益的建议案》助推长江险点变景点，还是2000年提交《大力发展光电子产业，建议在武汉建立“中国光谷”》的提案促成“武汉·中国光谷”的诞生，亦或是提出“农民变股民”“中部崛起”等建议取得令人瞩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这一项项可喜的成绩与变化背后，既体现了武汉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也凝聚了政协组织和社会各界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为武汉发展献计出力的智慧和汗水。

在多年的履职实践中，也让我对人民政协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服从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努力形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的工作格局，牢固树立有为才有位、有为才有威的思想，做到知情参政不越位、参与出力不添乱、深入实际不表面，才能对得起人民群众的希望和重托，为民代言、为国分忧；才能突破创新、与时俱进，实现人民政协事业在前进中开拓、在开拓中前进的崭新局面。

（刘善璧：武汉市政协原主席；游迎：《武汉文史资料》编辑）

群星朝北斗 ——我与名人后裔交往的故事

◇ 李传德

2011年10月10日上午10时，“湖北省暨武汉市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缅怀英烈祭奠仪式”在武昌首义广场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副秘书长全广成、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马健率领从海内外集聚的辛亥领袖后裔、侨胞首领、爱国人士300余人亲赴武汉。他们当中有孙中山次女孙穗华、孙中山曾侄孙孙必达、黄兴长孙黄伟民、黎元洪长孙黎昌晋、张之洞孙女张厚粲、冯玉祥孙女冯丹龙、吴殿英曾孙吴欢、廖仲恺曾外孙女陈晓燕等。

此次他们来到武汉参加祭奠仪式，心情十分激动，纷纷表示：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促进了历史进步，但是历史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

祭奠仪式成功举办令人自豪，辛亥领袖后裔齐聚武汉令人欣慰。作为祭奠仪式总指挥，党组织派我到政协工作，我就应当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做

事，按特色定位，引导和帮助党外知名人士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赞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包容才有团结，平等才有民主。作为一个政协工作者，职能是协商议政，功能是团结统战。前者需要智商，要想说到点子上，议在关键处，就必须多学习，勤思考；后者需要情商，要做到待人以诚，处事以公，真正交朋友，踏实办实事。下面讲几段小故事。

我和黎昌晋的交往

2008年4月9日上午，我作为武汉市政协分管文史学习工作的副主席，主持了辛亥百年庆典活动务虚会，邀请了章开沅、冯天瑜、张良皋、马敏、严昌洪、皮明麻等一批知名专家学者献计献策。著名建筑学家张良皋的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湖北人对不起黎元洪！袁世凯那样坏，他的坟墓在安阳完好无损；黎元洪至少是民国功臣，他的坟

墓被红卫兵刨了！现在的衣冠冢太差，应重新修缮。”说者无心，听者有意。2008年7月31日上午，我带领陆永初、解家麟、殷小琴、晏友桂、吴胜家、张文亭等市政协委员，邀请张良皋、严昌洪以及市发改委副主任程涛平、市文化局副局长郑自来、《长江日报》文艺副刊部主任夏武全一行视察黎元洪墓并组织座谈。黎元洪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担任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历史人物，系武昌起义时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衣冠冢在卓刀泉土公山南坡，靠近湖北省林业勘察院，杂草丛生，通道狭长而曲折，墓碑普通小气。林勘院的李书记说，他们愿意配合修缮，向北推进。座谈会上，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认识高度一致：应以辛亥百年为契机，重新规划修建黎元洪墓。听说这个消息，黎元洪的长孙黎昌晋（时任天津市人大副秘书长）专门打电话给我，向武汉市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往。

2008年年底，我们提了一个关于修缮黎元洪墓的重点提案：一方面北移南扩，修

建牌坊、墓碑、墓冢、黎公厅、游廊等建筑群；一方面打通道路，修建台阶，方便游人上山。重点提案每年六件，由分管副市长领办，政协督办，还要进行满意度测评。这件重点提案由刘顺妮副市长领办，程涛平副主任和郑自来副局长经办，建筑群预算1300万元，征地、拆迁、修路预算1800万元。

2010年9月15日上午，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与武汉市政协在武昌洪山宾馆共同举办了“辛亥革命百年论坛”，邀请了孙必达、黄伟民、张厚粲、吴欢、董必武长女董良翠等一大批辛亥后裔参加，当然也有黎昌晋，还邀请了厉元畏、卞晋平、章开沅、冯天瑜等一大批领导和学者参加。当我主持这次论坛的时候，深切感受到这次活动吸引了许多统战对象来到首义之地，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的历程，引导各族各界人士深刻认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更加自觉地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论坛结束后，我便陪同黎昌晋来到卓刀泉土公山，视察黎元洪墓修缮工地。黎昌晋听了介绍，看了工地，十分激动，他说：“黎家原来怨恨武汉，现在拜谢武汉，我一定把家乡的恩情铭记在心中，跟共产党走，为民族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我和他的第二次交往。

当辛亥百年系列纪念活动敲定后，中央将武汉市政协承办的大型祭奠仪



2008年7月31日，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李传德（右六）带队视察黎元洪墓的修缮保护工作

式列入重点项目，放在关键时间节点，可谓举国关注、世界瞩目。黎昌晋不仅表示自己要回汉参加，还奔走相告，联络海内外辛亥后裔“不去台北去武汉”，澎湃着赤子心、武汉情。仪式结束后，黎昌晋又去了卓刀泉土公山，视察了修缮一新的黎元洪墓。这是我和他的第三次交往。

2018年1月27日，黎昌晋当选为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为此，他专门打电话给我报喜。此时，我已经退出领导岗位一年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交往。回想起来，我颇有心得，和黎昌晋的几次交往，既推动了政协工作，又交得一个朋友。

我和张厚燾的交情

毛主席曾经说过：“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推行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重要人物，也是武汉的“城市之父”。他于1889年由广州两广总督调往武昌任湖广总督，直到1907年，长达18年之久。督鄂期间，他励精图治，在武汉大兴洋务，实施新政：创办亚洲最早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改变了中国钢铁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创办了湖北枪炮厂，使得“汉阳造”闻名于世，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立下汗马功劳；设立纱、布、丝、麻等轻工企业，打破了洋货的垄断局面；编练新军，为辛亥革命打下良好基础；广开学堂，夯实了武汉一个多世纪的科教优势；修筑平汉（北平至武汉）铁路等交通干道，奠定了九省通衢的格局；修筑张公堤，消除汉口千年水患……种种举措，使得20世纪初的武汉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对外贸易“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拥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大武汉”从此叫响。

2008年春夏之交，汉阳区政协主席陈小安找到我，要求借市政协的力量推动张之洞博物馆的建设。于公，寻找城市遗存；于私，我是汉阳人，揭这个榜义不容辞。张之洞深受武汉人民缅怀，可是纪念他的见证场所只有蛇山之上的抱冰堂、中山公园内的张公亭、汉口的张公堤以及武昌的张之洞路，缺乏一个与他历史地位相匹配的大型建筑。当时的背景是，原计划建馆的汉阳铁厂旧址被房地产企业万科征用了，如果政府不采取果断措施，只能是望水流舟。从这以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联合汉阳区政协盯住张之洞博物馆建设不放，千方百计请后裔发言、专家发声、领导发话。

汉阳铁厂博物馆原馆长顾必阶不仅是位建馆的热心人，而且是文物收集的有心人。他告诉我，张之洞孙辈中，唯有孙女张厚燾既有心、也有力，热心参加与张之洞有关的公益活动，并且收集了相当数量的资料和文物。她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获得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对河北南皮张之洞博物馆影响很大。听说我们敦促兴建张之洞博物馆，她非常高兴，亲自来汉致谢，并表示愿意在史料方面提供帮助。

2009年9月2日下午，市政协主席叶金生带领杨付华、肖志钢、李富生、侯晓华、江中联、邹国林和我七位副主席对汉阳铁厂旧址兴建张之洞博物馆进行专项视察，刘顺妮副市长以及市规划局、文化局和汉阳区领导陪同。当年，张之洞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卢森堡工程师吕贝尔等11名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创办了汉阳铁厂，并于1894年6月28日开炉炼铁，从此拉开了“汉阳造”的序幕。如今，房地产公司圈地围墙，怎不叫人感慨万千！九位市级领导到现场，这就是一种态度。视察结

束后，我们以专报的形式向杨松书记、阮成发市长反馈了意见，表达了我们的观点。不久，杨松书记批示：“结合汉阳钢厂整体搬迁，推进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建设。”

张厚桢看到了我们的决心和诚意，非常感动，表示“只要武汉邀请，一定随叫随到”。2009年9月3日上午，由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与武汉市政协联合主办、汉阳区政协承办的“张之洞督鄂120周年与大武汉兴起”纪念大会在晴川饭店举行。会议由我主持。汉阳区委书记李诗伟致欢迎辞后，汉阳钢厂厂长符娟、大冶铁矿党委书记阎建武、萍乡煤矿党委书记刘国胜依次发言。当年，张之洞将这三个企业联合组建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开创了资源重组、企业联合的先河，公司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企业。张厚桢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张厚桢联系的卢森堡驻华大使馆大使助理李艾娜女士也参加了会议，并捐献了当年汉阳

铁厂珍贵的图片。后来，美国著名设计师丹尼尔·李伯斯金担纲设计了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参考并吸纳了这些图片所提供的信息。大会还邀请了章开沅、冯天瑜等学者，原汉阳火药厂督办徐建寅曾孙徐泓、中国古遗址保护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朱晓东、河北南皮县张之洞研究会会长邢家训等嘉宾，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毛福民、湖北省政协常务副主席李佑才、武汉市政协主席叶金生等领导作了口头或书面发言。为配合此次系列纪念活动，《武汉文史资料》2009年第10期以“张之洞督鄂120周年纪念专辑”的形式，收录了18篇文章，无论是专家论文，还是“三亲”史料，都有很高的水准。

博物馆有眉目了，纪念大会成功举办了，张厚桢非常高兴，她在大会发言时说：“共产党实事求是，深得人心啊！”从这个时候起，我和她很有交情，建立起了忘年之交。

孙中山先生曾经称赞张之洞是“不言

革命之大革命家”，以肯定张之洞的实业自强为辛亥革命提供物质、人才和思想基础。因此，在纪念辛亥百年的系列活动中，我总是想起张厚桢，想请这位长辈百忙之中能够光临武汉，以彰显城市特色，厘清历史渊源，增强活动的厚重感。她没有一次拒绝过我——2010年9月15日举办的“辛亥革命百年论坛”，



2010年9月15日，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李传德与参加辛亥革命百年论坛的辛亥后裔合影。左起：吴殿英曾孙吴欢先生、黄兴长孙黄伟民先生、熊秉坤之子熊辉先生、李传德副主席、黎元洪之孙黎昌晋先生、孙中山曾侄孙孙必达先生、吴兆麟之孙吴德立先生

她来了；2011年10月10日举办的大型祭奠仪式，她又来了。她对我说：“我不仅是相信武汉，相信武汉市政协，而且更重要的是相信共产党，相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参加武汉的这些活动显示的是立场，表明的是态度。”

如今，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坐落在美丽的汉阳月湖堤畔，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两层仿欧式建筑，是国内关于张之洞与“汉阳造”唯一的专题馆，是市情教育基地，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承载着武汉近代史的辉煌，续写着“汉阳造”的新篇章，激励着1000万武汉儿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美好愿望。

我和黄伟民的交道

黄兴，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同盟会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早年曾求学于武汉。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亲临武汉指挥了阳夏保卫战。黄兴铜像建立于1933年，初立于武昌蛇山奥略楼；1955年，黄兴铜像迁至武昌黄鹤楼剧场东侧；因城市建设需要，1985年10月三迁于汉阳龟山东麓。对此，黄兴后人有些误解和想法。

2010年9月15日“辛亥革命百年论坛”顺利结束后，黄兴长孙黄伟民找到我，要求将黄兴铜像重新从汉阳移到武昌，要么安放在武昌起义纪念馆门前，要么安放在武昌蛇山之巅。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当区书记的经历使我知道铜像的设立、迁移要经过哪些程序。我一方面承诺做一些了解，一方面诚恳地做工作。

黄兴曾说：“不遍地理，无以知天下大势；不习体操，无以强身而有为。”得知

黄伟民先生一生热爱体育教育，是受祖父黄兴影响，并热衷于爬山、游泳、打拳、射击。我邀请黄先生参观武汉体育学院，他欣然答应，认为我很实诚。

第二天，我主动找到黄伟民，诚恳地对他说：“我初步了解了一下，黄兴铜像迁到武昌非常难，城市规划有障碍、互相攀比不好办、上级审批难过关，请您体谅和理解。”我接着说：“但是，这并不影响武汉人民对黄兴的崇敬之情，并不抹杀黄兴在武昌起义中的革命功勋，并不淡化黄兴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地位！”黄伟民非常豁达，高兴地说：“我接受你的意见，回去以后一定将这三条理由向黄兴后人及其亲朋讲清楚，澄清误会，化解疑惑，相信武汉市人民政府。”就这样，我们心诚相待，以心相交，终于形成共识。

黄家在海外影响很大。2011年10月10日，黄伟民不仅自己来到武汉参加祭奠仪式，还利用自己的人脉联络了一批有影响的辛亥后裔从四面八方来到武汉。在2011年10月11日上午的“湖北省暨武汉市纪念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00周年座谈会”上，黄伟民深情地说：“武昌起义敲响了封建帝制的丧钟，吹响了民主共和的号角，但是并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将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民主党派一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像群星朝北斗一样。”

（李传德：武汉市政协原副主席）

落实宗教房产政策二三事

◇ 马奇明

(一)

宗教房产是宗教团体坚持党和国家“自治、自养、自传”三自方针，促进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抵制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基本经济来源。20世纪80年代始，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市人民政府遵循中发〔1980〕22号和国发〔1980〕188号文件“对宗教房产要从政治上着眼，作为特殊问题来处理”的原则及具体要求，陆续将社会居民、企业、学校、党政群机关使用的30余万平方米的房产清退移交至各宗教团体，为宗教团体依法开展教务活动、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事务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和旧城改造的不断推

进，我市宗教团体所属房产随之逐步减少，列入被拆迁的房产越来越多，房产以及租金日趋下降，宗教团体自养经济基础弱化趋势日益显现。针对这一影响宗教界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问题，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十分关注，自九届始，在市政协党组的领导下，市政协民宗委连续多年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城市建设进程中所需被拆迁宗教团体房产的紧迫性，从政治性、政策法规性以及可操作性上着力以集体、界别、联名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等形式，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各项建议逐步得到了落实。

在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政发）〔2002〕130号文件《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的实施过程中，将有17余万平方米的宗教房产被拆迁。按该文件规定，宗教房

产以旧房估价的 20% 用货币偿还给宗教团体，这将导致宗教团体 80% 的资产流失。对于这一涉及面宽、影响较大的热点问题，市政协“关于妥善处理旧城拆迁中宗教房产补偿的建议”以《社情民意》2004 年第 22 期反映到市委后，时任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程康彦同志非常重视，并批示：请曙光同志（胡曙光，时任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分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关注此事，组织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与房地局等有关部门研究，以求妥善解决。市政府根据市委领导的批示，在旧城改造拆迁中，对宗教团体的房产补偿由（武政发）〔2002〕130 号文件规定的 20% 改为 70%，市委、市政府的这一决定，使信教群众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

随着国家宗教法规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国务院〔2005〕426 号令颁布实施后，为保护宗教团体房产的合法权益，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社会和谐，市政协又以《社情民意》增刊的形式提出“关于维护我市宗教团体房产合法权益的建议”，时任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苗圩对该篇社情民意反映的问题两次作出批示：“请落实政协提出的五条建议。”“把该办的事情办好。”时任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涂勇随即召开有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法制办、规划局、财政局、房产局等部门参加的协调会，决定凡被拆迁的宗教房产一律按照市场评估价格 100% 予以补偿，终使多年来未能彻底解决的宗教房产拆迁补偿问题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赢得了宗教界的高度赞赏。

（二）

落实宗教房产政策、保护好宗教活动场所，一直是市政协关注的难点问题，更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如始建于同治五年（1866 年）的上海路天主教堂，由于年久失修，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2004 年，情况反映到市委、市政府后，市政府拨款 360 万元并实行交钥匙工程，对其进行了全面维修，面貌一新的天主堂成为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理想的活动场所。

坐落于汉口黄石路的基督教荣光堂，



修葺一新的汉口上海路天主教堂

建于1931年，该堂1993年被列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由于年久失修，已成危房。在市、区政协的关注和推动下，2006年，市政府拨款156万元对其进行了全面维修，修缮后焕然一新的荣光堂不仅成为信教群众安然过宗教生活的场所，也成了市民观光的一个景点。

位于江岸区二七街的江岸清真寺，是1918年由民房改建的，基础不牢又年久失修，经建筑专业部门鉴定为“严重损坏房、不能使用”。市政协民宗委“建议重建江岸清真寺”的《社情民意》反映到市委、市政府后，时任市委副书记程康彦随之批示：请段市长（市政府分管民族宗教工作的段轮一副市长）商盛东同志（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吕盛东）、奇明同志（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马奇明）、江岸区委、区政府研究解决方案。段轮一副市长随即召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发改委、财政局、规划局、江岸区政府等部门参加协调会，确定由市、区政府筹资80%，市伊协筹资20%，计600余万元进行重建，新清真寺于2002年建设完工投入使用。颇具民族风格的新清真寺集各族穆斯林群众政治学习、文化交流、过宗教生活多功能于一体，其规模比原清真寺扩大至近三倍。在交付使用的庆典大会上，各族穆斯林群众盛赞“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参加庆典大会的程康彦副书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涂勇，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刘彩木等领导同志无不为一热烈的氛围而动容。

位于江汉区六渡桥的民权路清真寺是我市最大的清真寺，为积极配合市政府对花楼南片拆迁改造，市政协民宗委提出了“关于妥善解决汉口民权路清真寺及其周边自

养房屋的拆迁问题的建议”，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宪生指示：清真寺要作为文化工程建设，以提升武汉对外开放的形象与品位。时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袁善腊在市政协2007年《社情民意》第39期上批示：安排协调会，依法妥善解决。请市规划局、市国土房产局、市土地储备中心、江汉区政府、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市政协民宗委、市发改委、市建委等部门参加。协调会决定，花楼街至广益桥片区拆迁改造中，预留1500平方米土地划拨给市伊斯兰教协会，拆迁由江汉区政府负责，所需建设资金由政府相关部门斥资解决，由市发改委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实施交钥匙工程。建成后的清真寺占地面积比原光绪年间的清真寺扩大了四倍，建筑面积扩大了八倍，不仅成为各族穆斯林群众开展文化交流、过宗教生活的场所，更是我市扩大开放、接待来汉投资、求学、旅游穆斯林嘉宾的窗口。广大各族穆斯林群众普遍反映，武汉市委、市政府在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依法保护宗教团体合法权益，落实宗教政策上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党和政府对宗教界的关心、支持，不仅赢得了境内外宗教界的高度赞誉，还大大激发了全市宗教界的爱国热情，坚定了宗教界永远拥护共产党、接受党的领导决心；坚定了宗教界与伟大祖国发展同心同向、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马奇明：武汉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原主任，市伊斯兰教协会原会长）

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做好界别工作的回忆

◇ 朱大成

1998年年底，我从市政协办公厅副主任转任经济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在这个岗位工作了8年多。

其间，2003年年初政协换届，新的一届市政协按照全国政协要求，提出加强政协界别工作，制定了《政协武汉市委员会界别活动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试行）），这个文件对市政协办公厅和各专委会做好界别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第四条明确提出：市政协经济委员会负责经济界、农业界界别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

为贯彻落实实施办法（试行），我协助段海波主任，突出委员主体、政协界别特色，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认真做好界别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

当时，经济界有36位委员，是市政协人数多、涉及面广的一个界别。由于委员各自从事的行业不同，见面机会少，彼此之间有的还不认识。根据实施办法（试行），2005年年初全会期间的第一次界别活动，我协助经济界召集人，组织界别委员学习界别工作文件，开展联谊活动，聘请联络员，建立界别委员联络渠道，同时确定了年度界别活动方案和年度工作重点。

经济界召集人李有恒同志长期从事政协工作，另外两位召集人咎瑞清、钟淑玉同志是大企业、大集团的主要负责人，我同他们商量，明确2005年度经济界界别活动

重点是，以武汉城市圈建设和“中部崛起”为主要工作内容，以调研课题为依托，突出经济界别和召集人的优势，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搞好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多形式地开展界别工作。

首先，精心选好课题。经市政协组织的专家评审组评议筛选，确定了“大企业、大集团在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中的作用”“推进中部城市经济合作与交流，促进中部崛起的探索”两个专题调研课题。在组建调研专班时，我与召集人意见一致，尽量多地安排非中共党外专家委员参加，充分体现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合作共事。在围绕课题开展的专题调研中，我和经济工作处的同志、界别联络员一道，精心做好组织、联络工作，支持、协调经济界把专题调研与委员视察结合起来，把市内调研与市外考察结合起来，把界别活动与委员自身优势和本职工作结合起

来，在贾震涛、杨付华副主席的带领下，经济界组织本界别的委员先后到武烟、武商、中南、中百等大集团在黄冈市、红安县等地的烟草店和连锁店调研，到潜江在汉的东盛制药、江钻股份等企业调研，到湖南考察长株潭城市群建设及与武汉城市圈的互动，还组织委员视察武汉七条出口高速公路规划、建设情况。中国银联武汉分公司总经理、银联商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总经理林玉兰委员在中百仓储红安店和中商黄冈店的调研中，发现POS机运用还存在一些问题，她立即打电话回公司，要求公司有关负责人找原因，拿出整改措施，加大城市圈各市的银联工作力度。中百仓储总经理程军委员在长沙考察期间，与有关方面沟通、商量在长沙开连锁店事宜。

其次，积极资政献策。2005年上半年，在由武汉市政协发起的武汉城市圈政协主

席座谈会的筹备过程中，经济界特别是李有恒同志积极为会议出主意、献良策，参与武汉市政协主题发言材料的讨论和修订工作。

最后，注重成果的运用。经过几个月的调研，经济界分别于当年6月初和7月底完成两个调研课题，形成了《应发挥大企业、大集团、大公司在建设武汉城市圈中的重要



2005年，市政协召开加快武汉经济圈发展专题座谈会，市政协常委、经济界召集人李有恒作主题发言

作用》《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互动的建议》专题调研报告。对调研成果，我建议经济界召集人李有恒同志用红头文件《经济界别专报》形式，分别报送分管市领导和市政协办公厅及有关部门。第一期《经济界别专报》报送后，市政协刘善璧主席，市政府涂勇常务副市长，市政协贾震涛、杨付华副主席和周启新秘书长对专报分别作了批示。市政协信息处根据政协领导意见，专门向市委报送的一期《社情民意》，苗圩书记作了批示。专题调研报告还在《学习与实践》杂志 2005 年第 7 期刊载。对经济界界别活动，经济工作处协助印制报送《经济界别专报》5 期。每次界别活动，还通过市政协《政协信息》予以报道，全国政协《值班日报》第 117 期和 138 期分别刊登了武汉市政协经济界开展两个专题调研的动态信息。

（二）

当时，市政协农业界委员有 12 人，其中 9 人在经济委员会农业组，而农业组的 13 位委员中只有 4 人是其他界别产生的，农业界和农业组的基本队伍是一致的，非中共党外专家占 70%。因此，从第十届市政协经济委员会成立开始，我们就注意两者的联合与互动。吴银莲同志是经济委员会分管农业的副主任，又是农业界的召集人，经济委员会农业组的活动基本上是与政协农业界界别联合组织，对不在经济委员会的农业界委员都是及时通知他们参加活动。农业界和农业组的委员仅占市政协委员总人数的 2.8%，人不多，我和他们商定，坚持每季度至少安排一次活动，农业界、农业组委员参政议政积极性高，多形式开展了学习、联谊、视察、调研活动。同时他们善于运用政

协参政议政的各种载体，建言献策、献计出力，做到了“五有”：在全会、常委会议等政协例会上有农业的声音，在全会建议和重要提案上有农业的位置，在专题调研工作上深度，在参与督办的工作上力度，在反映社情民意上有成效。

2003 年，市政协十届一次全会通过《把武汉建成名特优新农产品种子种苗产业基地的建议案》，这个建议案是九届政协分管经济的白元初副主席带领农业界、农业组专家委员，经过大半年时间的调研，并责成我和农业界、农业组委员与市农业局分管局长、处长，以及有关方面多次沟通、协商，进一步完善而来的。对于年初政协全会通过的这个建议案，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在办理工作动员会上说：市政协这个全会建议案，充分体现了市政协对“三农”工作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市郊农民群众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迫切愿望。市政府对办理政协建议案十分重视，市长办公会对建议案进行专题研究，并把办理工作纳入市政府一级目标管理。由于市政府重视，措施有力，办理工作当年取得较好成效。2004 年，我又和农业界、农业组委员继续就这个建议案开展调研、视察、督办，《人民政协报》对此作了专门报道。

《关于加快我市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建议》《关于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提高农民素质的建议》分别被市政协列为 2004 年和 2005 年的重点提案。

2005 年，农业界确定的专题调研课题“我市农业实用技术推广现状及对策”，是在 2004 年农业组、农业界和熊恒多、张原、朱思华等委员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来的，2005 年又深入到市郊的 40 多个村以及市区相关农技推广服务部门调研。张原委员还带领华

中农业大学的实习生走访了 1500 多户农户，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使调研报告更切合实际、更具针对性。

委员们反映的“三农”方面的社情民意引起领导重视，有的省、市领导作了批示，有的由市政协直报全国政协。“武汉市郊‘农民变股民’实践及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吴银莲委员的“关于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户生活现状堪忧的情况反映”、李志堂委员的“关于农村田地抛荒不容忽视”，被全国政协信息采用，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参阅，《人民政协报·民意周刊》摘要发表。

（三）

十届政协经济委员会 118 名委员来自 31 个组成界别中的 21 个界别，非中共党外人士占 67%，他们都是各界别的精英。从委员的角度，要求他们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本界别的民意，使自己成为本界别群众名副其实的대표。从专门委员会角度，要求他们注重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加强与委员所在界别，特别是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工作联系和合作，形成合力，着力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合作共事能力。

2003 年，我联系市政协台港澳侨暨海外联络委员会、硚口区政协，以及市民建、市九三学社，联合组成调研专班，就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开展专题调研，为我市创建文明城市献计献策。2004 年，又与市民建、市民进和市工商联联合组成调研专班，就如何振兴我市纺织服装业深入调研，所形成的调研报告在政协常委会议上作了主题发言，市政协办公厅以文件形式报送市委、市政府；并以四家的调研报告为基础，

形成了主席会议建议案；《长江日报》“研究与决策”专栏和《武汉经济研究》刊登了调研报告，市台办还以此推荐段海波主任和我参加了“湖北·武汉·台湾周·海峡两岸湖北传统工业发展研讨会”。2005 年，联合市工商联，就加强都市工业园区建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开展的专题调研，在一季度的政协常委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4 月初，与市工商联联合组织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学习报告会，全国政协《值班日报》第 77 期作了动态信息报道。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回忆在职期间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探索把界别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的途径与方式，做好界别工作，倍感欣慰，也衷心地期望一线的政协工作者不忘人民政协成立时坚持党的领导初心所在，团结在党的旗帜下，进一步做好界别工作，使委员的群体力量和界别优势不断转化为政协履行职能的丰硕成果。

（朱大成：武汉市政协原副秘书长、办公厅原副主任、经济委员会原专职副主任）

我做统战工作的 10 年回忆

◇ 杨 光

《武汉文史资料》今年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特刊的专栏“团结篇”，其主旨为团结在党的旗帜下，这勾起了我在市委统战部工作 10 年的回忆。尤其是在王功安、胡照洲两位部长领导下的那段时期，无论是统战理论研究还是统战工作绩效，都得到了中央统战部的高度评价和工作对象的交口称赞，被誉为武汉统战工作史上的最佳时期。其中令我担任 8 年党派处处长受益匪浅并尽力践行的是——为使更多人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一切统战工作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使党的决议成为工作对象的共识。

（一）

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一日，我在调入市委统战部工作前夕，上王功安部长家去聆听教诲，有幸遇上部长在家接待家乡的老熟人，耐心、细致地解说党的离休干部政策。待部长宣讲完离休政策的条款和规定并着重阐述这一政策的特定意义后，客人由衷

地表示：“我虽说是 1949 年 9 月下旬接到录取通知，但我确实是 10 月 2 日才去报的到，应按规定办理退休，不应有任何侥幸。”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一年端午节，一上班，胡照洲部长便给我 10 元钱，让我买上五芳斋的粽子送到市民革名誉主委杨时展老先生家。当我奉上一对清水粽、一对豆沙粽和部长的祝福语后，这对耄耋老人眼里噙着泪、嘴里不住地说道：“照洲部长还记着我们的孩子不在身边，还记着我俩的这点嗜好……”数日后，《长江日报》刊出杨时展老教授捐出 10 万元给教育基金的报道。

为了改善统战系统机关干部工作、生活条件，1995 年 1 月 4 日，胡照洲部长在全年工作安排部署了统战系统机关干部的宿舍建设。1995 年 11 月 14 日，市委统战部召开有关单位负责人协调会，按照“照顾同盟者利益”的统战政策，在 42 套住房中分配给市各民主党派机关 15 套住房。会议议定的分房原则为：1. 考虑拨款情况，实行切块分配。2. 所有权属市委统战部，使用权归切块分配单位。3. 分新房交旧房，以利

再分调。4. 强调“三讲”（讲形势、讲道理、讲究思想政治工作）“三公”（公正、公开、公道）。5. 没有保证措施不匆忙进行分调。6. 民主党派机关由秘书长联席会议来统一考虑分房工作，统战部负责咨询，党派处负责协调。11月28日，在秘书长联席会议上，统计申请分调房人数为60人，依照6月2日秘书长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的分房方案，公布分调房第一榜（60人的基本情况）。12月19日，市各民主党派主委、副主委、秘书长召开联席会议，进一步协商分房方案。1996年1月5日，秘书长联席会议上，4个党派机关无意见，4个党派机关对二轮房的分调有意见，经会议讨论、修订后，即时公布分调房第二榜（拟定的分调房名单）。1996年1月11日，秘书长联席会议上，8个民主党派机关均无原则性意见，遂决定公布分调房第三榜，并决定按三轮、二轮、新房的顺序进行过户和有关问题的协商处理。至此，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分调房尘埃落定。三轮分调共计46人，占时有138人的三分

之一。46人中有副局级、处级、科级干部、办事员、工勤人员、退休人员和引进的研究生。民主党派机关是国家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参照执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是统战工作者。此次分调住房与同期进行的机关“三定”（职能、机构、编制）、机关干部职级提升、工勤人员录干转干、参加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或培训，共同构成加强民主党派机关建设的重大步骤、重要环节，以利其发挥中枢作用。诚如胡照洲部长说的：“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关心、帮助其解决一些必需而有可能解决的问题，是原则，也是方法。照顾有方法也有途径。”

（二）

形成共识，增进共识，成为我在市委统战部学习理论、努力工作中领悟到的真谛，或者叫工作艺术。时隔二十多年，我仍记得1996年4月3日，在部务会上，胡照洲部长就“如何做好处长”同大家谈心，其

中第五点讲到：“忠诚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全心全意为党外朋友多办实事、多做好事。”

1996年7月10日，在市委统战部部务会上，胡照洲部长在部署下半年工作中，指出年度出访活动已获批，其中讲到“九七回归”是大事，是工作机遇，要学习、了解、做工作，组织十三区县的统战部长去，部内有关处长去。7月15日，周启新副部长告



1996年12月，香港汉港联谊会以早茶形式欢迎欢送武汉市委统战部赴港参观考察的12名同志，后排左一为杨光

诉我：征得照洲部长“原则上同意”，拟于下半年组织党派主要领导人赴港，以海外联谊会的名义，组织好邀请单位和在港活动，结合九七香港回归，该看望的人要拜访到，多做工作；该看到的地方亦看到，把握大局。1996年8月14日，在市委统战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胡照洲部长谈到赴港的组织工作时，强调从来没这么大的调度，要非常谨慎、细致。有分散的活动，从这里到那里去，都得精心组织，精心安排。周启新副部长谈到四季度党派领导人赴港问题，定下各家的主委去，帅松芬副部长带队，去1~2位工作人员。参观，请新华社同志介绍情况，给协调部打报告。

1996年12月6日，武汉市区内的王家墩机场，晴空万里，蓝天上白云朵朵，停机坪上一架银白色飞机静静地等待着。待到一行10辆轿车鱼贯而入机场后、成一字型依序停在飞机一侧时，欢声笑语顿时从一扇扇开启的车门中溢出：“这是什么待遇！”“平生第一次！”“市委重视啊！”“‘不虚此行’由此开始！”市民革主委李家友、市民盟副主委张志雄、市民建主委肖国金、市民进副主委王燊、市农工党主委肖谷欣、市致公党主委崔光杰，市九三学社副主委沈良祥、市台盟主委江水生、市工商联副会长邵之中、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帅松芬，还有作为工作人员的我和联络处副处长高翠兰，依次在欣喜、惊服、感慨、矜持等状态中登机。午后，我们一行12人从珠海市的拱北口岸出境，进入澳门。

7日清晨，我起床后即出酒店想看看周围环境。一出店门，即见马路对面的地上倒卧一人，身上被砍了好几刀，已经毙命。澳门人没有围观的习惯，行人见后即行走过，也不见什么悚然之状。我立即返回酒店，招

呼大家到餐厅吃早餐，席间尽量多说点话，待到一行12人出门后，已不见对面的尸体。我心中这才松了口气，暗自庆幸没惊吓到这些上年纪的领导人。待到陪同我们的澳门自来水有限公司的李先生来后，再三就郑家成先生（香港新世界发展（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总经理，政协武汉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委）因不在澳门未能陪同致歉后，赠送每人一件衬衣，并笑着说出汗了可即时换换。我见他很会办事和说话，心里更是松了一口气，一行人随即按照旅游线路游览了大三巴牌坊、赌王别墅、总督府等。中午时分我征求大家意见，可去跑狗厅参观，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没心情！”我这才知道只有我不知道大家都知道早上的事，老先生们个个都比我起床早，顿时感到老先生们真是修养到家，而且是“每有患急，先人后己”啊。午餐后，参观渡轮码头、连岛大桥及围海造地工程，大家一路赞叹澳门人民的勤劳智慧，也不停夸赞郑家成先生对澳门的贡献。灯火辉煌后，大家来到葡京赌场参观，深为这幢建筑的寓意和建造连声感叹。见其四周多有当铺，感叹生活在澳门之人洁身自好的不易，也为来此旅游的大陆人尤其是年轻人担心。路过“红磨坊”法式歌舞厅时，我对大家说可以自行观赏，门票每人100美元。老先生们个个摇头说到：“不花那冤枉钱。”

8日，自澳门乘气垫船经40多分钟航行即到香港，入境后首要的事是看望香港的武汉市政协委员。当晚，帅部长就带我和高翠兰看望林兴识先生（香港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源兴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政协武汉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委）。虽在家里，林先生仍用洋酒、西点、水果等热情地招待我们，相谈甚欢。夜深后，林先生坚持让其女婿开车送我们回酒店。

9日,在看望刘广全先生(香港太古集团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董事、政协武汉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后,得其陪同我们12人参观启德机场,看得仔细的是飞机维护部门,可谓开一次眼界。看望吴文伟先生(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主席行政助理、九龙仓武汉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政协武汉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后,有幸参观了包玉刚船王纪念馆,得悉香港行政长官参选人董建华先生与船王的关系,与国内有关部门的联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期间,邓小平就已一再提出“要由爱国者治港”的主张,董建华先生确系爱国爱港人士。分别时,我们每人获赠一个印有九龙仓标识的真皮小钱包,据说在香港市面可证身份用。赶巧的是黄文杰先生(香港仔专线小巴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当年增选为政协武汉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随即又在香港巴士经营竞标中夺魁,双喜临门之际不忘为我们一行提供热诚服务,使得我们一行能见缝插针地游览太平山顶、海洋公园、维多利亚港湾等。

10日早餐后,我们12人便齐聚在酒店一楼大厅的左角处,90°角的落地大玻璃正好观察窗外一条直道和左邻的选举委员会大楼。直道上突然出现了一群游行示威的人,估计有五六十人,看其举着的横幅或纸牌,便知是台湾方面雇佣的社会闲散人员,不言不语地在直道来回往返。正觉其倒还貌似文明,只是往返游走,并不阻拦往来车辆时,忽见这群人在数人示意下一律就地卧倒,瞬间躺了一地。随即从直道两侧数幢楼后涌出大量警察,估计有近200人,手脚麻利地两人抬一个,其余的清理地上垃圾。不足5分钟,直道上空空如野,洁净如初。也就二三分种后,一行车队匀速驶入,在选举委员会的大门前,可以看见董建华先生身

着灰色夹克,从容镇定地举起右手向远处的记者群示意,缓缓进入大楼。我们从酒店大厅内电视的转播里可以看到董建华先生的竞选演说非常成功。晚上,香港新世界集团董事局主席郑欲彤先生和香港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兴识先生联合在维多利亚港湾的海洋大酒店宴请我们来港参观考察的一行12人,大家在频频举杯中共庆胜利、相互祝福。

11日上午,香港汉港联谊会以早茶形式欢迎欢送我们。名誉会长盛如松老先生(香港惠安行总经理、政协武汉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委)、会长杨志成先生(亚非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主席、政协武汉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副会长余德义先生(香港义生五金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政协武汉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共邀众位企业家、政协委员与我们一行12人品茶叙友情、畅达话九七。午后离港,由罗湖口岸入境深圳市,乘机返回武汉。

1996年12月18日,在全市统战部长横向联系会上,胡照洲部长讲到香港回归的意义,世界、全国、全党瞩目,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机会。要充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市里组织党派、工商联领导同志赴澳门、香港考察,取得圆满成功。”

1997年1月2日,胡照洲部长向全市统战系统作香港回归工作报告后,召开党派、工商联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市民盟副主委张志雄在会上发言中说到:“到香港去,其意义体现在我们既是统战对象,又是做统战工作的骨干。”

(杨光:武汉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原专职副主任)

在榜样的引导下努力履职尽责

◇ 刘珍秀

作为非中共党员，我在担任新洲县、武汉市政协委员 25 年履职过程中不断学习和成长，离不开各级党组织的培养和关怀，也离不开我心中的榜样、优秀党外人士、著名棉花专家张剑南先生（1923 ~ 2004 年）的引导。

主干强枝繁叶茂

1993 年年初，我刚任新洲县政协委员，不到而立之年，对政协制度及参政议政的认识是一纸空白，因闻张剑南先生大名，心中暗拜他为师。第一次见到的张剑南先生，是新洲县政协副主席，身着黑色中山装、不苟言笑，似乎很不易交谈，我大气也不敢出。但听过他讲话后，觉得他不是那么“拘板”，于是趁他身旁没人时壮着胆子凑过去，怯怯地套近乎，请他指教关于对政协的认识和应

该怎样做政协委员。他简要问明我在新洲师范学校当老师后，稍微沉思了下，不紧不慢地说：“首先要明白当政协委员是个政治活，必须弄清楚政协制度的来历和作用。”

（对“政治活”三个字，他特别拖曳停顿）随后，他三句话不离本行：“棉花有主干、枝干，没有主干或主干不强壮，棉花立不起来或长不高；没有枝干，棉花就不繁茂，开的花不大、结的桃不多，就难丰产丰收。”见我正怔着，他微微弯弯腰笑问：“听明白了没有？”说实在话，初入政协门，我当时还真没明白，之后一直在品味他的话语。风趣幽默的老先生，用“主干和枝干、枝繁叶茂”来表达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解，语言朴素、深入浅出，真实体现了他的政治素养，也是他“文革”十年呆“牛棚”、出来依然自奋蹄的精神源泉。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带领全国人民向惊天动地、顶天立地迈进！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好。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智慧和力量、包含各民主党派成员在内全国人民的团结和奉献、取得的抗疫成果全世界有目共睹！尽管张老先生离开我们近 17 年，但他“主干强枝繁叶茂”的认识也再次得到了充分印证，也一直影响我在本职工作和政协委员履职尽责过程中自觉拥护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无品官成有品事

2014 年，为纪念张剑南先生逝世十周年，时任新洲区政协主席王建生同志撰文《无品官成有品事》。文中写道：公元一九八四年，新洲县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了。张剑南以民主人士的身份高票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随后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已过耳顺的张剑南，笃定地讲出了他的打算：“当无品之官，成有品之事。”这句话看似平淡，有点文字游戏，然而细细琢磨，志存高远。官不能有品，有品，就在人民之上；而事业，不能无品，无品，则一事无成，或一塌糊涂。

张剑南先生“成有品事”，众所周知。《无品官成有品事》文中有描述：张剑南一生著述颇丰，有多篇文章在《人民政协报》、《团结报》、《中国政协》、国务院参事室《参事通讯》、中央统战部《零讯》和省、市数十种报刊上发表，出版的专著有《棉花

文选》《张剑南参政议政专辑》《张剑南诗选》《集外集》等。1992 年，张剑南成为新洲县第一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授级高级农艺师。从 1983 年起，先后任新洲县（区）政协常委、一至五届副主席，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获省、地、市劳模，先进工作者，优秀政协委员等荣誉称号 100 余项。

2014 年 9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名非天造，必从其实。”“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我觉得恰好印证了张剑南先生为人处事、精求业务的朴素品质，他也无愧于组织和人民给予的“棉花专家”称号和“参政议政特别奖”等。

近距离接触张剑南先生多次后，我既敬仰他的“成有品事”，同时也在探究成事之因。我以为，他“无品官”做人做事的优良品质和博学多才的知识积累，是“成有品事”的基石，也时刻激励我不断努力！

把科研写在大地上。张剑南先生毕业于华中农业专科学校，1951 年在新洲县人民政府建设科从事棉花技术推广工作，此后终身聚焦棉花生产增产“主业”。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他长期深入农村，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断创新棉花种植丰产方法、办多种试验示范田、及时总结规律并推广，为新洲成为全国棉花大县作出了巨大贡献。1957 年，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在新洲召开；1964 年，全国第五次棉花会议印发了张剑南“张氏棉花高产栽培技术”的发言；1965 年，新洲县棉花单产居全国首位，曾作为科学植棉和棉麦双高产典型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展览；1979 年，新洲全县棉花总产 48 万担，1984 年跨过 50 万担大关，铸就了历史的辉煌。张剑南乐在

田间地头，乐在披星戴月，乐在春夏秋冬，乐在用研究成果浇灌大地。他自己曾调侃：“我种棉花只试验了三十多次。”好一个三十多次！三十多年寒来暑往，一万多个日日夜夜，是科学家的一生一世啊！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

教学生如种棉花。大约在1997年，一次新洲县政协常委会议前夕小坐交谈时，张老先生浓重的麻城口音开腔了：“小刘呀，你培养小学老师，就如同我栽种棉花。棉杆今年拔了明年再种，选种、翻地、做（营养）钵、间苗、施肥、捉虫、喷药、打顶等，一样都不能少，年年都不能马虎的。学生毕业走了一批又新进来一批，学生每年都不一样；教书育人，有很多具体事情，是一个好老师必须想到、做到的。”我至今都能清晰地记得他当时讲话的场景，也激励我工作时刻不可懈怠。

女伢要追求漂亮。2001年三八妇女节前后，时任新洲区妇联主席的我正穿黄呢大衣系着丝巾，路遇张剑南老先生，他老人家微笑道：“你们女伢几好，还有个单独的节

日，又能穿得漂漂亮亮的。”但随即他较为严肃地说：“女伢应该穿得漂亮点，但也还要内心漂亮，不能专门追求外在美，或者重外轻内。只有内心强大，才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基础。妇联要多做这方面的促进工作。”这是我收到的意味深长的三八节礼物，也让我记忆深刻，难以忘怀。既是长辈对晚辈的慈爱，也是先生送后生的忠言。

跟着榜样向前走

政协委员似官不是官，参政议政要参到点子上，议在关键处。张剑南“心里藏之，不敢忘之”，拒绝冷漠，拒绝发牢骚。他提出：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像卞和之辩玉、伯乐之相马，独具慧眼，识别真伪；探究办法解决问题集群众之智慧，听百姓之心声，不能像屈原问天，只问不答。在多年政协委员和不同工作岗位履职中，我一直视张剑南先生为榜样，努力学习、加强调研，尽可能在履行各项职责中务实求效，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2002年10月18日，新洲区委、区政府举行张剑南先生参政议政座谈会，前排右九为张剑南，前排左三为刘珍秀

2008年11月，我从新洲区政府副区长调任市工商联副主席，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把民营经济人士凝聚在党的旗帜下是我新的工作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市委高度重视民营经济领域党建工作，将全市民营经济领域党组织负责人和骨干党员培训纳入全市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根据武组〔2009〕16号、武组文〔2009〕117号文件精神，在市委组织部的统一领导下，市工商联党组每年组织开展民营企业及商会党支部书记和党员骨干培训，12年来（在市工商联班子成员分工中，我于2015～2017年负责此项工作），市、区工商联及其商会已累计培训人员5000多人（次），极大地提高了我市民营经济领域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有财力、有智力、有社会影响力的民营经济人士群体是我市过百万家民营经济市场的主体，贡献了全市42.7%的GDP、51.9%的投资、80%以上城镇新增就业（以上均为2018年年底数据），该活动促使他们在感党恩中奋斗、在听党话中前行、在跟党走中进步，把讲政治转化为拥护党的领导、响应党的号召的具体行动，也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汇聚起共襄伟业的强大力量。近五年来，全市民营经济人士为精准脱贫、疫情防控、抗洪救灾、帮困助学、敬老助残等捐款捐物几十亿元，本届市政协工商联界别民营企业委员充分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

积极参与民主协商和监督。自1994年

起，我市两会期间市主要党政领导与市政协委员座谈，一直是市政协“传统保留节目”。2014年1月8日，时任湖北省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与25名政协委员座谈，听取委员们对武汉市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创新的意见和建议。我有幸参加座谈并结合工商联工作、前期调研提出建议：“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上马、重要公共政策制定或修改，政府能不能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进行事前有效协商？”

其实早在2011年，市委、市政府就明确规定党委、政府出台重大经济决策措施，应委托工商联征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意见，但还没有形成制度化，也使得政府出台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有些“难产”、有些“流产”。如一份涉及面非常广泛的政府部门文件只执行了9个月10天就进行调整，如果是事前广泛征求行业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充分沟通协商，政策落实就会如同“自由落体”，顺利有效。

在市委的高度重视和市政协的有力推动下，2014年12月，《中共武汉市委关于加强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意见》（武发〔2014〕17号）出台，规定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五条原则、八项内容、九种形式、五种程序和五条组织保障要求，为推进武汉政协协商民主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2015年7月21日，《武汉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武汉市人民政府令第266号）发布，同年9月1日实施，提升了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水平，推动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2011年，武汉市委、市政府在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开展“十大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活动。市政协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充分履行民主监

督职责，组织政协委员组成10个督查组，对应开展专项督查。2013年，我参加“违法建设屡禁不止问题”的督查活动17次，先后到经开区、汉南区、蔡甸区、青山区、硚口区、东西湖区查看违建已拆和难拆的现场，听取市城管局和上述区政府拆违工作情况汇报，闲暇时间多次单独走访居民群众，深刻体会到在巨大利益面前，拆违控违不能停止的艰辛，甚至工作人员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由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年6月28日，我在市委“拆违控违”主题的双月座谈会上，就“胶囊房整治”发言，得到了市领导高度认同。2014年，市政协继续推进“十大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活动，我参加“政务信息公开程度不高问题”督查活动，并将工作过程、实效和体会撰写了《专项督查凸显民主监督功能》一文，刊于《和谐》丛书2015年第3辑。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拓展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形式的重要探索，2019年8月6日，市政协首次举办“网络议政厅”活动，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我市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市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的一项创新性工作。作为市政协工商联界别召集人之一，我不仅自己在主会场发言，还积极组织民营企业家委员和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广泛参与，多出“金点子”。

务实调研有效建言。25年的委员履职过程中，我不仅参加有组织的集中调研，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有意识地走访和收集资料，提交个人建议并被作为提案达百余份，近五年牵头工商联界别向市政协提交集体提案30多份、建议案3份。

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斗中，

我组织工商联界别委员和民营经济人士，分重点开展线上、线下调研14次，快速反映民营企业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中的意见建议，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市政协提交《防疫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基于疫情中湖北企业经营分析报告的政策建议》《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急需向中央申请中长期政策帮助疫后重建》《武汉民营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的困难问题及意见建议》等调研报告和建议，受到领导重视和各界媒体关注。《关于推动我市尽快复工复产复市的建议》《关于扶持我市中小企业稳定发展的建议》两件提案被确定为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重点提案，由市政协领导带头督办，取得较好的办理实效，为疫后我市经济复苏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刘珍秀：武汉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副主席）

做时代的忠实记录者

在举国上下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由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与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撰的《武汉文史资料·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特刊》出版了。

其实，早在一年前，编辑们就开始思考：该以一种什么方式来隆重纪念我们党的百年华诞，表达我们对党的真挚感情？在这一重大的历史节点，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如何忠实记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与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携手奋斗的壮阔历史？

为此，我们专门听取了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市档案馆等部门的负责人和党史专家、政协委员以及政协工作者们的真知灼见，并多次召开编委会、座谈会进行研究讨论，终于形成了特刊的初步构想。自今年年初开始，围绕“初心篇”“担当篇”和“团结篇”三大板块，编辑部和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处室按照分工协同开展征编工作。

半年多的时间在紧张和忙碌中匆匆而过，我们立足政协文史资料“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征集了 40 余篇稿件，其中，既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主要活动及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又有党的领导人在武汉的实践活动的回顾，还有我市长期从事政协统战工作的老领导的回忆。一篇篇稿件见证了在江城这片热土上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史瞬间，彰显了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作为政协文史工作者，有幸参与其中，忠实记录下这段历史，我们倍感骄傲。而今，手捧着散发着淡淡墨香的特刊，我们每一位编辑心中涌动着无比的欣慰，更涌动着对所有指导、帮助、支持和参与特刊编辑出版的领导和同志们深深的敬意。

市政协和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对特刊的编辑出版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市政协副主席陈邈馨多次听取工作汇报，并对特刊的总体框架、稿件安排作出指示，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郑水平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稿件的征编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市委党史研究室在本身人手不足、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征集和撰写了一批具有珍贵史料价值和重要纪念意义的文稿，并提供了大量反映武汉党史重大事件的图片；市政府、市政协、有关市直部门的老领导和相关党外人士更是倾情投入，他们有的不顾高龄或病痛亲自撰稿，有的夜以继日在档案中挖掘史料、在工作笔记中寻找回忆，有的不厌其烦地多次来编辑部认真校对文稿；市档案馆为我们查找、复印相关文献提供了不少便利……在此，我们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对于特刊的编辑出版，我们全体编辑人员不敢有丝毫懈怠，面对每一篇文稿、每一幅图片、每一段文字说明，都反复推敲、精心打磨，力求将一份精品呈现在读者面前。但是，由于本刊稿件内容时间跨度较大，涉及范围较广，史料征集比较困难，难免挂一漏万，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我们将坚守初心，做时代的忠实记录者。

（本刊编辑部）